序 言

世界上自然万物都这样生长着，随后死去。人类历史就是演示着无数生命的生生死死。然而，无可计数的生命像沙粒一样沉积着，只有少许的杰出人物像宝石一样闪光，同一代一代人进行交流，也影响着一代代的人。西蒙·波娃和萨特正是20世纪杰出的作家。

西蒙·波娃是一个坚定的存在主义者，她一生都从事写作，写作是她的精神自由得以实现的生活方式。尽管她在一生之中都无法确信："我在为谁写又是为什么而写作"，而写作就是她本身。正像西西弗要不停地一次又一次把滚落下来的巨石推向不可达到的山顶一样，她试图用写作的方式来达到"永恒"，"绝对"，可她最终觉得受骗了！然而，在她看来，只有语言具有神奇的力量，是能将万事万物一一作出描述的精灵，是唯一能够超越物质世界的力量。语言在她生命中流淌，在她舌尖上跳跃，通过语言波娃得以和人类进行交流。

波娃和萨特的作品震荡了世界。他们的一生，是通过自由的选择来塑造自己。他们成为"存在主义"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特别是波娃开创了女性的解放之路，用她的写作和爱情生活鼓舞每一个女性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而不只是男性之下的"第二性"。她宣称："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她成了女权主义的"圣母"。她的一生有过多个情人，而她与萨特的情爱是最长久的。

辛格写过一个关于"两片树叶"的爱情故事，是说一棵树上有两片树叶相互依靠，用相互的爱鼓舞着生命。可一阵狂风将树

上其他所有的叶子都吹落了，只剩下它们俩。它们用爱在狂风中持存着生命。终于，其中一片叶子再也无法抵抗狂风的袭打，从树上飘落。另一片叶子，孤零在树枝上，没有了“爱”，也随之飘落，它说道：“没有你的爱，我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此书中写到的正是这样的两片树叶的爱情故事。波娃与萨特的爱情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而升华为一种“语言爱情”。他们用语言突破了两个肉体间的限制、阻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性。抛弃一切所谓的传统道德、习俗、禁令、枷锁，而用真诚的透明性原则建立了终生的情侣关系。而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即是波娃和萨特一生中的学习、写作、生活的情事。

目　录

第一章　成长与梦想

弗洛伊德常告诫我们，一个人的童年生活经历将会影响此人的一生。西蒙·波娃生于1908年1月9日，是乔治和弗朗索瓦兹·德·波娃的女儿。他30岁，她20岁时，他们结了婚，一年以后有了西蒙·波娃。这两个年轻的资产阶级适应了当时的那个特定世界的习俗。西蒙·波娃还没降临尘世之前，已经被确定为——法国人，资产阶级，天主教徒。她的出生就使她成为一个享有社会特权的孩子，与农民或工人家庭的女儿相比，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西蒙·波娃摇篮周围是一个充满关心的大家庭，她信心十足地窥视世界。然而，生命不是原来种子的单纯生长。它不断遇到危险，或是受阻，或是受伤，或是遭受破坏，或被改变方向。但一个幸福的开头确能鼓舞一个生命从环境中获得最好的部分；如果开头不幸福，就会出现恶性循环。

（一）　我知道自己注定离群索居，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女人是她丈夫塑造的结果

波娃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快乐、和谐的家境中。她是一个天性自由而快乐的小女孩，不知道悲伤是怎么回事。她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外祖父母、叔舅姑姨、表兄姐妹，这一庞大的家庭成员簇拥在她的周围，大家都很愿意聆听她的故事，重复她的话题。波娃高兴地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她如处于一种超自然力的围绕中，人们以牧师般的姿态启发和教育着她。

虽然波娃被保护、被宠爱，被无数新奇的事物激动着，但也许是患有某种毛病，她常因发脾气而在地上摔滚，摔得满身青紫，抽动不已。她也时常扪心自问：为何常大叫大嚷？这样做意义何在？她相信这一方面是由于激奋的活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爱走极端。这使她的愤怒常常发展到呕吐的地步、热望达到着魔的程度。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天命，倒可以忍耐顺从——她不曾违反过命运，但她无法漠视快乐的生活变得空虚恐怖，她拒绝接受那些被大人们漫不经心地发出，却代表不可捉摸力量的字眼："必须……"，"不应该……"。她反对这种随意的禁戒和武断的命令。"昨天我剥了一个桃子，今天为什么不能剥这个李子?！为什么我这时必须放下自己的游戏?！"然而，她终究无法摆脱，这些如石头般严酷而顽强地压在她头上的命令使她隐约看见了虚无，最后不得不哭着、喊着，被令人眩晕的虚无淹没。她牢牢地踏在地上，以摇晃的身躯抗拒着这"虐待"她的无形压力。当人们捉住她，并把她关进放扫把的小房子时，她就用四肢靠住黑暗中坚实的墙壁来对抗那无法捉摸的意志，虽然她知道这种对抗终归徒劳——她被制服了，但并没有投降。她要完成失败了的工作，挣扎着，泪水模糊了双眼，隔断了时间，抹掉了空间，同时也破坏了她的欲望。当她沉浸在无助的夜晚中，感到有一种万物俱灭，唯自己独存的感觉，然而这种独存的感觉最终还是爆发为一阵摧裂黑暗的嘶叫。

波娃的安全感一旦受到威胁，便迅速地躲避。她喜欢在丝毫没有危险的问题中钻牛角尖。人的出生问题并不太困扰她，因为她听人说，孩子是父母用钱买来的，而且世界是如此之大、充满了无奇不有的事物，因此上帝给父母贮存小孩的仓库特别的多。她开始满足于这样一个模糊的答案：上帝创造了婴儿，是上帝从泥土中塑造出亚当。而婴儿从摇篮中出生的说法并不太妙，倒是用神的意志来解释人类出生的方法使波娃感到信服。

宗教的神秘气氛遥远而迷茫，但不使她惊异。倒是圣诞节的

奇迹引起波娃的深思，为什么万能的小耶稣像一位普通的扫烟囱的人一样嬉笑着从烟囱里掉下来呢?她觉得这个故事漏洞百出。波娃难以原谅她父母制造出来的谎言，这些谎言使她的身心受到伤害。因为她感到父母还把她当作小孩哄骗，没有充分尊重她的独立性，也太低估她的智力了。可当她父母承认是欺骗了她时，她非常欣喜，感到父母已把她当作大人对待了，从新得到了尊严感，于是她也设想从此可以得到人们真实的而不是欺骗的回答。

1913年10月，波娃5岁时，她父母决定让她入学。那学校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德西尔学校。自上学后，波娃的父亲为她在学习上的进步和成绩感到欣慰，他也在波娃的生活中愈来愈重要了。在波娃的视界里，他父亲似乎和一般男人不一样，他那带着讽刺喜剧演员的表情确实令人惊喜。在波娃的亲人当中，没有人像他一样既风趣可笑，而又卓越不凡；也没有人比他念过更多的书，熟背过更多的诗歌和更具讨论的热情。当他靠着壁炉时，时常指手画脚地滔滔不绝，而旁人只有听的分。在家庭聚会中，他一直是个风头人物。他最独特的才能，是在闲暇时装扮喜剧演员。他穿着长袍，围裙，睁大蓝色的双眼所扮演的愚蠢的女厨师，把波娃的眼泪都笑出来了，而这一怪异的形象在她老年写回忆录时，还历历在目。

波娃的父亲具有异于常人的禀性，这可以用他的社会地位来解释。他的姓氏属于贵族阶级，于是他便时常过着贵族的生活方式。他看重优雅的风度和美好的情感，以及言行的放荡不羁。他不满意那些资产阶级固有的严格的道德规范。但他正为之苦恼的是：他虽拥有一个荣耀的姓氏，但摆在他眼前的道路却颇为难堪，他无法加入俱乐部和高等沙龙，缺乏过大公生活的财富。他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只能充当一名不错的律师，一家之父，荣耀的公民。虽如此，他却不那么看重这些本属他的职责，为了掩饰这一贫乏，他只得选择成为一个演员的道路。要成为一个演员，必须要有观众和欣赏者，他既不喜爱自然，也不偏爱孤独，他只在人

的社会中才会感到欢乐。可显贵阶层又将他排斥在外，他又必将否定这社会，不得不逃离这个社会。但文学允许他运用想象力对现实社会进行报复。从某种意义上说，演员在舞台上至高无上地存在着，他喜欢演戏，主要因为他无法忍受他所处的卑微地位，而并不是戏剧中的角色。他是在寻求对抗社会之路。

波娃小时候常被父亲那洋溢和善于言辞的才能所折服，随着年龄的增加，她逐渐懂得了更严肃地崇拜他。她惊奇他的信仰、智慧和正确而健康的思想意识。在家里，他的权威是不需争论的，波娃的母亲心悦诚服地承认他的不凡，是他将波娃的母亲带进生活和书本的世界。他时常这么说道："女人是她丈夫塑造的结果。"随着波娃的成长，父亲愈来愈关心她。他相当重视她的书写规则，他总是将波娃写给他的信件修改后寄还给她。对他来说，波娃既不是一个肉体，也不是一颗灵魂，而是一种理智。因此，他们俩的关系处在一种无法产生冲突的纯洁的气氛中。他并不屈就波娃，而是将她提升到和他相同的地位，波娃很骄傲地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大人。但在实际生活中，波娃更依靠她母亲，父亲毫无保留地把波娃的身体成长和道德培养的任务交给了她母亲。

波娃的母亲出生于凡尔登一个虔诚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波娃的外祖父是银行家，曾在耶稣会教士办的学校学习过，而外祖母在修道院读过书。波娃的母亲在孩童和少女时代的生活因过多的失望而使她的青春期显得黯淡。20岁时，她毫不讲究地戴着修女那垂到胸部的头巾，习惯于压抑内心的冲动，把自己的痛苦埋葬在沉默里。她时常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她虽然拥有美丽的外表，却缺乏信心和快乐。自从她遇到波娃的父亲后，她的内心变得心花怒放了，她倾醉于他洋溢的情感之中，她十分崇敬他，而也认为女人应该服从男人。她十分赞同妥协，妥协并不损害她的原则，并可以平衡她内心中顽强而执意的倾向。她与波娃父亲结婚后，成为一个快乐的少妇，但她把性欲和罪孽混为一谈，时常狭隘地从肉体联想到罪恶。因为习俗允许男人偶尔胡闹，她便认

为女人应该严肃，并认为这是正直的女人和荡妇之间唯一的分水岭。她的行为与信仰相符合，随时准备自我牺牲，也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他人。但波娃从来不把母亲视为圣人，因为对她母亲太熟悉了。假若她母亲更加完美和远不可及，也就不可能深刻地影响到波娃。事实上，她对波娃的影响正在于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她们之间可以说是在一种共生的状态中，波娃没有竭力去模仿母亲，只是被她所塑造。她母亲反复叮咛她责任的意义和忘我，公正的重要性。她父亲对于出人头地的事从不厌倦，而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主动隐退，抑制自己的言语，节制自己的欲望，使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逾轨。

波娃觉得，尘世和天堂上的历程是被保护着和引导着的，此外她庆幸自己并非完全依靠大人们，而且童年也并不孤独，她还有一个妹妹，叫普佩特，比她小两岁半，人们都说她长得像她父亲，金发碧眼。从她的孩童照片上看去，眼神总充满了泪水。她的出生使渴望男孩的全家人感到失望，虽然没有人怨恨她，但人们围着她的摇篮叹气的事情是常有的。人们尽量平等地对待姐妹俩，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几乎一同出门，过着同一种生活。波娃舒适地置己于长女地位，所凭借的只是年龄的优势。她时常差遣稍微年幼的妹妹。普佩特成了她的忠臣、副手、她的另一半。她们两个，缺一不可。只有通过妹妹，波娃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威。大人有时迁就波娃，而妹妹却是一向顺从她。她们之间最牢固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波娃喜欢读书，因此发觉教书十分有趣。她教妹妹读书、写字、计算。当她把无知变为有知，把真理注入一片荒芜的心田时，她创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从波娃小时候喜欢教书，把传授知识看作是一种创造的感受，这也注定了波娃成年后走上教书和写作生涯。

正是因为有妹妹的存在，波娃维护了她的自由，妹妹成了她的同谋者，随从。波娃没有兄弟，无法知道哪些本应给予男孩子的优待，由于性别与她绝缘了，对人们给她的束缚，她只归咎于

年龄。虽在孩童期感到强烈的不适，并非是性别的缘故。她所认识的男孩都没有什么威望，她认为在上帝眼中，男孩的灵魂并不比她的灵魂更为高贵，那么她为什么要羡慕他们呢？在她的游戏、思考、计划中，从未想过要变成男人，她所有的想象力都专注于身为女人的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波娃显得较为好奇，喜欢冲动，乐意沉浸在严格而有组织的梦幻中，她便用布娃娃来满足这一欲求。波娃扮成模范小女孩的好母亲，给娃娃最有益的理想教育。她同妹妹合作，并专横地帮她养育她的孩子（布娃娃）。为了不使男人来降低她们的责任，她们假设她们的丈夫去出外旅游。在生活中，她们也知道一位母亲即使不常陪伴男人，也有无数枯燥的事情需要操劳。当波娃憧憬自己的前途时，这些奴性的东西使她显得沉重，以至于她一直拒绝生小孩。她认为重要的是造就理性和精神，所以决定将来做一名教师。

波娃自己设计将来的创造活动和事业，这是她天性使然。她梦想将造就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梦想辉煌的开始和光荣的结局，至少在孩童时期，波娃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她喜欢社交，找一些伙伴来一起玩中奖游戏、交换书籍。她要求小朋友们遵守游戏规则，热衷于争取胜利。她妹妹接受她的权力，从未同波娃争夺过大权。如果要与妹妹分享权力，生活将还有什么意义呢？波娃从小就是一个雄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女性。这些权力欲望大得不能从现实社会中满足，于是她就投入写作，在她的想象的创造力中用语言写作去满足。她随后的写作、做教师、参与女权运动，并与萨特进行政治活动，都是她天性的自由意志和权力欲所促成的。正是这超群脱俗的自信力，她用强劲的生命力抒写了非凡的一生。

（二） 我宣布说：“我不会结婚的”。上帝突然失重，它的名字只是掩饰着一种梦想

波娃十分虔诚，在一个月中向马丁神父忏悔两次，一星期中领了三次圣餐，每天清晨都念完一章有关耶稣基督的经典。她时常在白天把灵魂提升到上帝那里，狂热地崇拜耶稣。除了“福音”外，她阅读了以耶稣为主角的激昂小说。她用爱慕的眼光凝视他温柔、忧伤的面孔，跟随他白色长袍的光芒走过长满橄榄树的山丘，眼泪沾湿了耶稣没有穿鞋的赤脚。她长久地抚摸着他的膝盖和他带血的身躯哭泣后，便和他一道冉冉“升天”。神和构成她生命最神秘的一部分互为凭依。

波娃漠视其他人，“在这世界上，只有上帝和我，我自觉他的荣耀需要我，我的存在具有无限的价值。他丝毫不忽略有关我的一切，我的行为，美德永恒地为他记载着。”波娃用自己的生命，竭尽全力地热爱上帝。

每一年，她都进行一次心灵修行，听一整天的传道者的指示；参加祈祷仪式，并摩挲着《圣经》而沉思。可她开始自问道：“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我的品性能与上帝沟通。”她看到人们来领圣餐，很快地便又置身于日常生活中。事实上，信神和不信神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她逐渐相信，在这俗世上并未给超自然的生命留下位置。某一天早晨，她终于明白，一位深信将来必将获救的基督徒，不应该把这个世界上昙花一现的苍生看得那么重要。那些基督徒中的大多数人如何能接受滞留在世俗中的生活呢？她越是深思，就越感到惊讶。总之，在无限和有限之间，波娃已作了抉择：进修道院而不是做一个毫无意义的修女。波娃常常语气肯定地宣布说：“我不会结婚的。”她父亲笑道：“等你十五岁时我们再谈这件事。”她知道一种毫不留情的逻辑推动着她上修道院，一个人怎么能和一切事物绝缘呢？

波娃一直对遥远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感兴趣，对于和自身有关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如道德、精神生活、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她开始思考起这些问题。大自然向她表示上帝的存在，尤其她到附近的梅里尼亚克乡村去游玩时，她站在那里，沉浸在无限的宇宙之中，感到眼皮上照耀万物的阳光此刻只轻抚她一人。风在白杨周围旋转着，人随风盘旋，也没有离开脚下的土地，就到了大地的边缘。当月亮冉冉升上夜空时，她觉得自己与太阳光辉下的遥远的城市、沙漠、海洋、乡村互相沟通了。此时，心灵不再空虚，不再漫无目的的发呆，只感受到麦浪涌动发出的呼吸，来自南方的浓热气浪；无数个黄昏的震颤，以及灌木丛那熟悉的气味，使她觉得沉重的步履又仿佛升华在空气之中，变得无边无垠了。大自然显示给人们许多存在的方式，而她感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就不一样。她学会观察纯清的早晨、忧伤的黄昏，以及胜利和衰落。她感到，总有一天，她体内的某些东西将和金银花的香味融合。每天晚上，都坐在同样的灌木丛中，注视着发蓝的河水荡漾着微波。在那永恒不变的草原上，从黎明到夜晚永远呢喃着一个新的生活。在变幻无常的蓝天面前，永恒总是从生活常轨中显现出来，逝者如斯也不一定就是对真实的否定。波娃感到，乡村远比巴黎更生动、丰富，乡下的生活才使她觉得上帝只存在她周围的。巴黎的众多人群和建筑物隔开了人与上帝的接触。人只有越靠近大地，就越是和上帝亲近，每次的散步都是一种崇拜的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像大自然所呈现的那样，波娃明显地感到上帝在人类的世界里像个陌生人。深居梵蒂冈的教皇不关心俗事，在无限天涯中的上帝，几乎不对尘世间的一切详情予以关注。

年复一年，波娃在加强信仰的同时，上帝在她心目中也越来越纯正，但她轻视披上神秘色彩的乏味的道德说教。她通过祷告、沉思，试着在内心感受上帝的存在。大约有7年，波娃每月向马丁神父忏悔两次，与他探讨她的心灵状态或招认参加领圣餐时毫不热心，只在嘴唇上祷告，却很少想到上帝。有一天，神父不经

任何仪式，用亲切的语调对波娃说道："我听说我的小西蒙变了，变得不服从、爱吵闹，人们批评她时，她会顶嘴……，从今以后应该注意这些事。"波娃一下子满脸通红起来，恐惧地望着这个这些年来一直将他当作上帝代表的伪君子，就好像神父突然撩起长袍，露出了裤裙，他的这一身教袍不过是一种装饰，掩盖着饶舌妇的无稽之谈。波娃离开忏悔室，胸中充满怒火，决心永远不再踏入这教会一步。从那时起，她觉得跪在马丁神父面前就像跪在稻草人面前一样令人憎恶。波娃反思道："上帝可能像一位昏聩的虔诚信徒一样庸俗，令人厌烦。或许上帝是愚蠢的！当神父说话时，一只笨手落在我的头上，使我的头屈服，使我的脸俯贴在地上。一直到我死时，这只手可能会迫使我卑躬屈膝，被泥土和黑夜所笼罩着，始终同真理、自由，一切的喜悦绝缘，使生活成为一种灾难和耻辱。"

波娃挣脱了这只沉重的手，当她走出教堂时，上帝恢复了他无所不知的权威。对她来说，再没有任何神父像是至高无上的法官，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上帝的化身。当她单独面对着上帝时，在她内心深处便存在着一个疑虑：他是谁？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站在哪一边呢？大致说来，女人比较喜欢上教堂，聆听真理是女人的特权，然而无疑地，男人比女人优越，同时波娃认为没有失去信仰更是一个最大的灾难了。她时常说服自己去扔掉信仰，冒这个险。波娃毫不惊奇地自语道："我再不相信上帝。"她时常认为在永恒的意义上，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它的价值是由我们自己所赋予的。上帝突然变得失重，他的名字只是掩饰一种梦想。波娃领悟到上帝不再干预她的生活了，他已经不存在了。波娃不承认和上帝之间有任何妥善的安排。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哪怕你只受到上帝一点点压抑，他就太过分了。同时，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那么即便你只是一点儿献给上帝，你也太过分了。波娃豁然开朗，也感觉轻松了许多，她将由自己来选择和决定命运，不信神的信仰在她已不可动播。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的日子里，她苦恼地发现在深红色的山毛榉或银色白杨树下，感觉的是上帝的不存在。以前，她生活在由上帝选择颜色和光线的一幅活生生的图画中，万物温柔地吟唱着上帝的荣耀。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沉默了，自己是一个孤零零的人。孤独，她开始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字眼的可怕，它意味着没有见证，没有谈话对象，也没有救星。她的生命、血管中的血液，都不是为任何人而存在的。她暗想：当断气的日子接近时，或明天就要死去时，人们怎能承受得住这种感受呢？波娃比害怕死亡本身还要害怕这种感受的恐怖，成为她永久的恐怖。在一个信仰神的生活境遇中成长，突然心中信仰的神消逝了，整个生命价值的根基挖了出来，人在虚无中漂浮着，将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可波娃也不能允许自我欺骗地给自己强加一个上帝。让上帝安排自己，其实也是取消了自己，自己能是什么呢？人活着就是要在上帝或虚无间徘徊、挣扎，而又自然而然地死去。现在，波娃拒绝进修道院，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梦想爱情。她已感到爱欲像春天的小草在她周身生长起来。

（三）　我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呼唤男人的手在我的肌肤上抚摸

搬到雷恩路那年，波娃的睡眠成了问题。她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男人跳到她床上，把膝盖压在她的胃上，她呼吸困难，陷入绝望之中。在那个时期，起床成了一种极度的痛苦。她母亲和医生都说：“这是即将成为女人的现象。”波娃羡慕“大女孩们”的自由，但讨厌身上发生的变化，一想到胸部变得丰满时，又不免感到无法接受。她说道：“我以前听说过，女人小便时会发出瀑布声，一想到她们腹部那胀满了水的囊袋时，我如同格列佛发现年轻女人的乳房时一样感到害怕。”

自从波娃洞悉了奥秘以来，禁书不像以前那样令她感到恐怖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在一篇连载小说中看到一段描写，男主角把他那炽热的嘴唇俯贴在女主角的酥胸上，这一吻点燃了我的心，我时常设想着男人、女人或艳情偷窥者向对方献上一吻或接受一吻的那一幕，我似乎感觉到我的眼睑充满了吻。如果说我的确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那是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成熟了……。我在某些时候是痛苦欲望的俘虏，所以，我回到床上，喉头干涩涩的，呼唤着男人的肉体压在我的肉体上和男人的手在我的肌肤上抚摸。我失望地数着年龄：在 15 岁以前，女人是没有权结婚的。在这种痛苦折磨结束之前，我必须等几年。这种痛苦慢慢开始变得轻些，在床单的微温和我血液的蠕动中，奇妙的幻想让我心悸着，我几乎相信这些幻想会实现，但是它们却消失了。没有任何的手、任何嘴唇来安抚我激动的肌肤，我的棉布衬衫变成一件有毒的衣袍，只有睡眠能够解脱。”

波娃随着青春期到来，裸体的意识在她的梦幻中不断显现。她回忆到，小时候她洗完澡后就被保姆路易丝用力地擦拭身体，以致她无法满意地注视她自己的身体。人们要她不要去观看自己的身体，在换衣服的时候也不要暴露。在她的世界里，肉欲无权存在，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然而，她也意识到母亲手臂的温柔，母亲的胸脯在内衣里隐隐地起伏、波动所显露出的诱惑。这使波娃产生许多联想。有时别人对她的肌肤上汗毛接触或一只手在她颈上留下轻触，都能使她战栗。波娃还联想到她七八岁时，一天下午，一位金发的高个老师给她单独授课，练习爬杆。当她爬到上端时，感到大腿之间一阵奇痒，也感到愉快和失望。当她再爬时，同样的现象反复着。她对母亲说了这滑稽事，母亲用冷淡的态度对待了她，于是她认为自己一定是说了一些令人无法答复的蠢话。波娃也时常浮现以前在学校上体操课时，同男孩拥抱在一起时感到浑身的紧张和不自在，随后，她拒绝上体操课。

波娃也回想到她的表姐马德莱娜。马德莱娜什么书都读，有

一天，当波娃、普佩特与马德莱娜一起玩完一场木球戏时，波娃无意间问她那些书中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被列为禁书。马德莱娜犹豫着，过一会儿又扑哧笑了。她指着她家狗的两腿之间的两个球状物给她们俩看，说："嗯，男人也有同样的东西。"她继续说到，在一本短篇小说集中，她读到过一则故事：一位嫉妒丈夫的女侯爵，在他睡觉时把他的阳物给割掉，他因此死去了。马德莱娜还告诉波娃，孩子是如何出生的。这证实了波娃的怀疑，知道了婴儿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形成的，而不是上帝造的。马德莱娜告诉波娃在一两年后，身体将会发生一些事情，会流血，而且每个月将会流血，在两腿之间必须放置一种像绷带一样的东西。波娃问，人们是否把这种分泌物叫做"红带"。普佩特急于想知道放置了绷带，那么人们怎样小便呢？这个问题难住了马德莱娜，她说她们姐妹是傻瓜，便耸耸肩膀走了。

虽然波娃和普佩特并不感到满足，但马德莱娜的谈话内容还是很使她们激动。从那时起，她们便醉心于讨论类似的话题。埃莱娜姑母没有那么多浓厚的道德观念，于是波娃她们在她面前谈些"不适当的"话题。埃莱娜姑母有时坐在钢琴前，与她们一起合唱本世纪初的歌曲。波娃选些最暧昧的，然后满意地唱："你的酥胸对着我的馋嘴，比树林中的草莓，比我喝的奶都要好……。"男人有可能喝女人的奶吗？这是一项爱的仪式吗？波娃已经洞悉了许多大人的秘密，可她母亲的严肃以及马德莱娜的语气，都似乎暗示着身体本身必定有一个危险的东西，所以一提到和它有关的隐喻，不论严肃的还是轻浮的，似乎都是危险的。

波娃就在惶惑、新奇、不安中进入了青春期，不再追悔童年而开始面向未来。前途的遥远未能使她感到胆怯，相反使她充满欢乐。波娃尽管已读了大量的书，可仍是天鹅般纯洁的姑娘。但有时也遇到令她感到奇怪而恐惧的事。在她大约 16 岁时，一位姑母带她去看一部旅游的影片。当时已经座无虚席，她们只好站在过道上。过了一会儿，她吃惊地发现一只透过她的羊毛大衣而触

摸的手，她疑心有人想偷她的皮包，便把皮包挟在腋下；但是，那只手继续在她身上乱摸，她感到荒谬，不知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所以一直不敢动弹。电影结束了，一位男人一面指着波娃，一面和他身旁的一位朋友张口大笑起来。他们取笑她，为什么呢？她一点也不明白。

在这事发生后不久，她到一个书店里去买书，一个金发、羞怯，穿着一件长而黑的工作服的店员，礼貌地向她询问要什么书。他示意波娃跟他去书店后面。当她走近他时，他解开工作服，露出了他的阳具。他脸上没有表情，一时间波娃感到相当尴尬和狼狈，便转身飞跑。这一荒唐的举止留给波娃对奇异事物的感觉，可能出乎意外地对她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当她一个人在店里或地铁的月台上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时，便会产生恐惧感。

波娃真想了解借着什么机能，两个嘴唇的接触能激起肉欲。当她经常注视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的嘴唇时，就像置身于会致人于死地的地铁轨道中，或在一本危险有害的书本里。马德莱娜的解释时常是古怪的，快感因每个人的口味而定，她的女友妮妮要求她的男朋友搔痒她的脚心。波娃满怀好奇心和烦闷，暗想她的身体是否隐藏着有一天将涌现出无法预料的冲动和激情的源泉。她还没有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接受最简单的体验。她不认为凭一个单纯的接触、一个压挤、一个拥抱，或碰到第一个男士就会使她感动。她也知道会有一天她会晕倒在一个男人的怀中，让一个激情式的爱情证实她的决定。她尊重圣洁的心灵，记忆中仍旧充溢着被玷污的貂皮和被践踏的百合花的影象。若快感不是因为欲望之火而升华，则会变得污秽。另一方面，她爱走极端，要么全部拥有，要么就什么也不要。如果她喜欢一个人的话，那将是终身的，她要用心灵、肉体、头脑完全地去拥抱，拒绝贪取陌生而新鲜的情欲和快感。但她没有可验证这些原则的机会，至少还没有一位诱惑者能使她试图去动摇这些法则。

（四） 我盼望一个男人以他的智慧、文化涵养和权威来征服我

一天晚上，波娃在池塘边读圣弗朗西斯在阿西西生活的故事。她躺在草地上，注视着月亮。它的光芒沐浴着夜露中宛如翁布里亚的美景。她感到惊异，真想捕捉那飞翔着的月亮，用文字把她固定在纸面上。她想，今后她要生活在孤独中，这种孤独不是不名誉的特征，而是一种鹤立鸡群的象征。她心里发誓道："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少女，那就是另一个我，我将把我的经历写成一本含泪的小说。"

波娃很早就决定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智慧的工作。她认为生小孩，对每个女人都有的机会，那是永无止境地重复的烦人的循环，而学者、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则创造出另一个光明快乐的世界，在那儿，一切皆有存在的意义。在那个世界里生活是她所希望的，她下决心要在那个世界获一席之地。当她拒绝承认上帝时，尘世的野心便显露出来了："我必须出人头地。"她躺在小草地上，观察着与她视点等齐的小草的起伏。这些嫩草全是一样的，无声地淹没在小丛林中，这是无知和相当于死亡的冷漠的无限重复。她把视线射向橡树，它独自驾驭景色，没有同类，她将以它为楷模。

波娃为什么要选择写作呢？15岁时，有人就问她："你将来想成为什么？"她立即回答："成为著名的作家。"她已准备好摈弃一切其它的爱好，决定走写作之路。她要成为作家的愿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波娃崇拜作家，他父亲把作家放在学者、哲学家、教授之上，她被作家的名气所降服，他们的名字广泛地被人知晓，而不像一位专家的著作只和少数人有关。

以前，波娃希望成为女教师，那是因为梦想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现在又梦想以文学实现这个誓愿。文学以不朽为她补偿失落

的永恒，上帝不再存在，但可以用文学去点燃许多心灵。在描述以“我”的经历为题材的小说时，会再度创造自己，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存在。波娃对自己和别人都感兴趣；她接受她的“化身”，又不愿抛弃她的一般人性。她计划是成为一个排解一切事物的作家，满足她在过去15年里一直表露出的所有志向。

波娃不打算放弃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好处，拒绝进修道院。她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梦想爱情，毫不厌烦地憧憬婚姻。大人们忧郁黯淡的生活使她害怕，没有任何事情能出其不意地在他们的生活里发生，他们在叹息声中忍受一切已经预先决定好的生活，永远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决定命运。在那个时候，每当波娃展望自己成年后的生活时，一对在草原上嬉戏的情侣的形象便使她不胜欣喜，充满希望。

15岁那年的夏天，波娃看到在小路上有一对情侣在散步，男的手轻轻地放在女的身上。她顿时被感动了，幻想着自己和一只亲切地放在肩上而几乎没有重量的手共同迈向人生。那只手是如此充实，以至于她永远不再感到孤独。她觉得自己同马塞勒的女主角埃莱十分接近，“埃莱，像你这样的女孩，是作为英雄的伴侣而降生的!”这个预言激动着波娃，但是，她发现埃莱最后结婚的对象是个留着胡子的红头发传教士，颇觉失望。波娃对自己未来的丈夫十分清楚：“我必须强烈地爱慕他。否则我将自问：‘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呢?’真正的爱情不允许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盼望有一天，一个男人以他的智慧、文化涵养和权威征服我。如果我遇到比我更完美、和我同类型、而且同我合得来的男人，我才会嫁给他。”她为什么要求他比自己强呢?她并不打算在他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她珍视自己的独立性，将从事写作。她要有自己的生活，从未考虑成为男人的伴侣，而是一对伴侣。

波娃寄希望于她选中的丈夫能够远胜过她，但他们俩之间不会有太大的距离，她不允许自己无法理解他的思想或是不了解他的事业。她设想的情景仿佛登山：“那比我更灵活、更强壮的伴侣

帮我步步攀高。我显得比较贪心而不怎么慷慨，我渴望接受而不是施与。如果我必须拖着一个落后者，我会由于不支而憔悴，在这种情况下，独身比结婚更令人可取。共同的生活必须能促进而不是对抗我的基本计划，我命里注定的男人应该既不比我弱小，也不过分强大，而是应具有相当的卓越来担保我的生存。”在以后的两三年里，波娃的梦想都围绕着上述构想，并赋予它某种既定的重要性。

婚姻，是波娃一个苦恼的问题。成就事业的雄心与婚姻总有一些相悖，生孩子、做贤妻良母似的家庭妇女与波娃的自由天性和渴求权力的欲望是不相容的。有一件事情时常令她沮丧，那便是一个人在20年里喜欢她的父母，她怎能再离开她的父母去跟随一个陌生人，而不感到有如死别一般的痛苦呢？一个人能在一个本来素无情感的男人身边待上20年，而后去日渐培养对他的情感吗？波娃时常认为婚姻是件不愉快的事，尽管看不出婚姻有任何的奴役性，但把不相识的男女撮合到一起使她不快。她恐怖地认为，晚上在床上时，人们甚至无法安静地痛哭一场，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幸事。可她在晚上已经养成了想哭泣的快乐习惯，强迫抑制眼泪，等于拒绝给自己的起码的自由。她喜欢在晚上，独自一人地自我审视、追忆，回想一些感动的事，倾听在大人面前不敢发出的内心独白。假如这份平静的时光被人剥夺的话，会使她特别恼怒的。至少应尽量多的一些时间去逃避对外界的索求，在宁静中自言自语而不受外人干扰。

第二章　圣玛利学院。爱之泪

（一）　我哭了，我喜欢他，17岁，我长大了

自从波娃登上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那天起，她便开始了新的生活。“终于到来了，我现在是个大学生了！”她这样愉快地思忖着，一边又忙着读书。一天晚上，她见到表兄雅克的汽车停在家门口。波娃觉得雅克一点也不自傲，他对世界、人类、绘画、文学，懂得比她多。那天晚上，雅克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但他的声音和微笑里含有太多的亲切，以至后来波娃再看见他就十分欣喜。她狂喜地、泪水盈眶地想到：“我哭了，我喜欢他，17岁，我长大了。”

雅克长得极帅，有一种孩童般和肉感的俊美。波娃在日记中写到：“如果他做出一种温柔的动作时，我立刻会有若有所失的感觉。”她总把雅克当作有点疏离的大哥，因家族血亲之故，她对他的感情像对待天使一样。波娃写到：“在雅克身边，幸福将永远不是一种睡眠。我们的日子富有温情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我们有时肩并肩地迷了路，但永远不失去对方。我把解救之路寄托于内心的宁静，而不是心灵的破碎之中。”

有一天，波娃去看雅克，来到门前，恐惧抓住了她。她好不容易进了门，登上楼梯。雅克微笑地迎接她，并递给她一封信，说道：“我没有把信寄给你，因为我更喜欢把这件事留在心里。”波娃拆开信，信上以“那与你有关吗？”作为题词。他劝告她：“如果更自尊些，更高傲些……要获得幸福和艺术的完善，你就要既像所有人一样，也不像地球上的某个人一样地存在着。”信结尾以

“你愿把我当作你的朋友看待吗?”一个伟大的太阳在波娃心中升起。“那与你有关吗?”已清楚表明，雅克对波娃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他的表白，另外也表明，他不是太喜欢她，不然雅克不会意志消沉。雅克使她回到现实，灯光下的促膝交谈，百合花和玫瑰花是不属于他俩的。他们是太清醒、太苛求了。雅克永远不会放弃对真理的痛苦追求，他处在绝望的尽头，已把绝望转变到厌恶自己的程度，而波娃必须在这种艰辛的道路上追随他。波娃判定到：“她永远不会喜欢另外一个人，而他们之间又是不可能有爱情的。雅克是她的命运。但命运结合一起的理由并不保证带给她幸福。她要在他生命中扮演一个角色，不让他昏睡度日，激励他继续追求。”

几天后，波娃得知雅克又没有通过考试。她去看他，他看起来很沮丧，完全崩溃的样子。波娃想起她15岁时编造的伟大爱情崇拜的幻梦，同对雅克的感情相比，波娃意识到：“不！我不再崇拜他了。”一切崇拜可能是一种欺骗。人们在所有的心灵深处，可能只会找到一个不确定的精灵，而两颗心灵之间唯一可能的联系便是怜悯。

波娃与雅克又一次见面使她陷入新的困惑。他宣称：“有一天我将结婚。”这个短短的句子缠扰着波娃。她无法忍受任何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然而，嫁给他的念头又使她恐怖而厌恶。想到父母热烈地期待这个婚姻时，波娃真想逃跑。她想：“我无法从这个婚姻中看到拯救之路，我看到的是迷失。”就这样，一连几天她生活在恐怖中。

但是，波娃的激动并未平静下来，她不再了解自己。有时，雅克代表一切；有时，什么也不是。她如此惊讶有时对他的怨恨。她自问：“为什么只有在等待、悔恨、怜悯中我才体会出温柔的极大冲动呢？我需要他，但不想看到他。我们的谈话使我泄气，我更喜欢远远地想着他而不是面对面谈论。”

雅克和波娃的家人似乎把他们俩当做订婚者。但事实上雅克的冷淡使人难受！一天，两家人在一起吃饭，雅克一直开着玩笑，

表演着他的心不在焉，波娃迷失在这种虚伪中，半夜里哭了。

（二） 雅克并不想去改变生活，他只想适应生活。而我寻求的是超越

波娃知道他们性格之间存在着极为相反的东西。但她更关切的是：他们未来的生活道路。当雅克提到结婚的那一天，波娃有趣地将他们俩不能结合的因素列了一个清单："享受美丽的人生便能使他满足，他接受奢侈和舒适的生活。我呢，需要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生活，我需要行动，需要尽力为之去实行，我需要去完成一个目标，克服困难完成一部作品。我不是为享受奢侈而活在世上，我无法满足他能满足的东西。"

波娃感觉到，一旦完成婚礼，雅克便会完全和他既想当年轻老板又做一家之主的个性相吻合。实际上，他所期待的是有一天确实地去履行他的身份派定他的角色，他期望婚姻，如同帕斯长期望圣水，为获得他所缺乏的信仰一样。而波娃呢，将会专注于维持一个"封闭的家"，或许这同她个人的渴望并非完全不协调。当她分享雅克的生活时，她将不会对抗他，因为他的虚无主义已感染到她身上。她会拒绝他的虚无主义，但为了取悦他，难道不可以去牺牲一切造成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吗？波娃思虑到："为什么整个冬天，我对雅克的爱情是如此痛苦？"要么他挥霍自己，离她远远的，波娃会感到受创伤；要么他在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寻求中庸之道。她无法在他的混乱中追随他，也不愿和他生活在瞧不起的程序中。他们俩人对传统的价值都没有信心，但波娃已下定决心发现，或是去假定其他的价值。雅克在那些价值外，什么也没有意识到，只不过在虚掷时光和在意志消沉中摇摆不定。他所赞同的智慧便是接受，他并不想去改变生活，他只想适应生活，而波娃寻求的是超越，这一点他们俩人截然不同。

波娃执迷于这一爱情，表现在她的摇摆不定中。她对雅克一

直怀着感人的情意，他长得很英俊，富有魅力；他变幻无常且又真实亲切，不知扰乱过多少人的芳心。波娃的心是不设防的，一个声调、一个注目，便足以激起她眩晕般的感激。雅克的才气不再使她着迷，但他对波娃的信任和他的近乎谦卑感动了波娃。一般眼光有限的青年和自以为是的成年人，都认为他们无所不知。当他们说“我不知道”时，他们永远不把错误归之自身。波娃喜欢且感激雅克对他自己的不确定。无论是年轻的或年老的，波娃不认识任何一个和她可以交流几句话的男人，因此她更加坚信自己和雅克之间的注定命运：“如果雅克不是为我而生的话，那么其他人就更不是为我所生，我就将不得不再回到感伤的孤独中。”

雅克对她说的一切，在她眼里像是一种游戏、缺乏勇气、显得懦弱，但是波娃接着又能从中体会到他话中的真实性。他的怀疑精神显示出他头脑的明晰。实际上，当波娃佯装看不见人类目的悲惨的相对性时，那是由于缺乏勇气，而雅克承认没有一个目标值得努力去完成的道理。他把时间消耗在酒馆里，在那儿躲避绝望或遇上乐事。“我不应指责他的挥霍，而应钦慕他的敢于浪费。他极像蒂雷的那位国王，这位国王喜欢引证，为了获得一个叹息的机会，便毫不犹豫地将最漂亮的金杯扔到海里”。波娃无法做这种程度的讲究，但是她并不因此而不承认这种价值。她让自己相信，有一天雅克会把它写在一部作品中，她知道自己必须有耐心，给雅克信心和时间。这么一来，波娃又艰难地从失望中恢复了热诚。

她觉得使自己这么固执的最主要原因是，除了这种爱情之外，她觉得她的生活是绝望的空虚和荒芜。雅克只代表他一个人，但是在远处想他，他会变成一切——无法拥有的一切。他为波娃带来了欢乐和痛苦。然而，仅是这两种剧烈的情感就足以把深陷于苦恼中的波娃解救出来。

（三） 我喜欢眼泪微灼眼皮的刺痛感。我的哭泣漫长无期

波娃对雅克的爱是她第一次深刻的初恋。她受到雅克虚无主义的侵蚀，又被她自身内在的生命激情所鼓舞。她像树叶一样在风中摇摆。她在追寻人生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又否定存在的意义，期望“存在的贫乏”，患上“新的世纪病”。她认为现实是最无意义的存在，认定人是无希望的绝望，宗教、道德、自我，都是自欺行为。她认为“人最坦白的态度是自我毁灭”。同时她热爱生命，她许下诺言：“被人爱，受人崇拜，社会需要，成为某种人物。”从中确立自身存在价值。她对这一苦闷，不定形的心境是这样剖析和描述的：多么让人丧气！过去的未来即是现在，所有的诺言本来早该兑现。我必须去服务，可是用什么去服务？为谁去服务？我是富裕的——读过很多书，有思想、有知识，而且也准备好了，但是从未有人要求过我什么。过去，我觉得生命的充实，为了回答它那无止境的召唤，我狂热地寻找机会利用生命。但现在我才发现，生活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声音召唤我。我感觉有着把大地扬起又扛在肩上的力量，却找不到一粒可供搬运的小石子。我的觉醒是苦涩的，我的思考比我要做的更多更丰富！摈弃荣誉和幸福是不够的，我甚至不希望我的存在变得更丰富；我不再希冀一切，我正在学习“存在贫乏”的痛苦课程。我的读书乃是为了获得一个职业，但一个职业是一个手段，目的又何在呢？婚姻有什么用呢？养育孩子或批改作业，同样是无用的老套。雅克的话还是有理：何苦呢？人们茫然地安于生活，那不会是我。老师朗贝尔小姐和我母亲一样满足于过死气沉沉的日子，忙碌足以使她们满意。我要有一种能促使我没有时间去忙碌其他事情的力量！但我并没有碰到这种力量。在我的不耐烦中，我把我的特殊情况普遍化——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任何人，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存在。

就这样，波娃在自己身上再度发觉“新的世纪病”，那是马塞尔·阿朗在《新法兰西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所揭示的，它曾经引起很大骚动。文章中写到：我们这一代，不会因上帝的不存在而感到自慰。这一代绝望地发现，在上帝之外，其他的一切只是忙碌。波娃在几个月前读过这篇评论，它引起她的兴趣，并不使她困扰。没有上帝，也生活得很好，如果使用他的名字，那是为了替代在她看来是完善的光辉的一个空虚命名。以往，学大人以玩乐的方式把生活改变成可笑的喜剧时，波娃会气得抽筋。现在，波娃将同样愤怒地拒绝把自己变成上帝的猿猴。她宁愿选择毁灭，而决不去崇拜上帝，即便是坠入地狱。波娃说道：“上帝的眼睛闪烁着存心不良的仁慈，上帝将从我手中夺去大地、生命。我已经能够摆脱他了，这是佳运鸿福。”

然而，波娃不断会感觉到空虚。实际上，她所遭受的痛苦，是被逐出童年的乐园后，又未能在人类中获得一席之地。为了从高处俯视这个尘世，她才置身于“绝对”中。现在，她要付诸行动，去写一本书，表达自己，就必须从高处下来。可是，她的鄙视已经把现实世界化为乌有了，她只感到周围是一遍空无。实际上，波娃是用一种抽象的方式反对抽象的可能性。她得出结论：上帝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她期望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而不是受欺骗，不能把现实和一种无限的期望搞混了。

波娃认为，一个人在不把相对和绝对、失败和胜利搞混的条件下，有权抓住“支撑物”，并依据这种准则去判断他人。对波娃来说，只有那些面对现实中那腐蚀一切的虚无而毫无欺诈的人才够资格存在，其他人并不值得存在。她觉得唯有瓦勒里笔下的泰斯特先生的沉默才值得表达人类彻底的绝望。在上帝不存在的名义下，波娃又产生了一种不是拒绝世俗生活的理想。当然，这一未来的憧憬不再通往任何拯救之道。总之，最坦白的道路，她认为就是自我毁灭。波娃适合这种态度，也崇拜形而上学式的自杀，

然而并不想拿这种方法作为拯救之路，因为她非常恐惧死亡。她单独一人在家时，像15岁时的那次一样抗拒恐惧。她抖着潮湿的双手，不断地喊叫“我迷失了自己，不愿就此死去”。

“死亡”已经在腐蚀波娃的生命。正因为她不愿参加各种活动，时间便被分解成无尽而相继消逝的无数片段。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无尽和片断的“死亡”，便抄写叔本华、巴莱士的佳句和德诺阿耶夫人的诗句。她发觉“死亡”在没有生存的理由时而变得更为可怕。波娃非常热爱生活，哪怕只是芝麻大的事，也足以使她对生活和自己产生信心。当她感到她是有用的或是被人爱时，她的视野便开阔。波娃再度许下诺言：“被人爱、受人崇拜、社会需要、成为某种人物。”她越来越认定她有一大堆的话要说，而且它们也需要她说出来。波娃就在这样矛盾的思绪和彷徨的心境中度着日子。

波娃在满19岁的那一天，在索本大学的图书馆写下了一段冗长的对话，其中有一段是：一个声音道出所有的事物的空虚和乏味；另一个声音肯定生存，虽然是贫乏的生命，但还是美妙的。

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她在丧气和骄傲中度过。但整个秋天和冬天的那个时期，真正抓住波娃内心的，是担心有一天会被生活粉碎而产生的极度恐惧。这些摇摆不定和怀疑的情绪使波娃恐惧、伤感而郁闷，她的心被刺痛。有几天，她在巴黎漫步，几公里步行下来使她疲倦。望着陌生的景色，视线被泪水模糊了。走到肚子饥饿时，便走进一家食品店，吃一块奶油糕点，然后讥讽地吟诵海涅的话：“无论人们为什么掉泪，总是用擤鼻涕作为终结。”当波娃沿着塞纳河畔呜咽时，便用拉福格的诗来安慰自己。那首诗是这样的：

啊，亲爱的，现在是太晚了，我心已憔悴，为悲哀那般心碎，我的哭泣漫长无期。

波娃喜欢眼泪微灼眼皮的刺痛感，但有时候，又失掉了所有为平衡心情而能用的武器。为了能自由地痛哭一场，她躲到教室

内旁侧的幽暗处，把头埋在双手内，那黑漆漆一片的痛苦滋味使她气闷，感到精疲力竭。

（四）　我感到害怕，我孤身一人，我将永远孤单

雅克在一月底回到巴黎，回来的第二天便到波娃家去。为庆祝波娃19岁生日，她父母为她拍了一些照片，雅克向波娃要了一张。他的声音从未有过的富有抚慰的抑扬顿挫。此时，他开始写一本叫《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小说。他对波娃说："我写作是为了你。"接下去的几天，波娃都生活在狂喜中。以后的那个星期，波娃向他谈起自己，叙述她的苦恼和生活的毫无意义。"并不需要过分地去追寻"，雅克严肃地回答了她，"只要得过且过就行。"过了一些时候，他又附加说："必须谦虚地看到，只是孤单一人是无法摆脱困难的，为另外一个人生活是比较容易的。"他笑着对波娃说："解决的途径是两个人一起培养自我。"

波娃开始深思这句话，则她微笑了，她感到不再有任何疑问。"雅克喜欢我，我们将会结婚。"但是有的事情是断然行不通的。波娃的幸福只持续了三天。雅克来她家，他们共度了一个愉快夜晚，雅克走后，波娃垮了下来。她感到害怕："我孤身一人，我将永远孤单……若是我能逃走的话，逃向哪里呢？无论逃向何方，一个大灾难会带走我们。"对雅克来说，结婚肯定是一个目的，波娃不愿这么快就达到目的。以后的一个月，波娃在矛盾中浮沉，她有时说服自己，能够不丧失自己而生活在雅克身边，但恐惧马上攫住了她，把她关闭在另一个人的世界里！她感触到这种爱情将束缚她的自由，她希望破除这种束缚，忘记它，去开始另一种生活……。然而，她没有准备。"我不想牺牲自己，不想牺牲整个自我。"波娃对雅克有爱情的激动，然而，她只有在偶尔和短暂之中使自己承认：他不是为自己而生的。她自己认为："我既不是为爱情，

也不是为幸福而生的。”她在日记里，奇怪地谈到这个态度，好像事实是不可避免和改变的，好像自己是在自由地拒绝或是接受它的到来，她无力修改内容。她说：“我越来越怀疑幸福，越来越不相信和雅克在一起能够快乐。接受幸福和拒绝幸福一样令人沮丧。当我喜欢他时，我最讨厌对他的爱情。”波娃害怕自己的柔情将吸引自己变成雅克的妻子，这种未来的雅克夫人的生活是她自己内心厌恶和拒绝的。

第三章　让-保尔·萨特——命运所赐

雅克像梦影一样在波娃心里消散了，她的情感世界里一片荒芜。没有需要耕种的爱情，既没有人爱她，她也没爱上任何一个人。爱欲之火煎熬着她。她祈求爱神降临到她身边，共同开创未来的旅程。她如此期待着"命中注定的一幕开始"，而命运就真的使让-保尔·萨特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　在乔基酒吧，我浪笑着，渴望燃烧自己，无论什么样的火焰

波娃感到自己好像绝对地失去了一切，最糟糕的是，不能使自己感受到这种痛苦……。她变得迟钝木讷了，心灵被忙碌和当时的梦幻占据着。长久以来使她眷念的许多事物的那种紧张、残酷、狂热的思想和情感，都使她无动于衷了。她是这样的理智，甚至对虚无不再感到那种可怕的恐惧。她抓住一线希望，即使这种状态只是过眼烟云。她多么渴望一种新的情感、新的奇遇，只要是不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行。

酒吧间的诗情画意已经变调了。在国家图书馆或索本度过一天后，再不能忍受房间里的生活。到哪儿去？她徘徊于蒙巴纳斯区。有一天晚上，她和普佩特及另一位女朋友一起到"乔基"对面新开的咖啡屋去。在乔基酒吧，人们请她们喝酒，邀请跳舞。一个被人称为破鞋的女人，一面撩起裙子，一面哼着淫秽的歌。她露出布满淤斑的大腿，叙述她的情夫如何咬她。从某种意义讲，波娃觉得这是十分新鲜有趣的。波娃惊讶地在日记中写道："爵士乐、

放荡的女人、性感的舞蹈、脏话、烈酒及轻抚，我怎么对这些毫不震惊，而是乐意接受！假如换一场合，我是决不能接受的，更谈不上和这些陌生的男人打情骂俏了。我怎么能够毫不惊奇地在这儿接受我在别处无法接受的东西？为什么这种热情对我的影响力是这般巨大？我要在这种具有激荡魅力的场所中追求什么呢？”

几天后，波娃去了“欧洲人”那儿，花了4法郎买了一个阳台上的座位，坐在一些正在接吻搂抱的放荡女人和男人中间。一个油头粉面的歌手一面唱歌，一面用浪笑表现轻佻的戏谑，一些香味扑鼻的女人对他却五体投地。波娃也激奋起来，她浪笑着，感到快乐。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在大街上徘徊许久，不再用恐惧的眼光，而几乎是羡慕地注视妓女和流氓。她再度对自己感到吃惊：“我身上存在一种莫名的对声音、搏斗、野蛮，尤其是下流社会的可怕欲望。……现在，什么能阻止我成为吸毒者、酗酒者，上帝知道吗？可能是一切都仅仅缺少机会，缺少对我未知一切的更多一点的可怕的饥渴……”。也有些时候，波娃会为这种堕落、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低级本能所震惊。她强烈地指责自己的两重性虚伪。但她并不否认自身的天性，她想要生活，想要获得整个生活。她感到了一种欲望的好奇，贪婪地想要比其他人更加炽烈地燃烧自己，甚至不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火焰。

她几乎要对自己承认这样的事实：厌倦了脱离肉体的精神。她不再像青春期前夕那样饱受欲望的折磨，但是她猜测肉体的暴力和野性或许可以使自己从枯乏无味的生活中得到解救。她绝不允许自己沉沦于性体验之中，她自己的偏见，还有对雅克的感情，禁止他这样做。她厌恶罗马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她已经摆脱了这只魔手，然而事实上她仍为此而困惑。性的禁忌在她的精神中作祟不断，以致使她产生成为吸毒者或酗酒者的渴望。即便是这样，波娃也从未有过那么一个时刻，期望得到性的放纵。

（二） “波娃，你是一只海狸”。初识萨特，“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复活节假期结束了。在高等师范学院开满了百合、金莲花、红山茶的校园中，波娃很高兴能再次置身于同学中，她几乎全都认识他们。只是萨特、尼桑、埃尔博这三人小组使她感到神秘。他们不和任何人来往，只上些选修课。他们的声誉不太好。据说他们没有同情心。他们遭到同学中一个叫“神圣的威廉”组织的激烈反对，这个组织素以粗暴闻名。尼桑已经结过婚，也有过旅行的经历。他故意穿着运动长裤，在他的玳瑁镜框的厚镜片后面，波娃觉得他的目光十分吓人。萨特的风度不错，但据说他是他们三位中最可怕的一位，还有人指责他酗酒。唯一使波娃觉得可以接近的是埃尔博，他也结了婚。当他和萨特、尼桑在一起时，他就不理波娃。若是单独碰到她，却总是和她搭讪几句。

埃尔博在波娃觉得，不像其他朋友，别人的面孔都那么有理性，以致变得不实在。要把埃尔博的脸缩小为一种象征是不可能的，突出的下颚、纯真的微笑以及使人敬畏的肌肉、骨骼、皮肤，便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外，还有比他面孔更富有内容的东西；他有着特殊的体魄。在青翠的树丛下，他向波娃说他是多么讨厌死亡，他决不向疾病和年迈屈服。波娃充满感叹地注视着他有点笨拙地大步跨过花园，在阳光下显得透明的耳朵很像粉红色糖果。这使波娃觉得挨在她身边的不是位天使，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厌倦了神圣、纯洁，她高兴他把自己当作人间的创造物，因为他对波娃的心灵不感兴趣；他喜欢波娃也不是基于对波娃的优点的估价，而是自发的，不求代价的，完全地接纳。而波娃看到其他人总是谦虚地，不然便是严肃地、敬而远之地和自己说话。当埃尔博和波娃说话时，他朝她微笑，用胳膊挽着她，并习惯地用手指在她身上敲着。他用嘲笑的口吻叫她“我可怜的年轻朋友！”

他对波娃身上的东西作出许多评价，善意的又是讽刺的，常常又是出其不意的。

波娃越来越喜欢他，尤其是通过他，波娃也越发喜欢自己了。当他们一起走出图书馆时，他快乐地说："你走得好快呀！我喜欢这样，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你那嘶哑好玩的声音很好听"。有天他对波娃说："你的声音使我和萨特觉得很舒服。"这使波娃逐渐发现自己有一种有魅力的声音，这于她是件新鲜事，她开始注意服饰。有一天下午，他们在皇家花园，埃尔博迷惑地告诉波娃："我们的关系很奇怪。至少对我来说，我从未有过女性的友谊。""这可能是因为我很不女性化的缘故，你以为呢？"她以故意取悦的样子笑着："不！那是因为你很容易接受许多事物，人们很快就能和你处于平等的地位。"开始，他拘泥地称波娃"小姐"。有一天他用大写在波娃的记事本上写着：波娃等于海狸。"你是一只海狸"，他说，"海狸总是成群出游，它们具有建设的性格。"

当波娃走进萨特房间时，她有些惊慌失措。到处都堆着书，每个角落都有烟蒂，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烟雾。萨特用一种老于世故的姿态招呼波娃，嘴里斜叼着烟斗。一言不发的尼桑，嘴角也叼一支烟，并透过他那厚厚的镜片嘲弄地盯着波娃，若有所思而不愿开口说话。一整天，波娃因胆怯而常常发呆，有时在讨论问题时，她机械的解释"形而上学的命题"。直到晚上，埃尔博带她回了家。

后来她每天都去那儿，不久便开始不拘束了。萨特向大家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波娃感觉到，对所有作家和他们的论述及思想，萨特都比别人懂得多，聚会的人更多的是听他讲。有时候，波娃曾想和他争论，并绞尽脑汁，寻找反对他的观点的理由。"她是一个狡猾的小猫！"埃尔博总是笑着说。但萨特总是占她上风。要让萨特感到被困扰那是不可能的，他总是利用他的知识来驳倒你。"他是一个杰出的知识传授者，"波

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的聚会常常是长时间的，但萨特不计代价地花费他的时间。

学校进行笔试的那一天，波娃走向索本大学。她的心焦虑得狂跳，怕通不过这次笔试。在大门口碰上萨特，表露了她的焦虑，萨特热情地鼓励她。最后，波娃、尼桑和萨特都通过了笔试，但埃尔博没有通过。正是在那个晚上，埃尔博离开了巴黎，没有来向波娃告别。他写给萨特一封快信，告诉萨特他走了，并写道："给海狸最良好的祝愿，祝她幸福。"

"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当萨特把波娃通过笔试的消息告诉波娃时，他这么说道。萨特对女性的友谊很有兴趣。波娃第一次在索本大学看见他时，他戴着顶帽子，兴致勃勃地跟一个相貌丑陋、个头高大的女学生交谈。不久他就讨厌她了，又跟另一位长得相当漂亮的女学生交上了朋友。但那位女学生显得盛气凌人，不久俩人就吵翻了。当埃尔博向萨特介绍波娃时，萨特很高兴，并很快结成友谊。对波娃来说，她渐渐觉到，没有陪萨特度过的时间都是浪费了的。在口试的那半个月里，除了睡觉之外，他们几乎没有离开过。

（三） 萨特——自由的精灵

萨特是一个非常奇特而有趣的人，简直就是"自由的精灵"。他很庆幸他父亲在他只有二岁时去世。他在《文字生涯》中写到："我父亲，让-巴蒂斯特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锁链，却给了我自由。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请不要责备男人，而是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幸亏他短命早死。我生活在背负安希斯们的埃内们中间，从苦海的此岸到彼岸，孤苦伶仃，所以憎恨了一辈子无形

地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没来得及成为我父亲的年青死者，要是他现在复活了，可以当我的儿子。父亲早死是坏事还是好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乐意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自我。”

萨特希望自己像一个大人物那样度过他的青年时代。他说：“我很清楚自己是青年的萨特，正像人们所说的青年柏辽兹和青年歌德一样。”他认为，大人物应不受任何约束。歌德对一代人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几乎成了自由人的形象，因为他反对一切，家庭、教会、党派、民族主义、教条主义、礼仪、权力和狂热崇拜。

萨特生性挥霍。自孩提起，他就从母亲的手提包里拿钱给同学买礼物。他一生中都毫不吝啬地给予，他喜欢口袋里总是装满大捆钞票。波娃常抱怨萨特付账的当儿拿出的钱太多。萨特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解释道：“我不是阔佬。我以为，如果说我喜欢身上带许多钱，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我对待其他东西的方式相适应的。我喜欢周围有我自己的家具，喜欢穿日常衣服，几乎老穿同一件衣服，喜欢带着我的眼镜，打火机，烟盒……我的想法是要随身带着尽可能多的能够确定我毕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带着能在此时此刻代表我的日常生活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我想在眼前这个时刻完全是我是的那个样子，不依赖任何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什么，能够立即调用我的全部可能性。这种想法代表某种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方式，这样想当然是错的，我十分明白这一点。”当他谈及自己与金钱的关系时说：“我喜欢金钱的一种消失性，我喜欢看到它从我的指缝间流逝，然而，不该用一种坚硬而舒适的东西代替它，要让它像火焰一样花掉而难以被人抓住。凡我所到之处，都要以我花钱的方式引起人们议论纷纷，而这就是那样最慷慨的人的生活方式。”

埃尔博曾对波娃说：“萨特从不停止思考。”这并不意味他时刻散布公式和理论。他轻视麻木不仁，醉生梦死，逃跑主义，巧

为开脱，缴械停战，小心谨慎和崇拜偶像。他对一切事情都有兴趣，而从不认为任何事情都理所当然。而对一个客体，他从不利用一个神话，一个词句，一个印象，一个成见去解释它，而是直瞪瞪地盯住它不放，直到他已抓住了它的所有内外原因和多重意义后，他才会松懈。他从不关心应该如何去思考，怎样思考才有意思，怎样思考才是明智的。他只想到要思考。因此，他对那些渴望构筑过时的精巧体系的美学家感到失望。他从不陷入顺从的陷阱，他那固执纯真的注意力掌握着事情最丰富的本质要点，与他这种丰富多彩的宇宙比起来，波娃觉得“我的小世界是何等狭窄呵！以后，只有某些疯子才会使我产生同样谦卑的感觉。”

波娃与萨特无所不谈，而最为感兴趣的是谈自己。波娃说道：“当其他人希望对我解释时，他们把我附加到他们的世界中，这使我恼怒。萨特正好与他们相反，他试着把我放在我自己的系统中。他显然了解我的价值和计划。”像波娃这样被教养大的女子，要躲避婚姻恐怕是难的，但是，提到婚姻，萨特没有一句赞词。总之，波娃想要保留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好奇心以及想成为作家的决心。萨特不仅鼓励她朝这个方向去做，而且提议助她一臂之力。比她大两岁的萨特，早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一切事情也懂得比她多。

萨特决心不走入职业文学者的生活。他讨厌形式主义、文学运动、人的生涯、权利和责任以及生活中所有严肃的一面。一想到要有一个职业、同事、上司、服从和强制的规则时，他便难以忍受。他将永远不会成为父亲，他也决不会成为一个已婚者。他受到当时浪漫主义和自己23岁年龄的影响，梦想去远处旅行，想在君士坦丁堡和装卸工人打成一片，或在不良场所和拉皮条者或妓女喝得酩酊大醉；他将周游世界，印度的流浪者、希腊圣山上的教士和纽芬兰的渔夫对他都没什么神秘感。他不在任何一个地方落地生根，也不受任何占有物的阻碍，但他不仅仅是为了保持他的行动自由，而是为了证明一切占有物是多么不需要。他的所

有经验都有益于他的写作，他无条件地疏远一切会使他的作品受到毁损。不论怎样，至少在理论上波娃是赞赏感觉的系统紊乱、危险的生活、失落的灵魂以及所有对烈酒、麻醉品和性的超越。萨特坚持认为，当一个人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告诉这个世界时，把他的精力浪费在其他工作上面，那是犯罪。文学艺术作品在他眼里是它本身的绝对目的，目的本身无疑会有它存在的理由的，他深信整个宇宙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兴趣，而对所有不着边际的争论不屑一顾。年青时，他更多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他认为社会就其本质来说是讨厌的，但是他并不强烈地憎恨它。他认为，如果写书没有什么东西可供破坏和攻击的话，那将没有任何价值。

萨特与波娃的人生态度极为相似。他的雄心一点也不俗气，他想在文学中寻求拯救之道。在这个世界里，书籍提供了一个增进作者信誉的需要。他说了某些事情，因此，他将对他所表达的东西予以证实。无论何时听到萨克斯管的乐曲，喝了三杯马丁尼酒，他都能以足够的年轻感觉去动情地体会他的未知命运。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他将愿意一直默默无闻。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思想超越一切，而不在意个人的成功。他从不自称是什么人物，具有什么价值，具有什么社会地位。但他相信重要的真理呈现在他的面前，他有把它传播于世的责任。他说：人类理性的矛盾在于人的要务是创造必要条件，而人又不能够把自己提到某一种存在的水准之上，这如同那些算命先生一样，他能预卜他人的命运，而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推算。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的根本处——正如在自然的根本处一样，只能看见痛苦和烦恼的原因。那并不是说人类没有把自己作为一种存在来思考，恰相反，它竭尽全力来使自己成为一种存在。于是，从那儿产生了善和恶以及人类为了改善自身的思想。但是，这些概念没有用。那些用奇特的方法企图去综合生存和存在的决定论也是毫无意义的。至于其他权力意志、行为和生活只是无用的意识形态。没有诸如权力意志

之类的东西。一切都太软弱了：所有事物都趋向死亡。冒险，即对环境和种种事件的偶然而不可避免的联系的盲目信念——都是一种欺骗。在这个意义上，"冒险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论者，而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完全自由的。以他的时代和上一代比较，萨特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比上一代更不幸，而有幸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萨特的"偶然性理论"极富涵义，在那里能找到所有他关于存在、生存、需要和自由的思想种子。他喜爱司汤达和斯宾诺莎，拒绝把哲学与文学分开。在他看来，偶然性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实际范畴。利用一切艺术资源，使人类的心灵能了解到艺术，能觉察到人类和环绕它的世界的隐晦弱点，这是大为需要的。总之，任何轻易的成功都不会使他对将来轻率地寄托信心。他知道他想干什么，生活展现在他面前，他最终将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波娃没有一刻怀疑，他的健康体魄和愉快心情将使他通过每一个严峻考验。很明显，他的自信产生如此坚定的决心，以致有一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成功。

（四） 萨特完全符合我15岁时渴求的梦中伴侣

波娃第一次感到生活中在智慧上低人一等。她现在每天都和萨特较量，但在讨论中她达不到萨特那个层次。在与萨特的讨论中，波娃认识到她的许多观点仅仅建立在偏见、不真诚或是仓猝形成的概念上，以致理由不足，观点站不住脚。她困窘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不再确信我所想的，也不能说我都思考过了。我一点自信心也没有了。我十分好奇，但不自傲。我比较喜欢学习，但不爱出风头。不过，经过许多年的高傲孤独后，我发现自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不过是许多人中间的一个，而决不是第一个。我突然无法确定自己的真正的能力，这真非同小可。"萨特不是唯一

迫使她谦虚的一位，波娃还认为尼桑以及波利契尔等人都远远胜过她。他们熟悉一大堆她不知道的新鲜事物，他们也习惯于讨论，而她缺少方法和方向。对她来说，理性世界是一个暗中摸索思想的大杂烩，而他们的追求大多有明确的方向。他们之间有重要思想的分歧，但总能获得结果。比如，他们认为上帝不存在，比波娃更彻底，而且把哲学从天上引到尘世来。他们使她敬畏的是，他们对将来要写的书都有详细的主意，而她则迷迷糊糊地宣称："我要叙述一切!"那是太多也是太少了。但是，她并不灰心丧气，她突然感到前途比她估计到的还要困难。但它也变得比较真实，比较确定。波娃看不见不确定的可能性了，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清晰的活动领域，包括一切问题：艰苦的工作、物质条件、仪器设备以及各种阻力曲折。她不再询问自己："我应该做什么?"一切事情都等着她去做，一切事情她从前都希望做：抨击错误的东西，寻求真理，向世界叙述它，阐述它。为了坚持到底，她需要时间和努力。"如果它意味着只保持我所作出的诺言的一小部分的话，但是那并不使我害怕。一切都还没有着手，但一切又都是有希望完成的。"

波娃似乎看到了另一片期盼已久的天地，"我突然不必独自一人面向未来了。真到那时，我所喜欢的男人——雅克，还有差强人意的埃尔博同我都不属于同一类。他们是孤立的、易变的、言行相当不连贯，具有一种不祥的魅力，要毫无保留地和他们打交道是不可能的。萨特完全符合我 15 岁时渴求的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爱好变得愈加强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分享一切。当我在 8 月初要离开他时，我知道他绝不会走出我的生活。

（五） 扎扎之死

波娃在她的《回忆录》的第四卷《清算已毕》中写到："我很

佩服表哥雅克，也对他心存爱慕之意，但他在我童年没有充当什么重要角色。就我个人而言，头一个至关重要的机遇是扎扎出现在德西尔学校，这是在我10岁多时发生的。”正是与扎扎的友谊，波娃的童年才感到粲然生辉。波娃一遇到扎扎就认识到了她的重要。扎扎大方、活泼，波娃在扎扎不同于自己的所有之处都羡慕她。通过扎扎，她体验到爱的欢愉以及交流知识和一天天地维系紧密关系的乐趣。扎扎也教波娃懂得了独立和自信。

扎扎对波娃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波娃在《回忆录》中说："没有扎扎，我的青年和少女时代将会多么灰暗、多么惨淡、多么孤寂！她是我同书籍世界以外的生活之间唯一的愉快联系。如果没有她，我在20岁时会变成一个多疑、刻薄的少女，而不会打定主意迎接爱情和友谊的来临。”正因对扎扎的友情深植在波娃的心中，扎扎异乎寻常地影响渗透了波娃，因而，扎扎的死才给波娃以霹雳般的重击，以致于波娃一生都深深缠绕着一种令人颤栗的、恐惧的、冰寒般的虚无感。当她每次遭受死亡的吞噬时，扎扎就像遥远的天国之风，呼唤着她。扎扎的死就像一把匕首永久地刺扎在波娃的内心里。

扎扎虽死于粟粒疹，但更多的是来自宗教、伦理道德对她的爱情给予的打击。

在她们结成深厚友谊的一段时期里，波娃把莫里斯·梅劳-庞蒂介绍给了扎扎，并发现他们之间很快建立了一种谨慎的友爱关系。他们常常说笑、戏弄被他们称为“非道德的妇人”的西蒙·波娃。

扎扎的一封长信使波娃不知所措。扎扎告诉波娃，她母亲决定把她嫁给由她母亲选中的求婚者，并极力强迫扎扎同意其选择。扎扎宣称她没有爱情决不结婚。她母亲，勒太太反驳说是由男人来爱妻子。她的一个姨妈前来救援，说神圣的婚姻必然能引起妻子的爱情。随后，事情渐趋平静。扎扎给波娃描述莫里斯·梅劳-庞蒂的信给她带来的欢乐。她说："生活是美好的！"但是不久，莫

里斯对扎扎的态度突然变得暧昧起来，使扎扎失望了。她不理解莫里斯到底想些什么？他的爱情值得她等上两年吗？扎扎像迷途的羊羔一样。扎扎只好向一直禁止她跟莫里斯通信的母亲求教。母亲向女儿断言，事情很明确，莫里斯没有娶扎扎的诚意。

扎扎请求波娃帮助她。她给波娃寄来了莫里斯最后一封信的几段，其中的缄默和请求原谅的表示引起扎扎深深的不安。

波娃很担心，她找到莫里斯，问他是否还爱着扎扎。他爱她。波娃又问莫里斯是否拒绝同扎扎结婚？莫里斯否认了。既然如此，莫里斯就该去向怀疑其诚意的勒家求婚。但他拒绝了。波娃朝他大发脾气，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爱扎扎，但必须等待。

每个人似乎都掌握各自的真理，一些人的真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又不是真理。波娃终于了解到勒家反对莫里斯与扎扎婚姻的原因。莫里斯的家庭成员是不信教的非教徒，莫里斯又是海军军官的儿子、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名出色的学生。但是，勒家不喜欢知识分子，不喜欢非教会的人、外国人和师范学校及军官家庭出身的人。而当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被称之为现代派的学校，他们担心一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会把女儿带进现代意识形态的泥潭。然而，莫里斯没有一点现代派革命者的样子，他一度在索莱姆修道院隐居，并且恢复了童年时曾信仰的天主教。

但愿扎扎把这些能理智地、一清二楚地向母亲解释，但愿误会冰释。

然而，勒家和梅劳-庞蒂都固执已见。这一故作风雅的悲剧令人费解。失望正吞噬着扎扎的心。波娃试图解救她。在每个人都如此执拗的情节剧中，仿佛所有的人都被不可言喻的想法折磨着，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波娃提出了另外的解决办法：让莫里斯什么都不要给他母亲讲。到勒家秘密求婚，等莫里斯服完军役后再举行仪式。这就需要莫里斯表示爱情！勒太太厌烦经常看到波娃参与此事，阻止她再到贝利街去。

勒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让扎扎到德国去住一年，然

后再走着瞧。在此期间，他们不再对扎扎严加禁止，并允许扎扎在贝利街与莫里斯相见。他该来的那天，扎扎“最终”收到一封莫里斯的信，说他的叔叔刚刚去世，他的悲哀同与她的重逢的欢乐是不相容的。然后，他又推迟了下次会面，因为他哥哥刚刚启程了，莫里斯写信让扎扎相信他的感情。扎扎越来越垂头丧气，波娃试图促使她抗争，但看来什么都没能打动她，她宽恕了所有的人。

波娃最后一次见到扎扎是在走出国家图书馆的时候，她发现扎扎兴高采烈、非常乐观。她买东西，拖着波娃，谈论她重新发现的书籍和刚刚理解到其强烈程度的爱情。

然而，扎扎的乐观是虚假的，莫里斯并没有把热情给予她。

扎扎精神开始崩溃，以致神经错乱。有一天，当莫里斯的母亲独自一人在家时，有人按响了门铃。莫里斯的母亲打开门，发现一个穿着讲究但没戴帽子的年轻小姐站在那儿。在那个时候，不戴帽子是衣冠不整的。“你是莫里斯的母亲吗？”那年轻的女人问，“我可以和你谈谈吗？”她自我介绍以后，莫里斯的母亲把她让进屋子。这位年轻的小姐就是扎扎。扎扎进屋后环顾四周，她的脸色苍白，只有脸颊有点红。“莫里斯不在家吗？”她问，“他为什么不在这儿？他已经上天堂了吗？”莫里斯的母亲害怕她的神经错乱，于是告诉她，他一会儿就回来。“你恨我吗，太太？”扎扎又问。莫里斯的母亲当然说不。“那么你为什么不同意让我们结婚？”莫里斯的母亲尽力让她平静下来。莫里斯回来了。莫里斯进来一会儿后，她稍微清醒了一些，但是，她的前额和手发烫。“我想送你回家，”他告诉她。他们要了一辆出租车，当他们在路上时，她用责备的口气要求他：“你不能吻我一下吗？你为什么从来不吻我？”他吻了她。

回到扎扎的家，他们将她放置在床上，并去叫医生。勒太太和莫里斯作了一次长谈。扎扎的现状使勒太太不想造成女儿的不幸，她不反对他们的婚姻。莫里斯的母亲也极不愿给任何人造成

不幸福，她也不反对扎扎和莫里斯的婚姻了。

但是，扎扎的病已入膏肓。

波娃收到了扎扎家里的来信，说扎扎已病得很重。现在已送到叫圣克蒂德的诊所。

在圣克蒂德诊所，扎扎一直在高烧的迷糊中叫着："我的小提琴，莫里斯、西蒙、香槟酒。"

扎扎的母亲陪她度过了最后一晚。扎扎认出了她，并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要为我哭泣，亲爱的妈妈，"她说，"所有家庭都有被遗弃的人，我就是我们家被遗弃者。"

波娃在诊所的小教堂里看见扎扎躺在一个被蜡烛和花朵环绕着的棺材中。她穿着一件粗布睡衣。她的头发太长了，僵硬地披散在一张特别瘦削、几乎让波娃认不出的蜡黄的脸上。一双有着苍白的长指甲的手，交叉握着十字架，就像一个古代木乃伊的双手一样脆弱。勒太太抽泣不止，"我们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

医生们认为她患的是脑膜炎，或是脑炎；没有一个人能绝对肯定。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还是一个意外事故？或是因为过度的疲劳和焦虑而被压垮了？

扎扎经常晚上出现在波娃的眼前。那一张在粉色遮阳无檐女帽下发黄的脸，似乎一直责备地盯着波娃。她们曾一起战斗，反抗摆在她们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波娃一直相信，因为扎扎的死，她获得了自由。因为，波娃认识到人的存在是短暂虚无的，人应自由自在地活着，挣脱神圣的教义。扎扎的死，更加使波娃坚信上帝的不存在。只有自由才是唯一和真正的。人是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来成为自己的。这种意识起初在波娃那里还是朦胧的，可而后促使她成为了存在主义者，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第四章　自己的路

自由，是萨特的天性，也是波娃的天性。两个自由的精灵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他们自由的生活。波娃从孩提时就抗议大人们的管束。14岁时，就反叛基督教义，神父，并抛弃了上帝。扎扎的死，更促使她离开上帝，去获得自由。波娃像是倾听到她的使命，要在世间成就什么事业，要出人头地，用写作点燃许多心灵。写作，正是她要自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她实现自己欲望的途径。她不想结婚，更不想有孩子。她不想让婚姻来压制自己的情感，束缚她的自由。爱情，应是自由的欢愉，是激情、是火焰！而不是家庭的责任、义务和狭隘的缠绕。为什么要让社会的伦理来压抑自己的情感，去屈从外加的限定，而不是实现自己的意愿呢？做爱的快乐难道不应像大海的波涛和桃树开花那样不可抗拒和不可预示吗？生命中的爱欲若不被时时激起，那生命不是太单调乏味了吗？

波娃与萨特是完全契合的，爱情并非需要婚姻这根绳将两个蚂蚱拴在一起。于是，波娃与萨特签订了一个协议，爱情基于双方同意的规则，完全是两个人自由选定的事，而毋须社会伦理规范的限定。他们俩人的结合方式、爱情的生活方式，为西方社会开创了一个格调，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语言交流，植根于两个自由心灵的深深理解，因而有着牢不可破根基。他们共同演奏了本世纪的爱情“绝唱”。

（一） 我们以写作的方式投身于人的改造。自由就是我们存在的所在

萨特为写作而活着，肩负着就任何问题进行滔滔不绝的演讲任务。波娃也必须写作，以便随时捕捉这转瞬即逝的生活。他们正接近于康德的乐观主义，即“你应该表达你所能够表达的。”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整个世界，反对所处的社会，表达他们浓郁的乐观主义。人是要不断改造的，而改造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现在做的事。他们厌恶公共事务，因此，他们以写作，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投身于人的改造。

波娃与萨特当时在许多方面都没能掂量出现实的分量，反而陶醉于“激进的自由”中。他们陷入得如此之深，以致于他们都感到有必要重新估价“自由”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着自由，但是，每一个领域的自由却有它自己的含义。特别是在知识领域，更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它很少重复自身。他们一直在努力探索，获得了对自由本质的、实际的、直观的认识。波娃认为：“我们过去的过失在于没有把自由的概念置于一个恰当的范畴之内。我们依附着康德的思想，这是一种逆水行舟的思想。我们把现实作为我们共同探索的原始素材，而不是把它作为束缚我们自己手脚的因素。我们把自己视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力量。我们思想上的这种自大，就如同我们政治上的盲目一样，从我们所表现出的认识方式上的偏激方式中就可以一目了然地得到证实。我们没有外界的限制，也没有压倒一切的权势，更没有被强加的存在模式。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自由就是我们存在的实质所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以独自幻想的方式赋予他们的存在以一定的活动范畴，这种方式对他们生活的、对自由的要求至关重要。他们全身心地热情拥抱这种追求，他们所虚构的滑稽作品、寓言和传说，都具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目标，它们阻止

他们对自己过于认真，而他们对“严肃认真”的反对态度比尼采还要强烈。基于此原因，他们以玩笑将世界投射到想象的范围中。波娃说：“这种玩笑照亮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最终使我们疏远了这个世界。”

在他们的整个青年时期，甚至在后来，每当他们陷入困境或令人不快的境遇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戏剧般地巧妙地摆脱这种困境。他们把种种困境颠倒过来，加以夸张和讽刺，从各个角度探索摆脱困境的方法。这种摆脱困境的方法使他们获益匪浅。他们也将这种方法沿用于家庭生活中。在他们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前就给他们的关系下了定义，即是一种上层社会男子与下层社会女子之间的婚姻。作为一种夫妻，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妻子谦虚朴实，易满足，不很富裕，丈夫则是一个公务员；另一方面，波娃有时会精心打扮一番，和萨特一起去香榭丽舍的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去穹顶咖啡店跳舞。这样，他们则成了美国的百万富翁和他的妻子——摩根先生和太太。这不是在开一种歇斯底里的玩笑，也不是为了体验性地享受几个钟头富豪的清福，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滑稽的模仿，以证实他们对上层社会的蔑视。实际上，他们这种朴实的自寻其乐的方式使他们心满意足，没有什么比这种方式更使他们感到幸运的了。

波娃和萨特在日常活动或在其他人当中，他们的职业是教师，他们将此也看作为一场化装舞会，以此来摆脱现实对他们生活的压力。幻想则使他们确信生活本身并不能捆住他们的手脚，他们不属于哪个地方或国家，不属于哪个阶级或职业，也不属于哪一代人。历史会表明他们什么也不属于，仅仅是作家而已，其他任何判断都是错误的。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所依恋的写作之中，摆脱了与写作这一中心目标没有关系的所有道义的束缚。他们并没有因为要摆脱诸如此类的道义准则就走得很远，尽管他们对此也非常渴求，但他们将这些道义的准则视为一个乐章中的小小插曲。客观环境允许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时间以

及一定程度的自由散漫。将写作与至高无上的自由糅合在一起则是极为令人感兴趣的事。

（二） 他们厌恶婚姻。“我们签订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

波娃已经彻底地与自己过去决裂，永远地建立了自己的独立，而萨特进入了成年人的发展阶段，他或多或少地承担起了成年人的责任。进入了他所憎恶的成人世界，他的独立也因此受到了威胁。首先，他被迫服兵役18个月，其次是退役后的教学生涯。在萨特看来，作家都应像辛格作品中的人物，生活的如花花公子那样，而不应在一地永远扎根或者与某一个人厮守一辈子。萨特喜欢成为女人的伙伴。23岁时，他就不打算拒绝接受各种各样女人的诱惑。他用他喜欢的术语向波娃解释了这个问题。“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一件乐事。”波娃与萨特两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枯竭。这种持久的关系并不能代替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所得到的那种转眼即逝的快乐。他们这种反宗教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特别是激起了青年人的拥护和追随。西方的性爱自由由此更为扩展和形成无视道德的社会风气。然而，波娃和萨特并不在意这些，他们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

一天下午，他们俩去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电影散场后，萨特开口对波娃说道：“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这个协议是在这两年里，他们俩在一起以最亲密的方式一同消磨时间。两年过后，萨特建议波娃在国外找个工作。他们可以两地分居两三年，然后在其他地方，或多或少地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可以使他们彼此永不陌生，谁也用不着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割断这条连接他们俩的纽带。同时萨特又强调决不能

把这断断续续的同居生活庸俗地视为一种义务或习惯，应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向这方面堕落。对萨特的建议，波娃完全赞同。虽然，当时她确实有一种恐惧感，并全力克服它。她相信萨特是有言必果的人，凡他提出的建议都不是含糊其辞的空谈，而是付诸实践的前兆。波娃说："即使有那么一天，他约我 22 个月后的一天下午 5 点钟在某城会面，我也完全相信他能准时无误、不差分秒地在那里等着我。他绝不会做任何有害于我的事情，除了他先于我辞世而给我造成的精神痛苦。"

在这两年的"协议"期间，毫无疑问，他们将充分地根据"协议"有权享有"自由"。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毫无保留地将他们自己奉献给这种新型关系。后来，他们又达成了另一个协议：双方不仅不应互相欺骗，而且不应相互隐瞒。由于波娃习惯于自我克制，一开始他们这种默契对她有些困难，不久她就认识到它的有利因素，她不再自我担心，她的所做所为受到了充满善意的监督。最终她得到了她所要得到的。孤独寂寞容易使人产生恐惧、虚妄、多虑、幻想以及脑中会突然闪现怪念头，而这种善意监督的方式则使她免于产生那些现象。

对波娃说来，萨特的思想是一部公开的读物，对它的理解犹如了解自己的心一样，这使她感到轻松自如。波娃说道："我加深了对萨特的理解，因为他对我无所不谈，我认为我丝毫没有必要为他杞人忧天。我们离不开这一默契，也没有什么能比它更适合我们的相互交往。这并不是说，在我的观念中，诚实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来看，不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灵药。不过自那以后，我经常有机会思考诚实的好处和坏处，我在《一代名流中》，也阐述了诚实的危险性。"

波娃与萨特经常在一起研讨这个问题。萨特在《理智之年》中谈到马蒂厄和马赛勒装作彼此"无话不谈"，但实际上却回避了所有严肃的话题，有时，言辞只是一种空谈的方式而已，一种比沉默更简洁的方式。即使言辞处在能传递信息的场合，但它也缺乏

隐瞒、歪曲和否认事实的能力，言辞的作用仅是证实现实。假如有那么两个人，他们极力证实自己对那些形成他们彼此信任的事或人具有威力，那么他们是在欺骗自己，他们的"诚实"也仅仅是托辞而已。有一种诚实是我经常见到的，而且也是事实上最为露骨的虚伪：诚实被限制于性关系的范畴，而诚实的目的并不是在于男女之间的内在理解，而是为两人中的一人——通常是男配偶——提供安慰性的托辞。他幻想着以承认对妻子的不忠的方式来挽回过失，而实际上给妻子增加了成倍的痛苦。"所有的夫妻都希望彼此能真正地相互理解，却没有固定模式能保证他们这一愿望的实现。而要实现这一愿望，则取决于当事人想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他们并没有先验的权利和义务"。

自然，波娃是非常理解萨特的这个"诚实"，因为萨特的"诚实"是不限制自由。因此，波娃和萨特的这种"诚实"的"自由"，已超越当时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特别是男女之间的道德规范，也无可挽回地造成当今西方的社会生活的许多弊端。

（三） 我愉快地放弃了我的童贞。做爱的快乐应像大海的波涛和桃树开花一样不可抗拒和不可预示

波娃在她青春期时，由肉体带来的情欲困扰着她。她感受到人遭受着那动物本能的暗算和残忍的侵害。人的理智与情欲相互厮斗。道德和欲望能否和谐相处？人是否能在精神和肉体之间找到平衡点？波娃那骚动的青春和生命欲火向她的理性诉说着本能的肉体语言。情欲是对自由的最大危害者，也是她丰富多彩的人生之源泉。她生活中迷人的魅力和写作的狂热正是从她情欲里诞生出来的生命之花。她一生之中时常被情欲苦恼着。

波娃外表冷漠，内心却充满激情。萨特很惊奇她对人和事物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在她身上，萨特发现了眼泪、呜咽和烦恼的冲击。他很欣赏她能把事情藏在心底的能力，他满怀柔情地和18

岁的波娃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铁椅上，那样专注地思考着时间的流逝，以致他们自己都成了时间。她富有极强的抽象能力，以致她自己成了荒原、天空和树林。在对萨特的爱情中，令她惊讶的是，她发现了自己的性欲，其欲望超过了其他的愿望。“拿取身体是一大快乐”，然而，这一快乐、这一乐趣预示着她与萨特之间的障碍，她不敢告诉他自己强烈的欲望。

波娃愉快地放弃了她的童贞。当内心、大脑和肉体取得一致的时候，这种统一性就会令人兴高采烈。首先，她所经历的仅仅是快乐，这种快乐与她本能的乐观性格相吻合，也是她引以自豪的。但在她 20 岁的时候，她尝到来自于她体内的那种“单纯的生理欲望。”以前她一点也没有品尝到那苦涩的滋味。在她的生活中，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饥渴和缺乏睡眠的令人苦闷不堪的感受。而现在，在突然之间她却全部地领受到了。有一段时间，她和萨特一别就是几天或几个星期。星期天在图尔见面，他们在大白天往往不好意思去旅馆上床睡觉。此外，波娃谈到：“我不喜欢以预先规定的方式做爱。我不承认一个人可以违背自己的意愿来顺从欲望，也不承认有蓄意创造快乐的可能性。做爱的快乐应该像大海的波涛和桃树开花一样不可预示和不可抗拒。”直到她和萨特相遇，她觉得克洛岱尔式的肉体爱情升华一直是令人满意的。现在，她惊慌失措地发现了比理性还至高无上的性欲。肉体的欲望使她发现“人类并非栖息在善的宁静的光辉里，它也经历动物的无声、无益、残酷的肉体上的剧痛。”

波娃没能重新控制住自己。对萨特的激情夺去了她的自我，她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一切平衡都化为折衷。她辗转在死亡、无穷无尽的和虚无的深渊中。情欲以不可阻挡的势力将她的理智冲毁。她无法解释为什么对自己的肉体欲望和自觉的意志之间不能达到一致！她的身体是它自己的狂想，而她的理智又无力控制它们。狂想的威力使她的防范无济于事。她发现，一个人生理上的欲望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苦。一件有毒的衬衣

从头到脚编织在她的全身。她憎恨遭受这类痛苦，她却深陷其中，甚至她厌恶她的热情鲜血在她血管躁动不安地流动。每天早晨在地铁中，她便凝视着同她在一起旅行的人们，想知道他们是否也熟悉这种痛苦。可还没有任何书充分描述过这种极度痛苦。逐渐地，这件有毒的衬衣开始融化，她也感到早晨的新鲜空气抚摸着她那闭着的双眼。但在黄昏的时候，那摆脱不掉的欲火又再次在她体内燃烧起来，成千上万的蚂蚁爬过她的双唇。她痛恨地觉察到，在她体内有一种情欲的疾病已经侵蚀了她的骨髓。她承认，自从进入青春期以来，她一直极力掩盖着这种病，“我生理上的欲望远比我所想要获得的大得多。在我所选择的男人对我的狂热的爱抚和性行为中，我能够分辨出我内心的活动以及作为个体的我的自由，但孤独、不可抗拒的兴奋心情却大声呼唤着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在从图尔到巴黎的夜行车上，波娃讲述到，一只不知何人的手抚摸着我的小腿，这一抚摸竟能下意识地激起我的强烈性欲，这又是与我的自觉意志相悖的。对于这类不光彩的事，波娃一点也没向萨特说过。她觉得透明的坦诚是不能对这类事采用缄默的态度，所以没能坦白，是因为这类事情本身是不可言传的。波娃的身体把她驱赶到这种神秘的角落，以致成了他们俩关系的绊脚石而不是纽带。因此，波娃对此非常憎恶。

波娃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判断，精神从来不孤立地存在于肉体之外，而肉体大大地损害了自己。她认识到灵与肉的“和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智无法屈服她那强烈的欲望，可对抗中理智往往又难以战胜情欲。她领悟到，人类并不是完美无缺、尽善尽美地生存着。如果根据阴暗、恐怖的欲望推断，地球的表面一定如同地狱一般，正是这种欲望以雷电般的威力给人以重击。

波娃还讲述到一个一直令她震惊而不能忘怀的事情。她以第三者的眼光看到了地球上的这个地狱。一天下午，她在圣拉德贡，听到身后有一种奇怪的声响，听上去就像折断细枝的噼啪声和拼死搏斗的动物的喘息声。她转过身来，发现有个男人蹲伏在丛林

中，一个流浪汉，他的双眼紧盯着她，在进行手淫。波娃惊慌地逃之夭夭。“这种寂寞的自我安慰行为反映了一种多么愚钝的苦恼啊！好长一段时间，我不忍回首这件往事。”

人的状况基本相同的观点，一点也没给波娃慰藉。而在她的热血涌动之外，注定她只是个附庸而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这也太伤她的自尊心了。如果要她从总体上获得对生活的自我满足，她也许会接受自己难以控制的生理冲动。可是，她也感受到情欲吞没了她的自由。所有这些欲望的阵阵骚动，加上她那毫无意义的追求，以及需要另外一个人并附就于这个人，她感到内疚和耻辱。波娃说道：“我无意掩饰自己的肉体的欲望，或是用言行捏造我事实上没有的自由。我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突然的转变上。仅凭愿望不足以恢复我的自信和我那枯萎的雄心，也不足以使我获得真正的独立。”她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留步于自己的生活中心，虽然本能上更倾向于存在，而不是自己的意愿。她也意识到恢复理智与本能冲动的平衡，而不是具有自我欺骗的道德说教，这将是波娃所要长期走的一段艰巨的路。

（四） 结婚的念头压根儿没有在我们脑海闪现过。没有孩子，我能干自己的正事

1931 年春天，波娃在马赛找到了一份工作。她为离开巴黎 500 英里而去过孤单的“流放”生活感到惊恐，萨特因此建议修改协议。他说：“如果我们结婚，我们就有两个人一起工作的便利，再者，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结合也不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各自的生活方式。”这种前景使波娃感到出人意料。迄今为止，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考虑服从于一般习惯和社会风俗的可能性。因此，结婚的念头压根儿就没有在脑海里闪现过，因为这是违背他们所定下的基本原则的。

自从波娃产生了到马赛的念头以后，这个问题就把她掷进令

人烦恼的猜度之中。萨特认为，在这种环境中，为了一个原则来折磨自己简直是愚蠢的。可以说，波娃总是处于被萨特的说服中。结婚意味成倍增加一个人的家庭责任，而且，实际上还增加了一个人的日常琐碎工作。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任何关系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现存关系。波娃清楚，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以萨特的离开为条件那将是荒谬的，因为她的自由只能在心灵里找到。对于萨特来说，加入已婚男子的行列意味着一种更大的放弃，而不是获得。尽管萨特不会因此对波娃怀恨，但这也会刺伤他的心。为了不被责任拖累，为了能使双方获得更大的自由与独立，波娃也尽可能地避免选择去结婚，以便不会让悔恨缠绕他们的未来。这件事是不需要过多权衡利弊就可以断然决定：不要结婚。

只有一种考虑才能使他们向所谓的合法屈服：想要孩子。但他们决无此愿望。在这一点上，波娃经常被人责备为缺乏母爱。可对待母性本身，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偏见。婴儿也从不使她感兴趣，因为她认为自由自在、独立不依是一种很幸福的完美存在，如果有一个家庭和孩子，就将自己给局限了。新的因素对波娃没有吸引力。孩子不可能成为她与萨特关系的纽带，而更多的是绳索。波娃说道："我也不指望靠另一个人来反映和延长萨特的存在。无论对他本人来说，还是对我而言，他都足够了，我自己也知足。我从未梦想过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怀有孕。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感到我与父母关系淡漠，因此，即使我有子女，我也会把他们视为陌生人。从父母那里，我既期望冷漠，也不反对敌视。我对家庭生活是非常反感的。我从未梦想催促自己去做母亲。"做母亲这件事是与波娃的生活方式不相协调。她知道，为了能成为一个作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自由，而她生活的全部价值和方向都在于写作这个方面。假如她认为生一个孩子比艺术创造更具有至关重要的创造性，她才有理由去冒这个险。波娃认为，文学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在纯想象的天地中塑造世界，以此解释世界。

在波娃看来，生育孩子似乎是在无目的、无意地增加世界人口，而她的天性也不赞同任何有悖从事文学创作的计划。她说："我从不认为自己在斥责做母亲；我只认为，这绝对不是我生活中的本分，没有孩子，我能干自己的正事。"

波娃和萨特面临这样的分离，他们还是修正了起初的协议，他们不再考虑在他们之间的一种临时性的保证，他们的关系允许短暂的分离，但不允许长时间的天各一方。因而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生长在现实之中，没有任何海誓山盟，但也彼此同意在而立之年尽量地推迟任何分离的可能。

第五章　马赛岁月

在波娃一生之中，她并不认为有多少“决定性”的时刻，除了与萨特相识外。不过，在她晚年写回忆录时，有些事情显得很突出、很重要，似乎成了重大事件。她认为到马赛是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1929年，21岁的波娃天天与萨特幽会。11月初，萨特去服兵役，在萨特服兵役的18个月中，她经常去看望他。然而，1931年，这对热恋着的情人，为谋求教职，不得不选择分离的痛苦。波娃要到马赛执教一年。在到马赛之前，波娃与萨特一起游历了西班牙。

（一）　西班牙之旅：经过迷人的巴塞罗那，我与萨特来到马德里，成了斗牛迷。参观普拉多美术馆，旅行，一直是我心中灼热的渴望

不过，当萨特和波娃来到巴塞罗那时，还有一种焦虑感。城市的一切包围着他们，冷漠地注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听不懂这儿的话，如何了解这个城市呢？他们在大教堂附近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房子虽是三等的，但他们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小天地。睡下午觉时，太阳透过红色的布帘把如火的光辉洒入房间。这时，西班牙在烙贴他们的皮肤！你看，他们是多么真诚地在探寻西班牙精神啊！与同时代多数旅游者一样，他们想象所有地区、所有城镇都拥有自己万古不变、秘不示人的灵魂；游客的任务就是去发

现这种东西！他们知道不能只从博物馆里、纪念碑上去了解城市的昨天，城市的灵魂就存在于此时此地的光和影之间，存在于喧嚷的人群之中，存在于当时独特的气息里面，存在于它们的风味小吃后面。这些都是瓦勒里、拉乐博、纪德、莫兰、拉罗什莱等人的著作告诉他们的。杜亚美就说过，柏林城的全部奥秘就凝聚在悬浮于街头的独一无二的气息之中。纪德则宣称，喝一杯滚热的西班牙巧克力饮料，就会一口吞下西班牙。于是，他们每天也强迫自己吃几块黑乎乎、沙司般、夹杂浓重桂皮香的面包。他们置身于绿百叶窗和门前五颜六色的晒物形成的巧夺天工的欢娱气氛之中。吮吸着沿街湿润的气息。从所读的书中，他们知道要发现一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必须要去看它最穷的地区。于是，他们就去逛伯类尔-切诺地区。他们每夜都看到，几个漂亮的姑娘，跳啊、唱啊，为人们表演。他们感到已和姑娘们融为一体了。

离开巴塞罗那前夕，波娃仔仔细细查阅了一遍《蓝色指南》。她想原原本本饱览一切东西，但萨特坚决拒绝为游一座盐山在莱里达逗留。“我并不反对观赏大自然的美景，”他说，“但是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于是，中途他们只在萨拉戈萨停了一天，从那儿他们直奔马德里。

在巴塞罗那，由于波娃能与萨特长时间地侃谈，孤寂陌生感似乎冲淡了。可在马德里的傍晚，波娃黯然泪下。幸亏有费尔南多，他们才没有过旅游者的不稳定生活。不过，第二天，马德里的风采吸引住了波娃。当时，西班牙已经推翻了僧侣和富豪，要在一片自由的气氛中一劳永逸地赢得正义。西班牙共和国还在惊叹自己的胜利，还沉浸在获得成功的庆祝之中，豪华的餐馆里挤满了人。所有人都不畏酷暑，高谈阔论谈着要建设一个崭新的西班牙。波娃与萨特坐在餐馆里吃玛莎尼拉，嚼黑油橄榄，剥着虾，听着这种种议论。夜间，他们常去各式各样的廉价餐馆吃饭，最喜欢去的是一个建在地下室的餐馆。那儿，羊皮酒瓶里装满松脂香的啤酒，侍者高声读菜单。直到凌晨3点，马德里人还在街上

东游西荡。

从原则上讲，共和国反对斗牛。但共和国公民人人喜欢看斗牛。每个星期天，萨特和波娃也去看一场。第一次去看时，他们最欣赏的是笼罩于看台上的一派节日般气氛。波娃瞪大眼睛注视着身穿各式服装的观众，从上到下，挤满了大碗似的斗牛帽的拍击声。像许多初次进斗牛场的观众一样，萨特本以为斗牛士的工作真太轻松了。他想不通，是什么东西才引来人群的一片掌声或一阵嘲笑的。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斗牛士是拉兰达和奥尔特加。马德里人也喜欢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厄斯特迪特，他以其大胆崭露头角。渐渐地，他开始理解公牛并非如想当然那样容易受骗上当。斗牛士一面要注意天知道接下去会干什么的公牛，另一面要关心观众的反应。这样，他自始至终都冒着生命危险。这种危险乃是他职业的一个基本内容。他以大大小小不同的勇气和技巧追求来估量这种危险，同时，又采取或多或少的手段避开这种危险。每场新的搏斗都是一次艺术创造。波娃慢慢认识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赋予斗牛以意义，甚至是美感的。当然，这理解还有不少遗漏，但是，波娃与萨特都成了斗牛迷。

晚年时，波娃还同萨特谈起第一次到西班牙的情形和观看斗牛。波娃认为，斗牛跟一座希腊神殿或一幅图画并不相同。斗牛是投入到这个国家、这些人群中去的一种生活方式。萨特认为，对斗牛和类似的东西，以及西班牙的舞蹈不仅仅是文化的，它们是比街上一个简单的集会或一个偶发事件更神秘、更坚固的东西。它们形成了对这个国家许多方面的一种综合。应该反思斗牛这种活动，以便发现它的意义。当然，波娃与萨特在旅行中各自把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波娃想尽量多地观赏，似乎太匆忙，太贪婪了，想把一切新奇的东西都经历到和观赏过；而萨特试图去把握整体，最好是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气氛之中，什么都不做，坐在广场上吸自己的烟斗。

萨特和波娃去了普拉多美术馆。有生以来，他们还从未见过

这么多的绘画。过去，他们也多次参观卢浮宫，波娃发现，由于有表兄雅克的启迪，艺术鉴赏力比萨特稍胜一筹。但萨特能很好地鉴赏阿维尼翁派的《圣母怜子》和格吕内瓦尔德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波娃没能使他转而欣赏抽象画，不过，他承认不能离开风格、技巧来欣赏风景和脸部表情，因为前者能"领悟"后者。而他反过来也影响波娃，她对一般的"纯艺术"，特别是视觉类"纯艺术"很有兴趣。这使她在风景、人体面前忽略了它们的"意义"。去普拉多美术馆之前，他俩已经在这问题上多多少少达成了默契。不过，他们是初出茅庐，不能不一起探路。读巴莱士的作品后，他们就对埃·格列柯的画充满倾慕之情；如今亲眼目睹他的作品比预料的还要好。他们领会到在戈雅的几幅肖像画上显露出的残忍，感觉到在他的一生最后几幅画上的极度疯狂。费尔南多对戈雅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于是极力想说服他这完全是一种公正的艺术批评。费尔南多还认为他们过分喜欢博斯的画。的确，对他笔下鬼怪般、被扭曲的人体形象，总是百看不厌，强烈地激发了他们的想象。结果，对其准确的艺术技巧，他们竟极少留意。尽管这样，艺术技巧的完美对波娃更有极大的感染力。她常在提香的画前长时间地驻足，而萨特则马上摆出一副极端的姿态，厌恶地转身便走。波娃告诉萨特，他这样做太过分了，这几幅画其实十分出色。"你说什么？"萨特反唇相讥，"提香太追求戏剧性了！"为了维护格维多·雷尼，他不允许一幅画在一个耸肩、一个脸部表情上为迁就形式而作某些变更。以后，他对提香的厌恶之情稍有缓和，但一生都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反感。

有时，现实能促使波娃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有一次，一个人问她："旅游有什么用？"她回答说："你始终不能摆脱你自己。不过，我却摆脱了。"有时，她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下子失去了自我。也许，只有那些一直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才能有特权享受到休息的乐趣，因为，这时的时间突然静止不动，人的存在和静寂与丰富的宇宙汇成一体。这样的体验能给人多少安

宁，多少惆怅！有一天早晨，波娃正在阿维拉，拉开卧室窗帘，望着蓝天下矗立的城堡倩影，过去和将来一下子消失了，眼前只有金光闪烁的现在和这些城堡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种游离于时间之外的东西。在她早期的旅游中，这种狂喜常常降临到心头。

9月底，他们离开了马德里。在此之前，他们还参观了尚蒂拉那、潘普洛纳、圣塞瓦斯蒂安和布尔戈斯大教堂，还看了阿尔塔米岩石上几幅北美野牛壁画。波娃发现，虽然卡斯提尔高原非常吸引人，还是十分高兴又能回到巴斯克山区农村秋景中陶醉一番。在昂代，他们坐上去巴黎的火车，中途波娃在贝荣讷换乘从波尔多来的快车直奔马赛。

（二） 旅游与征服：走遍普罗旺斯

波娃与萨特分手，波娃单独一人来到马赛，开始了她“孤单女人”的生活。马赛，新奇的起点，像太阳的光芒吸引着波娃。她独自一人，两手空空，切断了过去，离开了所爱的一切。波娃凝视着眼着陌生的城市，讷讷自语。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是一处处洒满阳光的瓦楞、一片片树荫、一株株法国梧桐，远处，还有几座山丘和一片湛蓝的海。城市忙碌的气息，夹杂着小草被晒焦的缕缕轻烟，扑鼻而来。她暗想到，迄今为止，一直紧紧地依附别人，让他们给自己定下原则，立下目标。而今，一切都得由自己了，这多么令人兴奋！这里，无人关注她的到来。除了每星期上完14小时的课，什么都由自己支配，可以养成自己的习惯和寻求自己的乐趣。

对马赛，波娃真是一见钟情，爬过每一块岩石，穿过每一条小巷；踏看老港，呼吸着混合着焦油和死海腥的气息；在树木夹道的大街边坐坐，在公园和宁静的街区小憩，这时，空气中特有的落叶味冲淡了海风的气息。她喜欢铿锵而过的有轨电车，喜欢

像葡萄一样挂在上面的顾客。

马赛周围的农村充满自然情调，也易于到达。即使对一个精力最不充沛的步行者，它也能让他一目了然。这种徒步旅行已成为当地居民喜爱的一种消遣。老手们还组成徒步旅行俱乐部，出版定期的简报，详细刊登各种独出心裁的旅行路线的细节。在经常出没的道路上，他们细心地制作了色彩明丽的路标。在同事中，绝大多数人星期天出去爬马赛韦勒山崖或圣博姆山峰。10 月 2 日到次年 7 月 14 日，波娃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盛夏寒冬，从来没有为自己如何过星期四和星期日而心中打鼓。

波娃在狂热的徒步旅行中表现出来的意志力根深蒂固。在利穆赞时，当她穿过车辙交错的小道，曾暗自决心有朝一日要穿越法国，甚至去周游世界，而且不放过任何一块没走过的田地，任何一处灌木丛。当然，她不相信自己真能如此。这正如当她在西班牙，宣称要饱览“一切事物”时的情形一样。不过在马赛，在工作和经济实力限定的这块有限的地方，这意愿至少已成为可能了。每次旅程本身成为一次艺术创造，每次达到目的，她总要自我祝贺一番，让自己永远记住这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意味着，还要去重复这样的旅程。而正是旅游把她的乐趣提升到一种神圣的必要的高度，赋予她的活动以必要性。她 18 岁时，就是这样把自己投入发疯般的活动使自己摆脱了无聊。

波娃依照《蓝色指南》的指引，走遍了马赛及周围的地区。她登过每一个山峰——加达邦、奥雷里安峰，翻过每一条沟壑，踏过每一处山谷，在白色的乱石间跋涉。有时她不知去向何方，迷失了路，她就不得不兜着圈子，穿过香气馥郁的灌木丛，扶着从未见过的各种花草树木——山蔷薇、红松、圣栎、红水仙、白水仙——到处找路。一个明媚的春日，波娃来到瓦朗索尔高地，第一次目睹了一株杏树开了花。沿着埃克斯附近平原的黄褐色农村小道，她发现眼前景物和塞尚许多油画的画面一模一样。她游览了大大小小的城镇，走过许多村庄、修道院、城堡。如在西班牙

一样，好奇心使她忙得不亦乐乎。她总想从连绵不断的几个山头和山谷寻找意外的发现，而眼前的景物总比她回忆和期望的要美。带着坚韧的毅力，她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使事物牢牢刻在心中。波娃特别喜欢在夜幕依然笼罩着半睡半醒的城市时，穿过大街，远眺晨曦从一个不知名的村庄后面升起；她还喜欢在身旁金雀花和松树的芳香中睡个午觉；喜欢爬上山脊，穿过山梁，迎接那些预料之中的或难以预料的事物降临在眼前。

波娃疯狂地徒步旅行，走遍了普罗旺斯地区。她把每一次旅程本身视为艺术创造。她这样地旅行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要这么问她，这就错过旅行本身的乐趣和意义。如果硬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其实把波娃精心构筑的大厦摧毁了。正是旅行过程本身的乐趣将旅行提升到神圣和必要的高度，赋予了生命活动的必要性。旅行获得对事物美的体验，磨炼自己征服困难的意志，获得极大的成功的满足。人生就是在走路，徒步旅行正是人生在路上前行的象征。一个被执著的意念紧缠不放的人生活在某种总体世界中，这一世界是建立在一系列被视为绝对的规章制度、价值观和普遍认可的原则上，并且不允许最轻微的批评，怕批评会暴露体系的漏洞，对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据产生疑问，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原则、制度、价值观就会在这个追求某种意念的执著者面前土崩瓦解。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的自我肯定，任何执著的意念都没有永久存在的可能。波娃就是不断地、重复地进行着徒步旅行，这已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执著的意念，是一个在世界中活着又不断探寻追求的象征。

在旅行中，波娃还经历了几次恐惧的经历。有一次，一条狗紧紧尾随她一直到达山顶。波娃的几个面包都分给狗吃了，可狗不会像波娃一样忍受干渴而行。狗会不会发疯呢？终于，到达了一个村庄，狗咆哮着扑向最近的一个水塘。还有一种危险，同事们也一再警告波娃，孤身一人去旅行不合常规，会被人强奸的。波娃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老处女们的多疑罢了。她不想因为要防备

这类危险而使生活枯燥乏味。她坚信，在任何情况下，事故、重病、强奸这类事，是不会发生在她身上的。她曾和几个卡车司机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有一次，一个旅行推销员因为她拒绝同他到田边的沟渠里去睡觉，把她打翻在道路中间。但她依然搭车如故。一天下午，头顶烈日，这时一辆小汽车从身旁驶过，在前面停下。车内两个年轻男子邀她上车，说带她进城。可上车不久，波娃发现他们正开往一个荒凉的地带。车子驶离主干道，在一个岔路口被迫减速。波娃打开车门，威胁说要在车子开动中跳下去，两个男子只好让她下了车。波娃认为，一个人只要充分自信，便能逃脱一切麻烦。这或许是错觉，但这使她壮了胆，使生活变得轻松多了。

（三） 我来到马赛是我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波娃从不感到厌倦。马赛确实看不尽、走不完。她常到经历了无数风吹浪打的防堤走走，看渔民。在码头附近的荒地中，她迷失过方向；在埃克斯门附近的街区，她颇有兴味地听头顶烈日的小贩们在买卖上不停地讨价还价。出于个人的偏爱，她发现波泰里埃路令人心醉：穿过半开着的门，瞥见里面床架上贴着女人像和花花绿绿的图画，这比斯芬克斯像的镶嵌图案更有一番诗意。无论是在中世纪的街区看到几级台阶，还是置身于水产市场，或者混杂于港口的喧闹人群中，生活总以一副新的面貌令她耳目一新。

波娃感到自我满足，正精神饱满地追求当初在马赛车站的台阶上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她每天都独立地更新自己的乐趣，然而，也有忧郁的夜晚。夜幕降临，她走出学校，买点美味的烤奶酪或者其它什么好吃的打发晚饭，然后拖着散懒的步子走回去。这时，想到屋里没有人在等待自己，心中不禁黯然。但是，即使在这种

怀旧的时刻，她已驯服了不听话的肉体，又一次保持了生理上的平静。同与萨特的乍分乍合的生活相比，这种长期的独居给波娃的焦虑要小得多。由于波娃不再鄙视自己的肉体，所以，当她心中涌动一阵阵烦躁时，她会不断地克制。真的，她为此还产生了自鸣得意。波娃和萨特曾反对任何形式的自恋，以此作为道德准则。然而，波娃稍稍改变了这个立场。有时，她通过自恋来安抚自己肉体内的情欲涌动。每当心绪不安时，波娃便阅读凯瑟琳的短篇小说。她发现小说中那念念不忘的“孤单女人”的生活，富有罗曼蒂克的感染力。有时，波娃也内心确定自己就是“孤单女人”。

既然有那么多的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波娃就写小说。与前一年写的小说相比，她更勇于否定自己，不满自己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句子，并在写作技巧和写作方式上下一番工夫。波娃从所教的学生中，也得到不少的乐趣。她的学生脑子中过去灌入的都是陈旧的东西，波娃从零起步，向她们宣讲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点极富有刺激。她无需费力去排除学生头脑中的先入之见，而将自己的观念撒向未开垦的处女地真是一件快事。慢慢地，波娃的思想深深地影响到学生们的头脑中。

然而，波娃在讲到伦理学课程时，事情变得糟糕起来。波娃慷慨激昂地谈自己在劳动、资本、公正和殖民主义等问题上的观点，大部分学生站起来以示反对。在课堂上，在作文里，学生们用自己父辈们精雕细琢的观点批判波娃，其中一个女学生把座位从前排搬到最后一排，两臂相叉，拒绝记笔记，两眼愤愤地瞪着波娃。波娃坚持讲那挑衅性的课，并划出专门的时间讲文学、讲普鲁斯特、纪德的作品，这真是火上加油。当时，在马赛这样的外省城市里的女子高中，这样的做法是够大胆的了。更糟的是，当波娃将卢克莱修的全套《物性论》和杜马的论文中“论痛苦”的章节发到学生手中时，有几位学生家长发出怨言。校长把波娃请去。但是，解释归解释，课却流产了。

波娃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小说创作上。她以自己的生活来衡量对许多问题看法的正确与否。波娃带着负疚感审视自己的生活，并作出自己的评价。在涉及到与萨特的交往问题上，她责备自己未能维持一种完全诚实的关系，因而使自己的自由险遭丧失。她感到把这种错误以一种虚构的形式写下来，会得到某种解脱，而拯救自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去探讨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人的幻影。为了不把这个特定内容的故事与普通的恋爱故事混为一谈，波娃把两个女性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天真地希望这样的处理，会使她们的关系从性的潜在影响中解放出来。她把自己身上对立的两种倾向分别赋予这两个人，一个是对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文学成功的渴求。虽然一开始她让前者先声夺人，但她给予后者以更大的价值。

在马赛的这一年，波娃潜心创作小说，塑造各种小说中的人物。她常坐在咖啡店的窗下，一边呼吸着外边的气息，一边揣摩40岁女人到底是如何思考、如何反应、如何受苦的。对这些女人的揣摩越来越使她沉浸于她们的思想和生活中。40岁的女人使波娃又嫉妒又恐惧，她要把她们的多样性写在纸上。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个秋天的下午，绕着贝尔雷潭一圈一圈地踱步，为小说构思结尾。她好像看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热纳维埃夫坐在半明半暗的起居室里，前额贴在玻璃窗上，望着街头亮起的第一批街灯，心中巨大的躁动正在平息。波娃认为，这将是自我实现的序曲。伴随着这种幻觉世界的唤起，她似乎从自己的肉体中升华出来，置身于一个由图画、雕刻和小说主人公组成的天地中。每每在这种时刻，她似乎觉得风都在喃喃轻语，送来水塘中芦苇带着咸性的幽香。水塘是实在的，波娃也是实在的，但想象性的工作和美感使两者都变了样。她一下进入幻觉，写作论文从未使她有这样痴迷的感觉。因此，她常常让自己的想象自由地驰骋。

复活节时，波娃从马赛回到巴黎，极想去看看乡村。她拖着萨特去布列塔尼。

这一年里，波娃与萨特通信很频繁，谈的最多的还是各自的工作，但两人一见面，仍发觉有许多话要说。天下着蒙蒙细雨，圣米歇尔山上，游人寥若晨星。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海，在海天之间，山峰孤寂地矗立着。波娃喜欢圣马洛和它狭窄的街面。曾几何时，海潮声引来多少海盗的冒险！海潮像一片翻滚的奶油咖啡，拍打着海湾，这是一个雄伟的景观。他们看了夏多布尼昂的墓地，它给人造成用做作的简朴来显示豪华自负的印象。为了表示轻蔑，萨特在上面撒了一泡尿。他们对莫尔莱十分喜欢，尤其喜欢洛克罗南。那儿，宏伟的广场、古老的旅馆和周围的小建筑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波娃与萨特在那儿用煎饼、苹果汁当作晚饭。不过，这次旅游中，现实比预想的要稍不美好些，主要是阴雨的天气。

在这次旅行中，一个陌生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波娃与萨特的注意。当萨特翻着一份《新法兰西评论》，读到上面一句话："本世纪最伟大的三个小说家——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萨特哑然失笑。卡夫卡？这个陌生的名字也使波娃笑了起来，她心想：如果这位卡夫卡确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不会一点也不知道吧。说来也真是怪，卡夫卡的确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而萨特和波娃确实也是不知道。可他们倒是很熟悉美国的作家海明威。波娃读过他的《太阳照样升起》、《五万大洋》和一些他的短篇小说。海明威的个性和对人类天性的认识都与波娃相近。但海明威认为，对任何主人公来说，不存在那种思想感情和肉体之间的分裂，无论在闲逛，还是在街上散步，或吃饭，喝水或与女人睡觉，他们从不使身体的一部分游离在外。波娃和萨特在这一点上不赞同海明威，他们厌恶性欲至上的观点。在海明威的笔下，情人们自始至终身心如一地爱着：动作、感觉、语言都和性融为一体。当他们放纵自己去寻欢作乐时，性欲把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此外，波娃与海明威有另一种一致：如果一个人把整个身心投入到每个环境中，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琐屑的场合"。萨特与波娃都

非常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乐趣，海明威也一样，他给走路、吃饭、谈话这种小事赋予浪漫的魅力。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他笔下的人物喝的是什么样的啤酒，吃的是什么样的饭，他们喝了几杯，并把人物之间所有的闲谈写下来。他的笔触所致，琐屑的细节突然有了意义，在生生死死、爱爱怨怨的优美故事背后，人们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世界。其实，个性作为一种态度，事实上是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海明威娴熟地运用简练的形式来写作。老一套的现实主义，以错误的假设为基础，要求依“事物的原样”来描述事物。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按各自的途径，转向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其理论基础也很脆弱。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世界还是不透明的、客观的，但是他总以某一个个人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作者只是告诉人们，他笔下的人物的思想能把握到点什么东西。他从不把客观对象和主人公从事的活动割裂开来，特别是，他通过反复描述事物持久不变的性质来表现时间的流逝。在波娃与萨特的小说写作中，采用的许多原则就是在海明威的启发下确定起来的。

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小说对波娃还留下一个印象：它使她窥见了美国的一角。虽然爵士乐和好莱坞电影进入了她的生活，但对美国依然一知半解。像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波娃也非常喜欢美国黑人歌曲。波娃觉得这歌曲有人们悲戚的叹息、消衰的欢乐、破碎的希望；这歌曲似乎使人们听到一个独特的声音，一个冲破温文尔雅的传统艺术束缚的声音，一个从黑暗深处爆发出来的刺耳的反抗的声音。它扣响了人们的心弦、触动了深沉的集体情绪。通过小说、歌曲、影片作媒介，美国来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波娃心间。

在马赛的前后生活，波娃成熟了，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也开始用自己的视角观察和评论世界，用自己的语言、观点来创造小说。她不再依附别人而生活了，而且也有效地节制了情欲的涌动。不过，孤单女人的生活常受到性的惊扰，对波娃的惊扰不仅

来自异性，也来自同性。

（四） 同性恋者，图梅兰太太对我一见钟情

在马赛，波娃从所教的课中，得到不少乐趣。她不需备课，因为她的知识还很时新，她又能流利地把它们吐出来。一般说来，女子高中的职员们有点看不惯波娃。她们大多数是老处女，喜欢晒太阳、徒步旅行，这使事情更糟。除此之外，波娃也不太谦恭，她从小就对装腔作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常不问一声早安就闯进办公室，把东西放入柜子，坐到一个角落里。尽管这样，她和两三个同事保持着友谊。她们率直的性格使她心情舒畅。其中的一个成为她的挚友。

她叫图梅兰太太，35 岁，教英语，看上去也像一个英国妇女，褐黄色头发，鲜嫩、健康的脸庞上长着几粒粉刺，下巴薄削，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丰满的身段上紧紧裹着一件棕色土布衣。她丈夫是个军官，生了肺结核，正在布里昂松休息。一放假，她就去那儿。有时他也来住几天。她在普拉多街有套漂亮的公寓。一天下午，她邀请波娃去“蓝小鸡”店吃冷饮，她滔滔不绝地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波娃与她常一起沿着海岸峭壁散步，图梅兰太太全身上下洋溢着友情，把自己女佣人的房间改成一间单间公寓，把它租给波娃。房间虽小，但正合意。里面放着一张长沙发，几个书架，一张工作台；从阳台上看去，一个个屋顶和普拉多街上一株株树木扑入眼帘。早晨一觉醒来，从隔壁渗进令人舒畅的肥皂香，这时，阳光洒满房间，波娃的情绪也为之高涨。

晚上，波娃往往和图梅兰太太出去散散步。她们时常在省府广场上的一家粉红色墙壁的餐馆里吃饭，图梅兰太太对女店主的漂亮脸蛋着了迷。波娃答应她到阿尔勒附近地区作一次周末旅行。她们参观了蒙特马儒修道院。当天晚上，她们在一个石板铺地的

大房间里过夜。她极随便地暴露她那高大、丰满的肉体，这使波娃大吃一惊。她说，为了取悦波娃，她染了发，因为头上有了几根白发。她还买了一件粉红色的羊毛衫，使手臂的一大截更多地暴露在外。一天下午，当她们在起居室里喝茶时，图梅兰太太把话题引向了隐秘的方面。她毅然下定决心，告诉波娃，她如何厌恶做爱，如何讨厌丈夫在她进入高潮前就偃旗息鼓，只在她肚子上留下一团粘乎乎的脏东西。她若有所失地想了一会儿，又说，她发现还是学生时代少男少女间的迷恋最罗曼蒂克。她笑着补了一句，她喜欢这种爱只到达接吻的程度。波娃得出结论，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可怕家伙。当她丈夫回到马赛时，波娃想到为此可以半个月不去见她，心头不禁一阵轻松。

但是，图梅兰太太却完全不这么想。紧接着的星期四，她要同波娃出门去登山。波娃喜欢以自己的快速度爬山，于是，图梅兰只是气喘吁吁地追着，这使波娃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之感。在这种旅行中，最大的收获是能有机会独自与自然交流并享受个人的自由。可是，图梅兰太太把波娃的乐趣全破坏了，也把眼前的景物搅得乌七八糟。狂怒之余，波娃越爬越快，这可把肥胖的图梅兰太太累坏了，她一回家就躺倒了，整整一个星期卧床不起，医生禁止她出门和波娃作另一次旅行。

一天，图梅兰太太邀请波娃去有名的帕斯卡饭店吃饭。她们吃了煮河鲈，喝了不少黑醋栗酒。归途中，她们都很兴奋，互相用英语对话。波娃曾把一只学校公文包留在她的公寓里，于是就和她一起去取。一进屋，她就把波娃一把抱在怀中。“嗬，别再装腔作势了。”她搂住波娃，热烈地亲吻。紧接着，她的话就喷涌而出。她说，她怎样对波娃一见钟情，说现在该是抛弃伪善的时候了。她哀求波娃：“你能不能和我过一夜？”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坦白令波娃目瞪口呆。波娃只能讷讷自语：“想想明天早晨吧，我们到时会有什么感觉？”

“一定要我向你下跪吗？”她叫喊道，声音沉闷。

“不！不！不！”波娃尖叫着，夺路而逃，心中在想，明天早晨怎么能再面对面站在一起。一大早，图梅兰太太设法堆起一副笑脸，“你不会把我昨晚说的话当真，是不是？”她问波娃，“你一定知道我那是在开玩笑吧？”

迄今为止，像图梅兰太太突然露出其本来面目而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波娃还没经历过。其实在此之前，图梅兰太太已有大量的暗示，向波娃发出了信号。她曾给波娃留过一张纸条，在签名下面画着一排“X”，还写道：“我希望能有一天告诉你这些‘X’代表什么。”显然，它们代表“Kiss（吻）。”还有染发、羊毛衫、搔首弄姿。但，波娃总是轻信人。由于从小沉浸在一个道德拘谨的环境中，她总不从性的动机来判断人，而是更多地从道德而非心理的角度考虑问题。波娃不是努力去发现人们正在干什么，她只是对人们表面的行为谴责一番抑或肯定一番，以此揣度人们做什么。因此，图梅兰太太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她，她感到一种可怕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愤怒。

第六章　悲欢三重奏

波娃在马赛执教1年后又到卢昂执教4年。直到1939年，她与萨特才结束在外省的教书生涯，在巴黎重新相聚在一起。在此期间，有一段悲欢的三重奏。这是萨特、奥尔加、波娃三人关系的感情纠缠，是扮演迷人者和被迷者的人间悲喜剧。“三重奏”是情爱中迷人的一曲。他们三人间的关系与其说是萨特的杰作，倒不如说是萨特依靠对奥尔加的迷恋的力量呼唤出来的。正是这“三重奏”，波娃写成了《女宾客》，萨特写出《间隔》。

（一）　萨特和我都快30岁了，不得不走在早已确定的道路上，仅有的冒险是写作

波娃与萨特的生活已经紧紧相连，事业已经走上正轨，他们的世界正沿着预定的道路前进。他们都不足30岁，可生活道路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更换，只有在写作的神话境界中他们才获得生存方式的自由。有时，波娃多喝了一点酒，就会泪如泉涌，又会像过去一样渴求“绝对”、“永恒”，又一次体会到人类努力的虚无和死亡的急迫；她会批评萨特甘愿为写作“生活”所欺骗。他们也时常争辩一些问题，可萨特否认会在泪和酒的泛滥之中发现真理；指出以形而上学的词汇来解释自己的经历是个大错。波娃认为，在她所处的境遇中必须正视别无选择的两个基本方面：生存的乐趣和生存的痛苦。但她现在却在两者间摇摆不定。除此之外，她最大的烦恼是：正在变老！她感到身边的一切随着青春的渐去也正变成灰色，而不再新鲜。她感到自己的感官也在衰老，有一种不可

弥补的失落感。

在这段时间里，萨特到柏林去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感到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个学生所有的自由和愉快。然而，当他重返波娃身边，过那种日常生活时，就感到一种不自在。他爱自己的学生，喜欢教书，但他厌恶和校长、老校工、同事以及家长打交道。虽然他还没有结婚，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他的生活已和波娃连在一起了。而今，他 30 岁了 ，不得不走在早已确定的道路上，仅有的冒险是写书。

波娃在过去的一年中只字未写。萨特认为她比自己能更快、更准确地把握哲学理论。事实上，萨特总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假设来理解别人的理论，要他抛弃自己的观点而理解别人的理论，对他是非常困难的，而波娃没有这种障碍。如果一个理论令她信服，她就会改变她与世界的关系。她对哲学有强大的吸收力和批判意识；哲学对她是一种有生命的现实，它总是带给她满足。

波娃清楚她之所以能很好地理解别人的理论，完全是因为她缺乏创造力。在哲学领域，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天才寥若晨星。女人天生就不迷恋此途。她与萨特谈哲学时，感受到他的耐心和大胆，并从中发现哲学研究极为引人入胜。但是，对她来说，在别人的思想上花费笔墨去推导、判断、批评，她不感兴趣。她不满足于步别人的后尘，而是想把别人的思想与自己经历中的那些独创性因素进行交流。为成功地达到此目的，她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哲学又转回文学的创作中来。

（二） 对明天不感兴趣，对今天格外投入热情的奥尔加

在众多的学生中，奥尔加引起了波娃的注意。所有的任课老师都发现了她的个性，称她为“俄罗斯姑娘”，因为她父亲出身俄罗斯皇家贵族，他娶了奥尔加的母亲，一位法国姑娘。思乡的气

氛笼罩着这个家庭，每逢假期，奥尔加和她妹妹旺达就沉浸在父母讲述的俄国宫廷那仙境般的生活。她们念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诗文，读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悲伤的故事，并常常沉浸在故事虚构的气氛中。

奥尔加在波娃的生活中占据着特殊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一开始是奥尔加需要这种友谊，并促成了它的诞生。奥尔加 18 岁时，实际上反对一切。她把世界的一切都寄托在她的老师波娃身上，而波娃那时像空气般地超脱。奥尔加对波娃的感情如火如荼，因为波娃符合充当奥尔加"救星"的条件，文化和经历都增加了波娃的权威。奥尔加从波娃身上找到了与自己同样的痛苦和愤怒，找到了对自由同样的渴望，以及在生活中毫不考虑传统的价值标准。但她并未认识到在波娃热情背后所潜藏的冲动到底是什么；波娃只是她眼中一个特殊而独一无二的重要人物。

波娃也从奥尔加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一切。波娃那时的内心已足够充盈了，总试图要放射出自己的力量。奥尔加需要她，正敲击了这个敏感处。奥尔加第一次接受馈赠时显出的那份渴望劲使波娃发现"给予"的乐趣，体会到接受别人的感谢有一种令人陶醉的喜悦，体会到相互交往中包含的欢感。

奥尔加具有波娃那样的狂热。波娃总是很重视狂热，她在奥尔加身上发现了自己和萨特特别赏识的品德：真实性和最基本的优点——直率。她从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印象。在她身上焕发出一种无法对付的冲动和极端的性情。在她面前，萨特与波娃失去了一切抵御能力。她往往会大发雷霆，有时甚至气昏过去。不过，反叛和厌恶的意识固然在有些时候能化为暴怒的情绪；但更多场合会使她颓丧消极。事实上，这是一种蔑视一切形式的专横态度。奥尔加满腔热情去追求享受，有时，她会发疯地跳舞，直到累昏为止。她对一切事、一切人都有一股急切、盲目的渴求；她的热情中有放肆的、孩子气的成分，这使奥尔加经常一连几小时沉湎于白日梦中。波娃喜欢与她聊天，因为她总饶有兴味地听波

娃说话，波娃总能从她的倾听中得到关注和理解。有时，她竭力扼杀内心汹涌澎湃的感情，在言谈举止间表现克制的谨慎之态，这也令波娃欣慰。

萨特非常喜欢奥尔加，他不愿让她去接受寄宿学校的“监禁”，他提出了波娃也认为极佳的建议：让波娃单独辅导她学哲学，去获哲学学士学位，萨特也可一起辅导。波娃向奥尔加的父母提出了这个计划，奥尔加的父母也终于同意由波娃来监护他们的女儿。波娃与萨特于是就为奥尔加制订了一个细致的授课计划和要求她必须完成的功课日程，诸如读书、写作、练习等等，并为她在小绵羊旅馆租了一间房。

但是不久，萨特这一希望落空了。奥尔加要远离索本大学，单独去攻读一个学位，似乎太困难了。她既不具有对攻读学位的充沛热情，也无坚强的毅力，而且她对抽象思维的哲学并无多大兴趣。奥尔加童年时就认为自己不属于她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她不能在这样的处境中预示未来。对她说来，明天很少存在，明年更是子虚乌有。她并不怎么区别实在的计划和虚幻的梦境，所以当她被一些枯燥、讨厌的任务困扰时，她没有什么希望可支撑她的努力。波娃试图打消她的懒惰，可批评只使她感到负疚，使她迟钝、绝望。萨特和波娃很快就放弃了计划。圣诞节过后，哲学课就被取消了。

奥尔加摆脱了学习的锁链，开始恢复生气。她作为学生是郁郁不欢的，可她是最能与波娃合得来的伙伴。她对明天不感兴趣，对今天的事情格外热情；她不知疲倦地用眼、耳、舌来体验，不知疲倦地跳舞、步行，或者仅仅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奥尔加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奥尔加拖着他们去维克多咖啡店，在露天座上听优秀的吉普赛吉他手的演奏，而且常常被伴奏的女子乐队的装腔作势逗乐。一般说来，他们对女人的兴趣比对男人更浓，波娃总伸长耳朵倾听餐馆里的女人闲聊，或是海洋酒吧中舞女的碎言。

奥尔加是纯血统的金发斯拉夫人。激进、慷慨、独立，她那内心的冲动、绝对的幻想及狂热仿佛奇妙的春药在萨特身上起了作用。萨特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小姑娘。

当她在场时，萨特便不惜一切代价的取悦奥尔加，并努力将自己装扮得年轻自如些。奥尔加成了他疯狂的解毒剂。他在1939年到1940年的日记中写道："从1935年3月到1937年3月，这两年期间，正是我对奥尔加疯狂爱恋的时候，也是我最懦弱的时候。"

（三） 萨特已被奥尔加迷住了！我并不吃醋，我更喜欢萨特去追逐

奥尔加把"生命的价值"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重，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或是其它的东西，都不能像物质存在、具体姿势、人物表情那样打动她。奥尔加对萨特的关系却处理得平淡无奇，他们喜欢在一块，但谁也不要求对方做什么。对奥尔加来说，有现在就足够了，明确的言辞、限制、允诺或者预言——特别是预言——似乎完全不需要。

奥尔加同样喜欢同另一位男士马尔戈一起出外，萨特则认定她喜欢马尔戈超过喜欢他。每当萨特独自沉思时，他总是陷于推测、怀疑之中，但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现在，他总觉得现在不过是通向未来的路标。然而许多疑问又困扰着他。萨特把这些疑问提到了奥尔加面前，因此，两人吵了一架。这种妒嫉以及随后的结果完全没超出柏拉图主义的范围。奥尔加有着天生的孩子气，轻浮从事，容易受惊，男人们因而都想宠着她。而萨特确实想独占她，当然，他是想在纯粹感情的意义上独占她。一年来，萨特已被奥尔加迷住了。他开始给她讲故事、唱歌，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如说是为了取悦奥尔加。他同波娃在一起，从不会这样，因为他们间的关系太紧密，也用不着这样。

萨特给予奥尔加的快乐，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在无数漫长的下午，奥尔加替他解闷，因而取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萨特做任何事都不半途而废，既然与奥尔加的感情已开始，他就要让它达到高潮。对萨特来说，奥尔加是神圣的，他坚持自己的独占权，任何别人都不能比他更关心奥尔加。于是，奥尔加的眼神和言语开始成了一种象征，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开始把狂热的注意力投到奥尔加的一眨眼或一痉挛上，并赋予它们全部意义。他从来不用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理论去征服她，相比之下，他对波娃就没有那么周到。他是否打赢了马尔戈？奥尔加是否已经把他要求的优先权给了他？如果没有，她会很快给予吗？萨特和波娃常几小时不停地琢磨这些问题。波娃对此并不吃醋，并觉得如果让他在幻想症中慢慢垮下去还不如让他去追逐奥尔加，去争取奥尔加的青睐。

波娃手头写的书吸引了她全部注意力。两年里，她不停地写作，仅仅是出于对事业的忠诚。她决心不让奥尔加在生活中占据太重要的地位，不然，奥尔加就会把她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波娃坚信，她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奥尔加，觉得她十分动人，但她不想让她侵入自己的宇宙中心。

波娃在自传中写到："这个小淘气鬼征服了我们。这归于奥尔加的个人性格。在《女宾客》中的格扎维埃尔的性格就是以奥尔加的心理为原型的，当然，也经过了一番系统的重塑。如果我不透过格扎维埃尔的漂亮外表，描绘它内心的淘气和不屈的自我主义，那么，两个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就缺乏说服力。弗朗索瓦兹之所以有朝一日发现自己由于憎恨之至去杀人，这首要的原因是格扎维埃尔对她的感情原来只是一种骗人的幻影。"奥尔加的确任性而为，喜怒无常；但这种品格根本不是最主要的，只是她性格的表层，她的慷慨大方历历在目；她感情深刻、坚毅，她蔑视社交、虚荣，与波娃意气相投。

萨特和波娃不是正常地和奥尔加建立一种友谊，而是制造一

种荒唐的神话，并把神话放在奥尔加身上。这种古怪的行为被波娃解释为："我们厌恶成人世界。我们没有向成人世界妥协，萨特曾经陷入一种精神错乱之中，而我常常抽抽泣泣地自言自语，长大只意味着老朽。一天又一天，我提醒自己比奥尔加成熟。我们俩人常带着反叛的骚动，伴随着对自由的坚定信仰，追求对青春的崇拜。"奥尔加冲动、极端的性格使她成了少女的缩影。她的言辞、她的行动处在连续不断的骚动中，对抗着传统的规范、社会准则、责任感、一成不变的义务，以及一切种类的束缚。她愉快地废寝忘食，嘲弄理性的辩解；她宣称脱离了人们正可耻地委身于人类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赋予她各种价值观和象征的原因。萨特和波娃将奥尔加看成了小天使，这使奥尔加深恶痛绝，她不愿用虚构的神话人物来取代自己，但她无力阻止这种变形。

（四）　我们要成为"三重奏"，而不再只是一对人了

波娃与萨特虽然羡慕奥尔加能全身心扑在今天的生活中，但也是为了构筑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从此之后，波娃说道："我们要成为'三重奏'，而不再只是一对人了。我们相信，人与人的关系，要在不断发现新鲜因素的过程中发展，没有哪种关系可以通过特许或者超越一般而成为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我们的关系似乎是自己破土而出的。"

奥尔加不善应付生活，这才需要他们的帮助；反过来，又使他们早已陈腐的世界焕发出勃勃生机。波娃想："我们订下规划，把过去的两人交谈改为三人的'全体会议'，这会使三人都满意。"

波娃非常关心萨特，也非常关心奥尔加，但方式有别，可能还会相互抵触。这两种关系是排外的，波娃对他们俩人的感情从未混为一谈。她对奥尔加的感情虽深刻，但只是一种亲昵的，日常的关系，没有心灵撞击的因素；当她试图用萨特的眼光观察奥

尔加时，感到在欺骗自己的感情。奥尔加的个性和品性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波娃，她们间的感情也日见亲密。但波娃也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压抑感制约着我，促使我厌恶她。即使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也感到不再能自由地按我的天性嗜好行事了，因为我不准自己表露出冷淡或保留；在我眼里，她不再是一个喜欢的随和的伴侣了。"

奥尔加也处境艰难。开始，她与萨特的交往毫无阻碍。他使她感兴趣、高兴，他也发现她富有魅力。她所认识的萨特是带点荒诞的人物，他能使她摆脱这个世界的单调和沉闷。"我与你一起的时候，真异乎寻常。"她常拿这句话来点评他。而现在，萨特已不满足将奥尔加与马尔戈分开，他试图与奥尔加建立像爱情一样绝对的、排外的友谊。他感到需要由她以某些公开的表白，一句话、一道秋波、一个象征性的姿势，来证明这种感情。而奥尔加不希望把自己绑在萨特这一男子身上，更不愿在已有牵挂的男人身上打主意。但她很喜欢他，骨子里也有调情卖俏的天性，所以，常能如他所愿，送他一道秋波，或者扭捏作态一番。不过，第二天她又马上矢口否认。萨特责备她任性，她抱怨萨特专横，两人往往会争吵一阵。有时，他们分手时还没有和解。有两次，马尔戈曾参与他们的争论，他们使马尔戈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一天，他们见面时吵得特别厉害。和萨特分手后两个小时，奥尔加被喊到电话机旁，一个陌生的嗓音告诉她，当走下卢昂开来的火车时，一个愤怒的小个子男人向一个比他高两倍的人进攻，对方还手，把他的眼珠都剜下来了。那疯子已被送到一家医院，并要见一个叫奥尔加的人。奥尔加慌忙叩响波娃的门。波娃马上穿上外套，想乘下一班火车亲自去勒阿佛尔。同时，波娃去见马尔戈。他建议波娃给萨特的工作室打一个电话。萨特来接电话了，他连声道歉，他以为奥尔加会听出他的嗓音，他是想通过这个玩笑来解脱他的精神不适。波娃如释重负，奥尔加尴尬不已，而马尔戈则欣喜若狂。

（五） 我们三人发现，自己被可怕的机器牵引着，跳着可怕的舞蹈

波娃在“三重奏”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尴尬，不像开始时那么惬意了。波娃曾写道：“他们常制造一种动人的气氛。对此，我尽力有所贡献，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一想到‘三重奏’要长期延续下去，就被吓坏了。我与萨特争夺奥尔加是不可能的，他那追求的固执劲，已得到很大的乐趣，而我本人却没有这个冲动。我既为萨特制造了这么个处境而生气，也为奥尔加利用了这个处境而气恼。对这种隐晦的怨恨，我有天生的羞辱感。但言行之间，我都热心地促进‘三重奏’的健康发展，但对己、对他们，我丝毫不感到满意，于是，我害怕地期待着未来。”

萨特和奥尔加常轮番诉说自己的怨苦，寻求波娃的支持。波娃往往站在奥尔加一方。但奥尔加清楚地明白，波娃与萨特的关系非能与自己同日而语。虽然，他们把她的青春看得比经验更珍贵，但，她扮演的只是小孩的角色，只是一个与一对用不可动摇的感情联系起来的成年男女抗衡的孩子。波娃说道：“无论我们对她个人兴趣多么照顾，毕竟是我们控制着这个‘三重奏’的命运。在与奥尔加的关系中，我们与她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的，其实她是附属于我们。即使我有时责备萨特，我还是坚持与他站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生萨特的气，实际上是生我的气。她曾多次告诫我，他的武断行为会毁坏我们的友谊。但我无动于衷，这引起她的不满，更加深了她害怕失去我的恐惧。”

萨特在整个关系中被奥尔加摇摆不定弄得心烦意乱，而且他并不知道他从奥尔加身上到底得到些什么。他时常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大发雷霆，为的是掩饰正在折磨自己欲望和喜悦的空虚感。这种“风暴”常使奥尔加非常恐惧。于是，他们俩人都会把细枝末节告诉波娃。开始波娃还喜欢他们的各自“汇报”，但时间

一长，渐渐感到不耐烦。当萨特没完没了地跟波娃描述奥尔加一皱眉，一噘嘴的含义时，波娃就不耐烦；假若波娃站在奥尔加一边反对他，萨特就会暴跳如雷。萨特说："奥尔加刚才对我大发雷霆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波娃则用同样不证自明的真理反唇相讥。波娃批评他总是从个别例证通过假设胡乱地普遍化，归纳出奥尔加是友好还是敌对。在这一方面，他们总是争论不休，直至精疲力竭。

他们三人终于发现，自己被一架开动的可怕机器牵引着，跳着可怕的舞蹈。虽然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友情还是皮毛未损。有一次，奥尔加冷冷地与波娃道一声别就笑着同萨特走了，他们出去去度那牧歌式的假期。波娃被完全孤独于他们的世界之外。波娃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人完全如我一样存在着，同样有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她天生的气质和在"三重奏"中的地位，使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此时此刻的波娃感到了一种孤独，她不愿考虑未来，并无必要地抬高此时此地现实的地位。如果波娃的一句话、一个姿势或一个决心令奥尔加不快，她会使波娃感受到自己成了一个十足可厌的无依无靠者。奥尔加使她丧失了一点自信心，并由此被痛苦折磨。有时，波娃还发现自己与萨特对立，这更使她发愁。萨特能从奥尔加那里体验到惊奇、狂乱和入迷这种种与波娃相处时从未体验到的感觉。由此产生的心情根本不能用"嫉妒"两个字来概括，这是一种痛苦。波娃几次自问："我全部幸福的基础是不是一个大谎言。"

（六）　《女宾客》中的"三重奏"

《女宾客》对波娃来说是一次陶冶和觉醒。写作这部小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波娃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在这篇小说

里，她如此专心并冒险，以致从心灵到文字的转化有时似乎难以进行下去。其后，她再也没有如此忘我地置身于一部小说中，即便她写《回忆录》，也没有这般的忘情专注。《女宾客》中的人物只是移植了生活中的人。书中的皮埃尔·拉布鲁斯是萨特，弗朗索瓦兹是波娃，热尔贝是波斯特，格扎维埃尔则是奥尔加。皮埃尔·拉布鲁斯和弗朗索瓦兹的关系正与萨特与波娃的关系一样，他们一起肩负着揭示世界的使命。而格扎维埃尔正是奥尔加，她是作为一个“女宾客”加入到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这一最基本、最牢固的关系中来的，可格扎维埃尔对她处在“三重奏”中的位置很不满意。因此，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要持续一种平衡是相当困难的。嫉妒、背叛、彼此怨恨、伤害就成了他们三者之间，带有悲剧性的破碎心灵的“三重奏”。

在《女宾客》书中有这样一节描写“三重奏”的：

一天晚上，皮埃尔、弗朗索瓦兹、格扎维埃尔和保罗 4 人一起到名叫塞维利亚的酒吧舞厅去消遣。这里的西班牙女人真叫人吃惊，她们的脸上充满活力，情感炽烈，长长的头发又黑又密，她们完全和那些在夏天的夜里耳朵上戴着散发出浓郁香味的甘松花束的塞维利亚女人一模一样。舞曲开始了，一个身穿西班牙舞服的成熟而丰满的女人走到了舞池中间，随着吉它声，她的整个身体带着小孩子一样的柔软开始跳跃起来，宽大的花边裙子在她有力的大腿周围旋成一团。

格扎维埃尔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舞蹈，她的两颊绯红，她已经控制不住脸上的表情了。她盯着舞女的动作显出一种兴奋得有些发呆的样子。弗朗索尔兹喝干了她杯中的酒，并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从来也不能够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活动或共同的情感中和格扎维埃尔融为一体。这时舞女所展现的青春的光彩，令人目眩的快乐在她身体里激起一种动人的纯洁的情感。此时的格扎维埃尔什么也没看，她低着头右手上夹着一根燃了一半的香烟，慢慢地把香烟靠近她的左手。弗朗索瓦兹费了好大劲才没有叫出声来，她看

见格扎维埃尔用红红的烟头灼烧着自己的皮肤，一丝敏感的笑意使她翘起了嘴唇，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的微笑，就像一个疯子的微笑，是一个正为肉欲所折磨的女人淫荡的微笑。人们简直不能看她，她包含着一种可怕的东西。格扎维埃尔轻轻吹落伤口上的烟灰，她又一次把燃着的香烟头灼在已经裸露的伤口上。弗朗索瓦兹浑身发颤，她觉得自己被一种东西击中了似的。

“这是傻气，你快烧到你的骨头里去了”。弗朗索瓦兹喊道。

“真是舒服，一块灼伤的伤口”。她满意地看看伤口。

皮埃尔认为格扎维埃尔是一次赎罪的神圣的灼伤，是与她的排他的、不妥协的性格相一致的，同她的强烈的情感相一致的。弗朗索瓦兹感到，格扎维埃尔总是用各种异乎寻常的方式独自占有皮埃尔，她感到很痛苦。她感觉到在这三个人的关系中，她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是被一个女客人驱逐在一边，冷落无依的人。她的存在感被完全的剥夺了。有许多次，她也被嫉妒所浸透，她也真想恨皮埃尔，想伤害格扎维埃尔，然而在保持纯洁的友谊的思想支配下，她什么也没干。怀着一种平静的果敢，格扎维埃尔选择了要把自己完全表现出来的作法，这种作法似乎加重了她的份量，就连皮埃尔也怀着强烈的兴趣转向了她。弗朗索瓦兹没敢成为她自己，她在一种痛苦的爆发中懂得了这种虚伪的怯懦已经把她变得什么也不是了。

皮埃尔也感觉到仇恨已从格扎维埃尔那里流了出来，像硫酸一样侵蚀着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弗朗索瓦兹已感到精疲力竭了，皮埃尔也不再顺从下去。

“你为什么突然恨起我们来了?”皮埃尔严厉地问格扎维埃尔。

格扎维埃尔发出尖锐的笑声说道：“绝对没有，你们不是第一次从外在看事情了，就像戏剧里的布景一样。我是有血有肉的人，你们懂吗?”

“你认为总是我们俩人在一起?”皮埃尔说。

“是的!”她大声地说。

弗朗索瓦兹咬紧牙齿，她气得真想揍格扎维埃尔一顿，她竟然拒绝与自己交换最起码的友好的表示的权力！这太过分了，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她再也不能够忍受了。

皮埃尔也气愤之极，“你完全错了，我不认为这就是我们俩人的关系”。

弗朗索瓦兹过去的每一天都一直避免危险，通过格扎维埃尔的怪僻的快乐，通过她的仇恨和嫉妒，愤怒终于爆发了，和死亡同样具有可怕的决定性。她看到了，在格扎维埃尔漂亮的脸蛋后面躲着一个丑恶的存在。很久以来，格扎维埃尔只是弗朗索瓦兹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它突然间变成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实在，而自己却只是这幅图景里苍白的一小块画面。

从酒吧舞池回来，皮埃尔同弗朗索瓦兹在一起，他觉得这样的三人关系不能就此继续下去了。他说：“我傻乎乎地相信了这个姑娘能带给我们令人愉快的感情，而不是恶劣的引诱。我们曾希望组成一种真正的三人生活，一种非常平衡的三个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没人是牺牲者；这也许是一场打赌，但至少值得试一试！然而格扎维埃尔的表现却像一个嫉妒的小婊子，如果当我正以献殷勤为乐时你却成了一个可怜的受害者，那我们的事就变得下流了。”

皮埃尔坐在弗朗索瓦兹身边，她用手抚摸着他的脸。今天晚上，皮埃尔的爱情不再能够使她平静了。今晚暴露出来的事，不能把它归于自己。现在，世界在弗朗索瓦兹的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耸立起来！这甚至是她一直在思考着的“存在”的失败。

第二天，皮埃尔同格扎维埃尔谈到她对弗朗索瓦兹的排斥、嫉妒，他让她明白三个人要实现一种友谊、互爱和保持自我的关系是多么难，需要每一个人都拿出各自的诚意。格扎维埃尔表示了悔意，并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态度。然而，皮埃尔也知道自己过于把格扎维埃尔看得理想化和纯净了，也即是把她抽象化了，压抑了她真实的情感和性欲。她正迫使他们接受：“我讨厌纯净，我是

有血有肉的。”她以自己的力量反抗别人强加于她的这种贞洁，在她恶劣的情绪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渴望。如果不是皮埃尔的亲吻和抚摸唤醒了格扎维埃尔的性欲，事情肯定不会到此地步。

这种关系的解体已不是那么突然了。在三个人的关系中，每个人都要放弃自己的优势，可如果其中有一个拒绝放弃的话，三个人的生活方式、友情就不可能存在了。

这天晚上，当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回寓所上楼的时候，听到格扎维埃尔屋里有人说话。会是谁呢？皮埃尔竖起耳朵听，他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向弗朗索瓦兹说："我要知道是谁。"他又向前走了一步，楼板发出了嘎吱的响声。

"别人会听见的"，弗朗索瓦兹说。

皮埃尔迟疑了一下，接着他弯下腰，开始脱他的皮鞋。一种弗朗索瓦兹从未感到过的痛苦的失望吞没了她。皮埃尔在黄色的墙壁中间悄悄向前走着，他把耳朵贴在了门上。弗朗索瓦兹悲哀地看着他，在这张怪僻、紧张的脸上，她几乎认不出就在刚才还温柔地朝着她微笑的那张可爱的面孔了。

"是热尔贝，我早料到了。"皮埃尔踮着脚走过来说。他手里拎着鞋子，上了最后一层楼梯。

回到房间，皮埃尔说道："下面一定有事。我真不理解，昨天晚上她还是那样温柔、那样诚心，那样信任我。如果她把热尔贝邀请到她那儿来，要么是出于对我的报复，这说明她开始恨我了；要么是她本能地想要他到这里来，那么这意味着她很喜欢他了。"他神情困惑，迟疑地摇晃着他的脚。"也许两种情况同时都有。"

皮埃尔心神不宁，无法上床睡觉。他光着脚在门边站着。皮埃尔轻轻把门打开，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他要出去看看，他光着两只脚踩在地板上从楼上下去，又转回来，靠在门上说："他们肯定在接吻。"

"也可能是热尔贝已经走了"，弗朗索瓦兹说。

皮埃尔非常恼火地对弗朗索瓦兹说道："如果我告诉你我看见

了呢？我通过锁眼看见了。他们在沙发上，正在拥抱接吻。”

弗朗索瓦兹气愤地钻进被子。在这样一个和谐、温柔的良宵之夜，这突如其来的怨恨真是不可思议。这个就在刚才还带着莫大的关切和她说话的人与在锁眼里偷偷的窥视者是同一个人么？在这样的一位颠狂和固执的鲁莽男子面前，她不能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厌恶。

皮埃尔与弗朗索瓦兹各不相让地争执着，这时，她看见他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到他的怀中。她从未看见皮埃尔哭过。

皮埃尔说：“你知道吗？刚才我对你撒了个谎。我对偷看他们感到很羞愧。我刚才是抱怨你逼我说出了实话。”

她轻轻地抚摸他的前额说：“这使我觉得太难受了。真有意思，我从来没想到你也能体验到羞愧的感觉。激情这东西，确实卑劣。”

“真是卑劣”，皮埃尔说。他直呆呆地盯着天花板说：“想到她正在和热尔贝拥抱接吻，我真受不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当弗朗索瓦兹醒来的时候，发现门下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对我自己感到非常恶心，我真该从窗户跳下去，可是我没有这个勇气。请不要原谅我，你们应该在明天早上杀了我，如果我做得太卑鄙了。不能原谅。”

皮埃尔看了纸条非常惊慌，立刻要弗朗索瓦兹去敲格扎维埃尔的门，格扎维埃尔不肯开门。他们决定找热尔贝问问是怎么回事。他们来到常去的咖啡馆等着热尔贝。过了一会儿，热尔贝笑着走了进来。

皮埃尔对热尔贝说道：“今天早上我们在门底下发现这张纸条，你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昨晚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她是醉了还是怎样？你离开的时候她怎么样？”

“她没有醉，”热尔贝说。他显出一副非常尴尬的样子，“我应该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跟她睡过觉。她到多玛戈来找我的，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她就邀我到她那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发生的这回事，反正，她扑到我怀里来吻我，然后，我们就一起睡觉了。”

“那么你认为是在你走以后，她才喝威士忌的？”弗朗索瓦兹问。

“这很有可能”，热尔贝说，“她把我赶出了门，可我向你们发誓不是我去找她的。她骂我的那些话，我真是呆了，真还以为是我强奸了她。”

“她一贯如此，”弗朗索瓦兹说，“这是她的方式。”

事情过了三天，格扎维埃尔一直回避与皮埃尔见面。她觊觎的是皮埃尔整个人，既然她不可能完全占有他，她便带着愤怒的怨恨来拒绝他，这怨恨当然也冲着与他在一起的弗朗索瓦兹。只有在将皮埃尔从弗朗索瓦兹手中全部夺走的时候，格扎维埃尔才会对弗朗索瓦兹表现出一点真正的好感。皮埃尔想与格扎维埃尔约会，准备以明确的方式来与格扎维埃尔决裂。皮埃尔心里已认定格扎维埃尔是个风骚、任性、变节的女人。她和热尔贝睡觉仅仅只是出于一时的仇恨，目的是为了愚弄皮埃尔，为了报复。

格扎维埃尔不肯来找皮埃尔解释所发生的事，皮埃尔只好去找她。

“你似乎并不愿意见到我。听我说，我压根儿不想继续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只是不想在嫌弃别人的时候不对其讲明原因”，皮埃尔说。

“可是我到底对你应做到什么呢？”格扎维埃尔问道。

“你对我并没有什么义务，再说，你也不欠我什么，我也从不知道对你还承担什么责任。只是我终于明白了你是怎样的人，我们之间的故事再不会令我感兴趣了。”他超然地说道。

“我并不感到羞耻。我见到热尔贝时你总是发怒，而我与他在一起是多么陶醉呀”。她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态耸了耸肩。

“你对热尔贝产生好感，甚至爱上他，我倒觉得是很完美的。可是你的感情不可能是纯洁的。你从来只是将他当作一个工具，用

来平息你的傲慢，满足你的怒气。那天夜里你把他带到你的房间，完全是出于嫉妒，而不是为了他那双漂亮的眼睛。”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想。”她咬紧牙关，两行狂怒的泪水流过面颊。

“你所要求于人的，就是令你心满意足的崇拜。你一直在恨我，你和我所有的关系归结起来不外是嫉妒、傲慢、背信弃义罢了。我如果不跪在你脚下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要你与我建立起有点人情味的关系，摒除自私和任性，你就对我恨之入骨。你自己却被你的阴险狡诈所欺骗。你早有预谋地将他灌醉，你不慌不忙地与他睡觉是为了报复我。”皮埃尔愤怒地说道。

格扎维埃尔看着他，带着狡诈和疯子般的神情。

“你敢说这些行为是热尔贝捏造的吗?”格扎维埃尔说。

“可我长着眼睛和耳朵，有机会我也将它们派派用场。这很简单，只要扒着锁眼往里看就行了。”皮埃尔冷着脸说。

“你!”格扎维埃尔把手卡在脖子上，她仿佛要窒息过去。“你不至于干这种事吧?”

格扎维埃尔愤怒地跑出门，“这个男人，我一定要让他吃点苦头。”

他们三人间的生活方式就此结束了。波娃在《女宾客》中企图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沟通的，每个人都像莱布尼茨所说的孤独的“单子”，没有供出入的窗子。她得出了萨特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人即地狱”，“人是无法被拯救的”。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弗朗索瓦兹把这个她一心想要战胜的狂妄自大的女英雄——格扎维埃尔用煤气给杀死了，以此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嫉妒、怨恨、相互伤害、背叛的关系以死才告结束。

第七章　“荒诞”爱情

在波娃与萨特的交往中，波娃一开始就接受了萨特的意见，即男人的情爱是自由的，不局限于一个女人，一个故事。

（一）　荒诞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创造出艺术作品

“爱情”这个词对于两性的意义是不同的。爱情在大部分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件“事情”，而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说则是生命的全部。

对于波娃这样一位女性来说，她不会把自己附属于任何男人的，她觉得生命的意义是自由。因此，她一开始就接受了萨特的提议：爱情的自由游戏，因为她愿意像一个自由人那样体验爱情。萨特作为主体、自我的个人，努力扩大着他在世界上的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女人的爱情是为了男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一切。但对波娃来说，问题不在于为萨特的利益而放弃什么，而是要在他们关系中取得一种平等。这种没有幻想的关系将以一个人的全部的生活内容丰富另一个人。

透明的原则将使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尽可能正确地理解生活和爱情对异性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男作家从文学创作开始，得以从他的伴侣的隐情中汲取关于女性爱情的细节，那么女作家亦应打破习俗、腼腆，描述男性的爱情。女性文学长期以来被局限在感情领域。为了能毫无保留地谈论情爱或性爱，波娃与萨特发明了这个透明的“契约”。这种透明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对自我及世界

的了解。这是两位作家互赠的最出色的、最珍贵的礼物。在他们共同从事的写作中，经验、体验、肉体和真实性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他们写作的独到之处在于这种对他们自己的全部的开放、展示，未经雕饰、毫无保留或掩蔽地揭示出作为人生存的真实境况以及人性恶的一面。人的自私、欺诈、邪恶、嫉妒、背叛、虚伪及相互侵吞、残害在他们的作品中是作为主线来描述的。这种令人厌恶和恶心的人的生存状况是波娃与萨特艺术作品的主题，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冷漠的关系，而结论是：人是不可拯救的。

波娃将萨特写给她的情书——《致海狸》发表了，令人震惊地把关于萨特的性经验公诸于众。在披露他们之间的透明关系中，波娃不再是"窥视者"。波娃尽可能进入男人的世界。为了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人类的两半，她时而做男人，时而是女人，这使她能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如实地描述两性的爱情。透明成了他们俩人在探索人性世界里的光明，在他们那里，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世界融透在一起，他们成了同一个"我"，而并非是两个分离的"你"。

《致海狸》发表后，有人说波娃同一个有很多艳史的丈夫一样，成了也有一些艳史的妻子。波娃认为，她同萨特的条约里，俩人具有同样的自由，谁也不比谁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而且她使用了这一自由，并由此自己担负了责任。萨特对此也说道："我和波娃从没有对她附属的爱情发生过争论，因为我把它们看成是完全附属的，并没有担心这些艳史会突如其来。"

波娃在谈论萨特的爱情时说："我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事实，我知道支配萨特存在的计划的依据点是什么：了解世界，表现世界；我确信自己跟这个计划如此相关，以致他生活中的每个插曲都不会令我失望。"他们深知他们之间培植的透明的力量。他们认为，对一个人要有一种根本的理解，这是一种特权，在文学上具有无穷无尽的价值。他们排除了一切辩解，体验了自己生活的真实。

波娃接受了萨特的格言："人无可争辩。"人们要对自己的一切行动和思想负责。然而，在承担一切的同时，她做了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担负了责任。她选择了萨特，并全部地、整个地接受了他。在萨特看来，荒诞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创造出艺术作品。至于生活本身，应该听其自然任其进行，怎么样都行。在同波娃的关系上，他认清了自己的处境："我从不知道规规矩矩地过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我由衷而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个邋遢鬼，外加一点小聪明，教育界的一种虐待狂和一个令人作呕的正式的唐璜。"

（二） 如果我提议与你同床，你会作出什么反应

1937 年，30 岁的波娃感到自己像一个一生只有一个情人的女人。她同波斯特，即《女宾客》中的热尔贝一起前往普罗旺斯地区的阿尔卑斯山脉。

波娃已在"三重奏"的悲欢中弄得精疲力竭了。

一天，波斯特这一张英俊、欢快的脸呈现在波娃面前。面对波斯特纯洁的微笑，堆积在波娃心头的阴影开始散去，她突然想起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萨特和奥尔加之外，还有许多事情值得爱。有积雪的山峰、洒满阳光的松树林，有客栈、大路，有人群和各种奇遇，还有这友好地注视着她而充满笑意的眼睛。这些又引发了波娃的旅游欲，她向波斯特提出去旅游，将决心面对面再次相互征服的萨特和奥尔加留在巴黎。她的这一决定也正中萨特的意，萨特想在他们出去旅行的一星期里来照顾奥尔加，也就是说要么彻底征服奥尔加，要么就是彻底放弃她。

晨曦中，波娃与波斯特的远足启程了。夜幕降临时，刮着风，他们朝着一个小山村攀登了两个小时。地太潮湿了，他们希望在山村里找到一个谷仓，有个栖身之处。波娃在《女宾客》中描述了波斯特是怎样成为她一生中第一个偶然的情人的。

进到一个农妇家，波娃突然感到心中一阵空虚。她似乎觉得这个令人愉快的晚上缺少什么。晚餐时，在烧着旺旺火焰的壁炉旁的餐桌上，波娃真想摸摸波斯特的手，对他温柔地笑一笑，以引起波斯特对自己的注意。此时，只要波斯特对波娃笑笑，也会使波娃心中充满快乐的。她暗暗看了他一眼，他脸上洋溢着的快乐神态给人以温柔可亲的感觉。他似乎对波娃的心绪和表情无动于衷。她没有勇气向他伸出手去，是谁拦住她这样做？既不是萨特，也不是奥尔加。他们独自在一起，在一个被风吹打的高高的山口上的房子里，完全与世隔绝，他们的事与任何人无关。

波娃的手掌心都出汗了。她对自己的梦想、愿望，总是勇往直前的，可眼下她很讨厌这种缩手缩脚的审慎。她为什么不当机立断去干她所想干的事情呢？

晚餐后，他们俩单独在一起。

“你和我在一起千万别拘束”，波娃说。

波斯特大笑起来，开心地说道：“啊！您完全是个男人。”

“这是真的，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个女人。”她感到嘴唇上有一种奇怪的微笑。她的开头并不怎么漂亮，这样笨拙地挑逗波斯特，她感到羞耻。她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建议你跟我睡觉，你会奇怪吗？或者类似的话。可是她的嘴唇却拒绝说出这样的字句。

随后，波娃与波斯特谈到友谊和爱情。波娃说道：“你如果拒绝与别人建立深厚的关系，生活就变得贫乏了。”波斯特说，“友谊高于一切。只要有友谊，我这辈子会活得很愉快”。波娃即刻说道：“仅仅是友谊，那太枯燥了。”她毫不掩饰她的温柔、冲动，她将冰凉的手伸向火苗，感到一阵暖意。她折断一截枯枝，扔到火中。似乎什么都不能阻止涌上她心头的一个欲望，那就是将他的脑袋捧在她双手中。

波娃不想让这次旅行在平淡中结束，她要有情欲的刺激，可是她怎么知道波斯特想不想拥抱她呢？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如

果他出于同情才那么做，她会无法忍受的。血涌上了她的脸，她抬起眼睛看着他，略微感到安心了一些。他对她那么好，那么尊重，决不至于私下嘲笑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不让他一下子便拒绝。可怎么办才好呢？

这时，农妇要带他们到谷仓去睡觉。来到破烂、漆黑的谷仓里，波斯特拿着一个手电筒用以照明。他将手电筒放在一块木板上，波娃从背包中取出睡袋和一件法兰绒睡衣。她走开几步，在黑暗中脱下衣服。她脑子里已经没有任何主意，只能厚着脸皮行事了。她没有时间想出更好的办法，可她又不想就此罢手。如果手电在她说话之前就熄灭了，她将叫一声："波斯特！"然后一口气说出："您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可以睡在一起吗？"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无所谓了。她现在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摆脱掉这个恼人的想法。

波斯特将两个睡袋并排放着，用两件羊毛套衫塞满干草做成枕头。他走开，波娃半裸着身子钻进她的睡袋。她的心跳得仿佛要蹦出来了。有一会儿，她真想放弃一切，逃避到睡眠中去。

"躺在干草堆上真舒服。"波斯特一边说一边在她旁边躺下。波娃看着他，折磨人的欲望又一次穿过她全身，她渴望感觉到他的嘴唇压在她的嘴唇上。尽管从破窗户那边吹过来阵阵冷风，她还是满身出汗。她仿佛觉得自己面临一个万丈深渊，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她此时既无思想，亦无欲望，她突然感到眼下的境况只是有些荒诞滑稽。她神经质地微笑起来。

"您为什么发笑？"他问。

"不为什么。"波娃说。她的嘴唇开始颤抖，她曾经全身心地呼唤过这个提问，可她现在却害怕了。

"您在想什么事情？"他问。

"没有"，她说，"什么都没有。"

突然，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实在太激动了。她眼下表演得太过分了，她是自己在追使自己讲话，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么

愉快的友谊可能就此永远破裂。

“不过，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波斯特用挑战的口气说。

“是什么？”她问。

“我不会说的。”

“说出来吧，”波娃说，“我再告诉您是对还是错。”

“不，您先说吧。”他说。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就像两个敌人。波娃一阵发虚，最后话语还是脱口而出。

“我发笑是因为我在想，既然你不喜欢与女人发生纠纷，如果我提议你跟我睡觉，你会作出什么反应。”

“我认为您想的是，我想要拥抱你，可又不敢。”波斯特说。

“我从未想象过你会要拥抱我。”一阵沉默，她的太阳穴轰轰作响，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她必须说话。“那么，回答我，你会如何反应？”她问。

波斯特将身子蜷缩成一团，脸上显出防御的神色。“并不是我不喜欢，”他说，“但那会使我惶惑不安的。您察觉到我曾想拥抱您吗？”他把身体蜷缩得更紧，用一种近乎愤怒的口吻说道：“我已经决定了，回到巴黎时，我将在火车站台上拥抱您，只是我想您会笑话我的。”

“我吗？”波娃此时快乐得两颊都发起烧来。

“如果不是这样，本来有很多次机会我想干的，我喜欢拥抱您。”他在睡袋中缩成一团，一动不动，一副走投无路的神态。波娃用眼睛测量了一下他与她之间的距离，冲动起来。

“那么，你就干吧，愚蠢的小波斯特。”她一边说一边向他噘起她的嘴唇。

过了好一会儿，波娃惊奇地小心抚摸着那光滑而又结实的年轻躯体，这躯体很长时间内对于她来说是不可触摸的。这一次，她不是在做梦，是真实的，这肉体苏醒着，紧紧地抱着她。波斯特的手轻拂着她的背、颈，最后停在她的头上。

灯光熄灭了，风还在肆虐。波娃将面颊贴在波斯特的肩膀上，懒散地紧靠着他，她对他说话再也不感到拘束了。

“你要知道，并非仅仅出于性欲我才想要投入你的怀抱，这是出于一种温情。”波娃说道。

“真的吗?”波斯特用灼热的嘴唇压在她的嘴唇上，她感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紧地贴着她的身体。

“我非常爱你”，波娃说。

“我从来没有像爱您这样爱过一个女人，而且永远爱您。”

……

波娃与波斯特旅行完，回到巴黎。虽然波娃与萨特有着“协议”，互不干涉各自的生活，但她还是怀着不安的心情到萨特那里。她把与波斯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萨特，她想听听他的看法。

“我同波斯特发生的恋情，对我来说不足为怪，重要的是他爱我的那种方式。”

“那你呢?”萨特口气平淡地问道。

“我也是，我非常爱他，而且，使我着迷的是，我们的关系在保持轻快随便的气氛的同时变得非常深厚。”

“是的，这很好”，萨特说。

“对此事你难道不表示任何责备的意见吗?”波娃问。

“当然不。”

波娃问及萨特与奥尔加的关系处理得怎样。萨特说，他起初还想迫使奥尔加与波斯特断决关系，但与奥尔加一谈到波斯特，他感到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抵抗，不管她嘴巴里说什么，她是非常爱他的。这使萨特犹豫起来，他也不能肯定自己真的有这完全的占有欲。当他占有奥尔加的那一晚上，从晚上到早晨，奥尔加是满怀诚意的，说不尽的温柔多情，可此时她突然在萨特眼中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如果奥尔加毫无保留地投入萨特的怀抱，他肯定会大受感动。但他看出奥尔加渴望着征服他，同时又担忧没有为他做出任何牺牲。这只能引起萨特一种有点厌恶的怜悯。

"后来呢？"波娃问。

萨特说："我感到我对于她是那么冷漠，"他停了一会儿："而且，一件事情结束，那就结束了。"

与奥尔加分手后，萨特除与波娃经常在一起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和其他女人亲近过。但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萨特又一次以他的方式与另一位姑娘旺达弥补了"三重奏"的失败。旺达渴望演戏，萨特鼓励她到戏校上课，答应帮她工作并成为一个演员。萨特信守诺言。他们相逢5年后，萨特为她写了《间隔》剧本，但导演要挑选比较出名的演员出演。萨特一再坚持，旺达成了剧中的玛丽·奥利维埃。后来，旺达还扮演了《死无葬身之地》中的吕丝、《肮脏的手》中的捷西卡、《魔鬼与上帝》中的卡特琳娜、《金恩》中的安娜、《涅克拉索夫》中的维赫妮克。尽管偶然，但这一情爱是热烈而持久的。萨特照料了她一生，临死时还为她提供了年金。

然而，旺达并非是萨特身边唯一的情人，萨特曾向波娃透露过他的许多情爱经历。这就是波娃称萨特对其行为不负责任的青年时代，她说萨特很难克服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八章　重塑自我

波娃一直凭自己的爱好了解世界，编织幸福的花环。在她的思想中，天性与她所理解的道德追求是一致的。总之，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她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理想主义者。自1939年起，一切都变了。世界变得一片混乱，她开始了解到人类是一个整体，也懂得了个人的职责。她要打碎自己的个人主义理想，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融入社会之中的，具有现实社会责任而积极行动的人。她开始了她所认为的“道德倡导阶段”的文学生涯。

（一）　个人的理想主义剥夺了我思索的全部意义

波娃不再认为天生的自发性是理所当然的。1943年初，她即将写完《他人的血》。出版商格雷尼尔看了书稿后，问波娃道：“你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吗？”波娃对这一问异常吃惊，她读过克尔凯戈尔的作品，存在主义名称也传播了一段时间，并且与海德格尔有关联。但波娃并不懂存在主义的含义，它是最近由马塞尔创造的。波娃认为她还没有发展到应接受这个称号的程度，她确信思想是反映真理而不是固定的教条。

波娃在《他人的血》中探讨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个人体验与世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她有过写剧本的意图，设想一个城市，要求最杰出的公民献出一条生命——毫无疑问是主人公某个亲人的生命。开始，主人公拒绝了，但后来，出于对公众利益的关心，他改变了主意，答应了。结果，他却陷入一种冷漠的状

态，使他对个人和团体都漠不关心。直到有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女士，设法在他心中唤起了一丝人情，他重新有了发挥个性、拯救同胞的欲望。由于情节太抽象，剧本没有写成。后来，波娃又开始写《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在这本书里，波娃反对的不只是一种特定的道德，也反对所有那些包含永恒的道德。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同无限建立联系，不管这种无限被称之为上帝还是人性。波娃揭示了现实性及萨特阐述的“境况”观念的重要性，抨击一切道德异化，拒绝承认把“他人”当做一种托辞使用。她意识到，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世界上，每一个计划都是个选择问题。

在第二部分，她努力为道德找出一些肯定的基础。结论是：自由，这是人类所有价值的基础，唯有它才能够证明人类事业的正确。波娃想为存在主义道德提供一个物质内容，恼人的是，她本以为她最终摆脱了个人主义，没想到还是陷入其中。她觉得，一个人只有在承认别人存在的时候才能获得人性的一面。事实上，人一出生，社会就是他周围的一切。正是在社会里，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才形成了自己所决定的个人命运。波娃意识到：“我的主观主义因一连串的理想主义不可避免地加倍膨胀，而这种理想主义却剥夺了我思索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意义。”

波娃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中反对两种态度：一种是西奈阿斯的观点：“倘若是为了回返，何必要出发呢？倘若要停止，又何必开始呢？”另一种是庇吕斯的若没有征服世界决不愿意罢休的观点，这种观点宣布：“今天我存在于世，今天我就投身于由我今天的计划决定的未来之中。”西奈阿斯的态度似乎审慎，然而会导致保守主义和消极抵抗。相反，庇吕斯希望选择、行动，他抵御冷漠的诱惑。既然人活着，他就应该使生活富有意义。波娃坚持认为人们获得的具体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当某一行动力求帮助自己和他人赢得解放自己和“解放自由”的办法时，这项行动就是令人满意的。波娃说她希望调和自己的倾向和萨特的观点。萨特主张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具体的可能性只有在人们给以判断才具

有意义和价值。比如，一个被锁链束缚的奴隶甚至也是自由的，因为他有权利选择是希望砸碎枷锁还是甘心被奴役。波娃反驳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里的囚徒和穆斯林闺房中的妇女不能凭借对精神自由的选择来逃脱他们的境况。

波娃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里阐述的自由与境况的观点吸引了大批读者，为存在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知识分子之间，文学、哲学和政治互相干扰，互相影响。战后的欧洲困难重重，人们怀疑一切，这样便为纷繁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1945年随着日本的最后投降，迎来了和平的第一个春天。萨特和波娃打算与莱里、梅劳-庞蒂、加缪一起赋予世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波娃一直深陷在个人理想主义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冲突中，她对自己的过去做了彻底的反省，以期改变自己，走入融进社会集体中崭新的自我。波娃反省到：她一直过分地奢望一种“绝对”，但往往达不到并为此痛苦。她并没感到自己在徒劳地追求《存在与虚无》所描述的那种“存在”，但这是一种痛苦的幻想！这种徒劳无益、永无止境、无限重复的苦苦追求，耗尽了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她与萨特讨论了“境况”与自由的关系。波娃坚持认为，从萨特所定义的自由——即自由是对某一特定境况的超越，而不是对它的静止的顺从——这个角度看来，并非任何境况都是同等有效的。波娃认为，他们早该抛弃他们过去所信奉的个人主义的、主观的道德观。

波娃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著作中那细节的论述使她眼花缭乱，庞大的体系让她头晕目眩。然而，黑格尔的著作的确使她放弃自我，而与群体相融合。波娃感受到黑格尔的许多思想以超脱的姿态，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生活，并告诉人们对死亡应持的态度。纵观整个漫长的历史，这瞬息的时间显得多么滑稽可笑，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又是多么渺小的一粒尘埃！但稍一思索又觉得无论人做什么样的努力，仇恨、愤怒、期待和苦难，都是

不可逾越的，那种融入群体的想法只不过形成了个人生活的一个插曲。波娃又返回到克尔凯戈尔[①]的哲学，开始以极大的热情读他的书。她认为不论是历史还是黑格尔体系，甚至魔鬼本身都不能篡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我活着，我存在，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是由自己感受的事。此时此地我就是我自己。波娃对此问题越是深入地研究，与黑格尔的差异也就越大。她认为自己是与同时代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紧密地联系更加重了波娃对时代的责任感。她相信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类存在的现实”是通过单独的个人实体所形成的，并由此表现出来。个体的概念取决于人所处的社会的境况，但每个人都有权力干涉整体的决定。在被占领的法国，要想苟生，就意味着必须默默地忍受奴役，即使是自杀也不能摆脱这种困境。相反，这种做法只能证明自己的失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他所处的社会中超脱，尽管社会支持他，而同样也对他的行为施加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它的永恒性来实现的。这种观点在波娃那里根深蒂固，她所遗憾的是找不到这些观点付诸行动的方法。她所能做到的就是生活下去，在生存中寄希望于未来。

《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出版了，《他人的血》的写作取得显著的进展。未来又向波娃敞开了大门。波娃此时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曾一度失去了的幸福，现在又开花了，而且，她感到这一朵花从未像今天这样茂盛。

（二） 萨特结识了加缪，发现对方非常可爱

在彩排《苍蝇》时，萨特结识了加缪[②]，发现对方非常可爱。

---

① 克尔凯戈尔：丹麦的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

② 加缪（1913—1960），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和戏剧家。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鼠疫》在世界文学史上影响很大。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非常迷恋戏剧。萨特建议加缪在萨特的新剧本中演主角并导演全剧，他同意了。

加缪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表演中，这使他显得特别可爱。他比萨特年轻几岁，他的年轻和独立性与萨特、波娃之间形成联盟关系。他们几人都不依附于任何学派，也不属任何阶层。同萨特和波娃一样，加缪也曾经历从个人主义到"介入"主义的转变；加缪还在二次大战的法国抵抗运动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加缪向往成功，希望出名，对此他也毫不掩饰。他是一个单纯、和气的人，情绪好时，他也开一点并不粗俗的玩笑。他最使波娃喜欢的一点是：他在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依然能保持快乐的情绪。

他们在一起，分享欢乐，共尝焦虑，共度憎恨、愤怒和希望。他们相互作伴，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反抗他们同声谴责的制度、人和思想。他们规划着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出版商加利马尔正筹划《百科全书》中出版一个哲学卷，想让加缪、梅隆-庞蒂[①]、萨特和波娃来完成，并把它变为一种共同宣言。他们欣然答应，并热情地投入到写作中。

几年后，因政治见解的不同，萨特和加缪分道扬镳。萨特 70 岁时，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问道他与加缪的关系和友谊破裂的问题。萨特答道："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加缪。我反对的是他寄给《现代》的那篇文章。"

萨特晚年，波娃与萨特谈话录中谈到与加缪的关系：

波娃：我们谈谈跟你有较多友谊的人。有加缪。

萨特：加缪，我是 1943 年见到他的。我在《苍蝇》首次演出的晚上见到了他。他走到我这儿说道，"我是加缪。"

波娃：是的。你写了一篇见解精到的关于《局外人》的评论文章。

萨特：我认为这书显然是很重要的。

---

① 梅隆-庞蒂，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戏剧家。

波娃：你愿意谈谈你同加缪的关系吗？一开始的情况，后来的情况。

萨特：一开始，关系不错。但要说明战后这种关系的继续，这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的关系很奇怪，我想他同别人的关系不会完全是这样的。同样，我们同他的关系也不是我们同别人所愿意有的关系。

波娃：开始不是这样的。就我说来，我很喜欢我们同加缪的这种关系。

萨特：有一两年情况很好。他挺逗人乐的，非常粗鲁，但常常是很逗人乐的。他很深入地参加了抵抗运动，主编《战斗报》。我们看到他的迷人之处是他的阿尔及利亚人的特点。他有一种类似法国南方的口音。他有一些西班牙朋友，他同西班牙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交往甚密……

波娃：是的，但我们的交往不是不自然的、一本正经的。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吃饭……

萨特：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亲密关系。在谈话中并不缺乏这种关系，但不是很深。人们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谈及某些东西，我们就会发生冲突，但我们都不涉及它们。我们很喜欢加缪，但我们知道我们同他不会走得太远。

波娃：他是这样一个人，同他交往，我们很愉快，有很大乐趣。我们经常相互串门——我们交换了无数的故事。

萨特：是的，我们同他有一种真正的友谊，但这是一种表面的友谊。人们以为称我们三人为存在主义者会让我们高兴，但这反而惹恼了加缪。实际上他同存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波娃：你同他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他想把《禁闭》搬上舞台并主演加尔散。你们在 1943 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萨特：在 1944 年也是这样。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我参加了他的抵抗小组；我见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同加缪在一起，这时抵抗运动已到战争最后时期。他们许多人在这最后几个

星期被捕了，我特别记得一个叫雅克琳·贝尔纳的姑娘。

波娃：后来加缪请你为《战斗报》写一篇关于巴黎解放的文章，这以后主要是为《战斗报》，你去了美国。

萨特：是加缪让我作为《战斗报》的记者去美国的。

波娃：什么时候这一切开始变得令人不快了？我记得他同梅洛-庞蒂大吵过一通。

萨特：对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分手了。1946年的一个夜晚，他在鲍里斯·维恩家。他不久前同一个挺迷人的女人呆在一起，后来她死了。由于这个恋爱事件和分离他变得有些自我封闭，脾气很坏。他见到每一个人时都突然攻击起梅洛-庞蒂来，谈到梅洛-庞蒂关于凯斯特勒的文章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波娃：因为那时梅洛-庞蒂有点倾向于共产主义。

萨特：他的文章是在我的刊物《现代》上发表的，这样，我是反对加缪的。那时加缪确实不是对着我来，但他不能容忍梅洛-庞蒂。他并不真正赞同凯斯特勒的观点，但他处于狂怒之中；较多的是个人因素使他站在凯斯特勒一边。

波娃：总之他同你的关系是非常奇特的。他常说，你们实际相会时他对你充满着喜爱，但你们隔得稍远一点他就有许多不赞成你的东西。他在美国旅行时，他谈论你的方式是使人颇感厌恶的。

萨特：是的，他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波娃：他不可能参加我们的刊物，我觉得当人们认为他多少有点是你的门徒时，他是十分气恼的。他很年轻，而你有了名气。他是非常敏感的，他不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但情况怎么越来越糟，最后造成了破裂？

萨特：有一桩个人事件虽然并没有让我有什么气恼却使他感到不愉快。

波娃：你是指你同那个妇女的恋爱事件？

萨特：这有点尴尬。当这位妇女由于个人原因同他破裂时，他

在某种程度上把这迁怒于我。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他同卡莎雷斯有过恋爱，后来又同她争吵起来。他突然中断了这个关系，他私下对我们谈到这个破裂。我记得那是晚上，我同他坐在一个酒吧，这是我们常去酒吧的时间，就我同他在一起。他刚刚同卡莎雷斯吹了，他手中握着她的信，他把这些旧信给我看。是政治让我们分了手。

波娃：这表明在个人层次上的某种亲密态度。

萨特：对，在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总是这样。甚至我们在政治上的不同并不怎么影响我们的私人交谈。例如，他恢复了同卡莎雷斯的关系并去看她排练《魔鬼与上帝》，你记得吗？

波娃：是的，确实是这样。这些政治上的差别是什么？它们怎么以破裂而告结束？成立共和左翼联盟时，他参加了吗？

萨特：没有。

波娃：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最后的破裂？

萨特：他出版了《反叛者》后，这个最终的破裂就发生了。我想找一个人在《现代》上评论它，但又不至于太严厉，这事很难办。让森那时不在这儿，《现代》的其他人没有谁愿意去评论它，因为我希望评论得温和一些，而大家都不喜欢这本书。这样过了两三个月，《现代》还没有评论《反叛者》。后来让森旅行归来，他对我说，“我愿意写。”应该说，让森的态度有些复杂。他想同加缪那样的人接触，想借助他们的帮助搞一个类似《现代》的刊物，但比《现代》更左一些，《现代》是改良主义的刊物，而他要搞的刊物是革命性的。

波娃：想这样去对待加缪，这真是奇怪，加缪毫无任何革命的东西可言。

萨特：他向多种人提出这个请求。他请求加缪这样做，但显然没有成功，于是他大概就想向加缪报复。加缪不希望同他一起干，他以一种我不希望的方式写了这篇文章，就是说，这篇文章激烈而苛责，它指出了这书的缺点，这样做并不困难。

波娃：它主要是指出了这书在哲学上的贫乏，这样做也不很困难。

萨特：我不在那儿，我正在旅行——我记得是在意大利。

波娃：不管怎么说你是不会去责怪一个主动承担写稿任务的人。

萨特：是的，但这使梅洛-庞蒂很为难，他觉得——他是一个人在巴黎负责——我会不喜欢它发表。他想让让森改变主意——他们大吵了一通——最后他能够做的事是让这文章发表。文章发表了，但有一个特别的条件——是让森同意的，这是他同意的唯一保留——在他的文章发表前，要让加缪看这文章，并征得加缪的同意。加缪看后勃然大怒，他写了一篇文章，称我为主编先生，这是很好笑的，虽然我们相互不称"你"，但我们的谈话是无拘无束的——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主编。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他对我的嘲讽。加缪的文章没有多谈让森——他把让森的一切思想都归到我头上，好像让森的文章是我写的。我对他的回答是很严厉的，我们的关系开始终止。虽然他的政治态度跟我完全不同，特别是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态度，但我仍然保留着对他的一种喜爱。

（三） 融入集体情绪中的"人生盛宴"

被德军占领的巴黎，知识界开办了一个文学活动。毕加索刚写完一本剧本——《尾巴的欲望》。莱里斯建议作一次公开朗诵，大家一致赞同。加缪作节目主持人。他手拄一根大拐杖，捣着地板，以此表示场景的变换；他也描绘场景、介绍角色。在演出中，莱里斯担任主角，他激情澎湃地朗诵了"大脚"的几次长篇演说。萨特朗诵"圆端"的台词，马尔演"胖悲惨"，诗人休尼的太太演"瘦悲惨"，担任"妓女"的是康班，波娃表演"表妹"。

正是在这一次，波娃才遇到吕西安娜、兰波、巴塔耶、拉康。喜剧、书籍以及那美丽的木偶般的银幕形象，所有这些如今都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波娃的存在开始与他们联系起来了。在这短短几个月，世界一下子变大了，多么丰富！活着有多么好啊！

萨特与波娃现今进入的这个朋友圈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成员过去曾是超现实主义者，但他们后来又脱离了这个运动。由于年轻及所受的大学教育，波娃和萨特没能进入超现实主义者的行列；当兰波向萨特和波娃描述进入无意识写作状态的时候，当莱里斯和凯诺回忆布勒东讲述他的论断、他的气质和他那些叱咤风云的文章的时候，超现实主义者的奇闻轶事比任何书籍更生动、详细、真实——让人们瞥见了自己的"史前史"。一天，萨特问凯诺，超现实主义时代什么东西使他至今不能忘怀。"那种曾经年轻过的感觉"。他的回答给萨特和波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此嫉妒不已。

在几次狂欢后，波娃才懂得了"盛宴"的真义。"盛宴"在波娃的作品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人都是会死的》、《一代名流》中的确描述了几次。卡卢瓦斯在《盛宴的梦幻》、巴塔耶在《魔鬼的一部分》中，都曾详实地分析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波娃有着切身的意义。对她来说，"'盛宴'首先是当人为未来而焦虑的时候产生对现实的深情崇拜。当一天一天的日子平静地流逝时，举行'盛宴'的冲动就不可能存在。但如果在绝望之中燃起了希望之火，如果你又能支配世界、支配时代，那么，你能如火一般地迎接它的来到，你就能全心全意地置身其间，并乐意为它精疲力竭。它就叫'盛宴'。它半带威胁，半带希望；正因如此，每次'盛宴'都有着一丝感伤情调。"

请看为庆祝胜利举行的盛大宴会吧，在酒酣之际，依旧有着一丝死亡的气息，但是，在一个辉煌的瞬间，死亡消失殆尽了。在几小时的解脱之后，人们依旧面临无穷无尽的悲伤，依然面临数周甚至数月之久的不安定和混乱——它们足够使人们清醒过来。

盛宴后的他们并不想自欺欺人，波娃只想抓住一小段时间，在一片混乱之中得到完全的快乐，让自己陶醉一番，而不让现实清醒她的头脑。

巴黎还没有获得解放，可某些魔幻的“导体”却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这就是情绪。萨特、加缪、波娃等知识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创造一种集体情绪主义的巨大氛围，迫使他们在一瞬间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燃起一片情绪之火中，胜利成了可触可摸的现实。

他们在“盛宴”中尽情地喝、尽情地跳，也尽情地要喝醉。在波娃心里充满了生活的欢乐，重获了过去的信念：“生活能够而且必须是一场真正的娱乐。这种信念会一直延续到清晨时分；然后，它隐去了，我又开始了等待。”

（四） 放弃自我中心和傲气。“人都是会死的”

萨特和波娃生活在一个转折的时代。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球完全翻转过来，罪恶、丑行和恐怖层出不穷。被破坏的旧秩序再无从恢复，它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即战后时代的来临。无论怎样去看，没有哪个沼泽地里的哪片叶子跟过去一样。波娃意识到，短暂就是命运。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挟带的病症庞大复杂，而挟带的灿烂光辉却稍纵即逝。

波娃写到：“1940 年 6 月以后，我已不再认得过去的一切——物体、人、季节、地方，甚至我本人。在过去 10 年，我所生活的时代始终围绕着一个固定的轴心转，如今，它在突然之间脱离了轨道，把我也抛了出去。我曾带着童年的天真，相信绝对，以为有一条绝对的真理制约着世界。我曾相信，这条真理虽然可能是半埋在被岁月慢慢磨损的某些外壳之下，也可能被革命的力量冲得粉碎，但它实际上确实存在过。我曾经相信，在我们所拥有的

和平生活中，正义和理性像酵母一般运转。我生活在坚定的土地之上和不可改变的星宿之下，建立着我的幸福。”

这一切信念毫不留情地就丧失掉了，波娃以前在内心构造的生活图景就这样冰消融释了。1944 年 11 月，她又开始规划新的未来。这一未来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以自己的眼光为限，围绕自己旋转。她已知道她只是共存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一分子，全巴黎已成了她的化身，她从每一张面孔上看到了自己。通过某种难以置信的普遍的亲近感，自我的存在获得如此强化使她震惊。她似乎长了翅膀，飞临于个人生活的狭窄天地之上，遨游于人类之中。她开始与所有的人融为一体去行动、去斗争、去接受死亡。牢记了这新的信念，她自信能操纵人类痛苦的起源——黑暗了。

波娃在自传中写到：“我知道我的根存在于何方，我不再假装自己能游离于自己的环境。反之，我尽力接受它。从此以后，我把现实放在它恰当的位置上。有时，我感到接受它确实令人厌恶。正是在抛弃我自身的错觉过程中，我同时也丧失了自己不妥协的性格以及我的傲气，这也许是我身上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对此变化，我有时不禁深深遗憾。”在波娃写的《女宾客》中，弗朗索瓦兹气冲冲地问自己：“我将要让自己屈从于仅仅做一个女人吗？”波娃之所以让弗朗索瓦兹去杀人，就是因为她已感到任何事都比这种屈从强。但如今，波娃自己也准备屈从了，她在幸福的状态中重塑了自我。

波娃已认识到人的脆弱性，个人只是宇宙和谐共存中的一个微粒，即莱布尼茨的“单子”。她不再坚持自己是一个中心，世界是因围绕这一中心旋转才具有意义，人只是活着。然而，波娃所面临的打击和失败有着一个特殊的名字：死亡。她意识到人都是要死的，一想到完全的虚无有朝一日将会永远地降临到头上，不禁会头晕目眩。这种寂灭感，充满了她的心胸，以致她不能冷漠地对待死亡。她认为，人们所说的“勇气”不过是盲目的浮夸之

词。她感到，她所全心全意排斥的是对漫漫长夜的恐惧，而因为漫漫长夜并不存在，那恐惧永不会成为真正的恐惧。但它对现在的自己仍然无比可怕。不能去设想自己是有限的，是短命的，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有时，她所有的努力显得无用，幸福成为一桩虚假的诱惑，世界披上了嘲弄的、幻影般的、虚无的外罩。

1939 年 9 月的一天，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与死亡抗争。她坐在拉兹海角，告诫自己："我已经体验了自己希望过的生活，我现在可以结束它了。"她认识到与一个人能无视死亡同人不再拼命地逃离死亡的那一刻的心理自由和平静相比，早几年时间或晚几年时间死亡关系不大。"当没有其它途径保存生命时，你该接受死亡"；"死亡并不总是一桩荒诞孤独的事故，有时它能创造与他人的富有生命力的联系，并由此获得意义，获得正当的存在理由"。过去，这些话对波娃来说是空洞无意义的；如今她发现了其中的价值。她已经发现死亡实质上是完全的"虚无"。

有一天，波娃喝醉了酒，死亡的念头突然又出现了。她拧着手，淌着泪，像 15 岁时的她那样，拼命地把头往墙上撞。1944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她试着用文字来描述死亡，她在笔记中写到：

我正卧在床上，肚子摁着床垫，四肢压着地面。夜晚的寂静化成了水声和腐叶的声响——这是我童年觉得最富有特征的声响。死亡向我靠拢。虽然不慌不忙，但我将会漂向世界的另一头，进入那照不到一丝光线的地方。我将孤独一人，远离其他人，处在一种纯粹存在的状态中，在一种与死亡完全相对的状态中。除了在梦中，我将难以洞悉这一切。有时，我在荒凉的山中和高原上徒然地寻觅它；但是，人一旦睁大眼睛寻觅孤独时，孤独会避你而去。我将会进入某些神秘的尺度中，而借此尺度，我要衡量自己的生活，我要让它带着我正视我的基本存在；也许正是在这条道路的终点，我将遇到死亡。我每次把死亡之梦看作是最后的现实，而死亡之梦每每把我愉快地带入一种空虚之中，与此同时，一个声音在高喊："这是永恒，再也不会有醒来的时候了。"但有

些人还在那里说道："我去死。"处在这种奇妙的瞬间，做死亡之梦作为一桩现实的存在本身固然是一场梦，但生命却获得了我纯粹存在的最终的凝聚的实质。我几乎每周都要做这种"游戏"，否则，我或是心情痛苦，或是抱有确信。但今晚，我的肉体拒绝睡觉，要是肉体拒绝睡觉，那么它即使在梦中也不能触摸死亡。但是，我心中没有一股痛苦之情，因为这种拒绝分外有力量，死亡因之也失去了重要性，时间也消失了。我的存在不顾其他人的存在，不顾未来，正独立地显示出来。不过，这股火苗需要燃料。在一瞬间，它燃烧得很旺，我的记忆为它添柴，我唇前形成的句子足够使我情绪激奋：生命膨胀了，它挤压着我。但我怎么能生活在这间屋里的漫漫长夜之中，生活在森严壁垒的城市中心？我于是拧开灯，坐在床上写下这些字。我已经开始写一本书，它是我对付死亡的一个最新、最重要的手段，我很早就梦想写这本书；这些年来的工作也许没有其他意图，只是为了给自己添加勇气和借口，以便记下这些工作。

也许，使我有生以来惊恐不安的死亡过程将在一秒钟内结束，我甚至于来不及体会它。不论是因为疾病，还是事故，死亡会显得令人惊奇的容易。一旦染上疾病或碰上事故，死亡也许就会接踵而至。我将会死给别人看，但我不能看到自己的死亡。

我肯定自己将死在床上，我的床令我恐惧：这是载我而去的一艘船，令人头晕目眩。我向外浮动，离岸而去，先是一动不动，靠近一个正在说笑的人。当我扑入水中时，那人的五官却在水面上消失了；我是乘着床扑入水中的。我向外漂动，被潮水挟带着，被黑夜中的时间挟带着，不知漂向何方。

波娃欢迎这种"自我寂灭"，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宽慰。一句话，她使自己在死亡之后还存在。当呼吸最后一口气时，将说："这是永恒，不再会有醒来的时候了。"波娃知道死亡将永不会被她所把握；永不能把所有的恐惧集为一体，在心中凝成一次最终的、包容一切的、愤怒的大发作。人永远不会体验死亡；所能知

的是夹杂在有生之日中的幻影般的预感。

波娃也怕老，因为老，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浓烈，毒化了她生活的每一瞬间。艾米丽·勃朗特曾注视着月亮以及周围薄纱般的风景想："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看到它了。"在所有人眼中，月亮只有一个，那么为什么在相等的时间和感觉却不能互相运用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归于死亡，但我们却只能一个个独自面临死亡。波娃最大的愿望是与心爱的人一起死去。"但虽然我们的尸体可以肩并肩躺着，这种在一起依然如幻影。在'虚无'与'虚无'之间不能存在什么联系"。

不过，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那么它们会消失在普遍的冷漠中。虽然，死亡向我们提出挑战，但它也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它可以说是绝对分离的手段，但也是一切沟通的关键。在《他人的血》中，波娃试图表现死亡徒然地包围着充实的生命。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中，她想阐述，没有死亡就不存在事业，不存在价值。在《人都是会死的》小说中，波娃首先把此书看成是探索死亡题材的一个延续。

第九章　存在主义浪潮

颤抖的欧洲从黑暗之中走出，又重现了曙光！波娃一直提醒自己：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意味着一切又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娃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战争将她的自我中心的理想世界给彻底粉碎了。她痛苦地打破了自己过去的模子，而重新塑造了自己，将自己融入到社会之中，承担个人在社会中的道德责任，用行动本身来实现自己的思想。战争结束，萨特、加缪、波娃和许多知识界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交谈、饮酒、闲逛、嬉笑，日夜庆祝法国的解放。所有的人沉湎于这种狂喜之中，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像朋友一样聚合一起庆祝，如兄弟式的狂欢豪饮！人们认为欧洲永远驱逐了法西斯主义。依全国抵抗委员会章程，法国正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国家结构的重建。法国人民希望：从抵抗走向革命。

波娃此时已明白，政治不再脱离个人。战前，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尝试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而现在，知识界的精英们，萨特、加缪、梅隆-庞蒂以及波娃要为战后的法国建立一种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现时代的责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已经对存在的价值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他打算继续这项工作。他将不仅通过理论思维，而且还要通过实践选择，以便确定自己的位置。波娃跟随萨特投入到这项工作和实践活动中，她随萨特、加缪等人一起掀起了法国的存在主义运动。她本人成为一个杰出的“女存在主义者”、“女萨特”，尤其她著的《第二性》震惊世界，奠定了她的历史地位。此书成为女权运动者的“《圣经》”，是推动世界女性解放的重要人物。

（一） 永恒毁灭了，我们与这一时代一起毁灭

战争已经把自己的历史性展示在萨特眼前。这种发现使他震惊地认识到，他多少已经就范于既定的秩序之中，即使是他在谴责它的时候也不例外。每一个冒险者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冒险者要塑造他的形象，把他的构想置于未来世界之中，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自少年时代以来，萨特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冒险之中，一直渴望成为一个作家和荣耀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也一直期望子孙后代为其自身的目的持续不断地利用本世纪的遗产。实质上，他虔诚地保持着 20 岁时就信奉的"对立的审美观"。他无情地谴责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端，但他仍旧没有推翻它的愿望。突然，一切都土崩瓦解了，未来被击得粉碎，他发现自己毫无目的地游弋在幻想的过去和阴暗的将来之间。他用他的可靠的道德来保护自己：从自由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人把一切局面看成（假设成）一套方案，那么，这一切局面都是能够挽救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仍旧非常接近于禁欲主义。萨特常痛恨那些欺骗自己的小诓骗，长期以来，他从不满足于借口头抱怨来虚饰自己的忍让屈从。他认识到不能生活在绝对之中，而应该着眼于短暂和瞬间，他不得不放弃存在，决意付诸行动。凭借他从前的发展，这种转变对他来讲易如反掌。作为一个思想家、作家，他最为关心的就是抓住意义。但是，他在 1940 年读了海德格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后，确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用实践来替代思考，意义才会呈现在世界上。在虚张声势的战争期间，他对波娃说他在一封给布里斯·帕兰的信中也是这样表述的，和平一旦恢复，他将步入政界。

他的囚徒经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使他懂得了孤独的含义。他远没有被迫害的感觉，而只有一种参与了集体生活而获得的极大快乐。他厌恶特权；他的自信促使他凭借自己的才智去

上下求索。起初，他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但他从零开始，在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他结交朋友，向人灌输他的观点，组织活动，动员整个集中营在圣诞节排演了一个由他写成的反德国人的戏剧《巴里奥纳》，并为之喝彩。监狱里的困难、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缓和了他的反人道主义的看法。实际上，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赞颂一个人化的自然；但是，如果人仍将被创造，那么不会再有什么任务更能激起他的热情了。自此之后，他不再把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他将通过塑造客体，通过根据自己的志向构筑未来，而不是通过使主体顺从于给定的环境，来实现自己的自由。这个未来就是“社会主义”，它代表了他所喜爱的民主原则。迄今为止，只是由于害怕因此失去他的个性，他才对社会主义顾虑重重；但是现在，他不仅看见了实现人道的唯一机会，也看见了他自己实现人道的必需条件。

只要他相信他能从文学创造中得到绝对，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就保留在次等的位置。在发现他的历史性的同时，他还发现了他的依赖性；不再有永恒存在，不再有绝对存在。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渴望的“一般性”现在只能从使之具体化的饮食男女中去获得。他一直在思考他以后所表述的：与自己彻底决裂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

萨特获得的名声一方面超出了他过去曾有过的一切抱负，另一方面也有与这些抱负相悖的地方。因此，在这么大的名声之前，他自然不会心平气和。尽管他曾设想过自己会得到后世的赞许，他却没有料到能在有生之年为世人所瞩目。一个新的现实，即“同一世界”的来临，也使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他曾预想，《恶心》在许多年中不会在外国翻译出版，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的加快，他的作品早就以十几种文字出版了。作为一个在旧

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认为波德莱尔、司汤达和卡夫卡的孤寂是他们发挥才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巨大的名声可把他吓坏了。他觉得，他的作品的发行情况根本代表不了它们的价值，鉴于世上引起轰动的平庸之书数不胜数，轰动几乎成了平庸的标志。同波德莱尔的默默无闻相比，倾泻在萨特身上的毫无意义的荣耀倒有着某种使人不安的成分。

为成功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但是，他也意识到，未来的人们不会再以这种眼光看待他了。永恒毁灭了，这个面对明天的男子汉成了在《阿尔托纳》中弗朗兹讲的那些蟹：专横、神秘、彻底异己于人。将来，他的著作即使被人阅读，也同他过去的不是同一码事了；他的作品不再原封不动地流传下去。对他来说，这无异于上帝的毁灭，而迄今为止，在文字的掩盖之下，上帝始终存在着。萨特认为，这一灭顶之灾的根源在于自己骄傲地接受（或者说，承担）了这一灾难。在10月份的一期《现代》杂志上，萨特在“刊首语”中阐述了这一观点。文学曾经闪烁出它神圣的光芒，它也确有其神圣之处；自此之后，他将在短暂中推断绝对；在受自己所处时代束缚的情况下，他将选择这个时代同永恒抗衡，并赞同与这一时代一起毁灭。

（二） 显赫的萨特异己为神了。“女萨特”或“萨特的圣母玛丽亚”

在他的孩提时代，在他的青年时期，萨特最爱做“被人诅咒的多才艺术家”的那种奇妙狂想，他想象自己终生为世人所误解，只是到死后才在坟墓之中接受几缕声名显赫的光辉，或者只能在临死之时，稍稍品尝一点享誉遐迩的滋味。这一次，他再次指望把失败转化为胜利。他得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成功；他赢得了一切，但又失去了一切。他承受了这一损失，胸中暗暗希望一切会恢复原状。“被后代抛弃，又会使我赢回后代”（引自萨特未发表的笔

记）在深一层意义上说，正值不惑之年的他已经实现了——从一个方面看——自己曾有过的最大抱负；尽管这种成功可能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他再也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了。他厌倦重复，最佳出路是改变自己的目标。他讨厌自己受制于人，因而更爱写作而不愿行动，这是因为他一直以为，写作不像沉思默想，也不像迷于梦境，不只是对自我的解脱，而是一种创造。在战俘集中营通过《巴里奥纳》，在沦陷期间通过《苍蝇》，他认识到写作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如今他放弃“是”，而决心去“干”，去“成为”，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坚持认为，从今以后，写作将永远成为一种激励自我的召唤，是一种介入。这并不意味着他开始鄙视文学，相反，他只是想重新恢复文学的本质的尊严。如果文学在本质上是属于神的，那么，它能避免自己的生命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需使文学与人的存在达到一致就行了。这样，“介入”只是作家在所写作品之中的全部存在。

这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萨特是怎样在说服别人的同时又惹怒了别人：他的文章引起了至今不绝的激烈议论。就在这动乱的年代，世间谣言纷纷，即使是最清静的退隐之地，也难免受传言的困扰。这时，公众最需要的是怎样填平新闻和文学之间、人们日常兴趣和文化需要之间的鸿沟，他们渴望获得与周围变化了的世界相关的知识，如果艺术能抓住活生生的、火热的、经院学派的学者从未触及过的现实，人们的上述欲求就能高雅地得到满足。但是，人们不想放弃永恒。他们要求文学把他们送到较高的天地中，在那儿，艺术品有着它的绝对权威。萨特注意使文学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达到一致。对公众而言，他这样把文学从天上拉到地下，的确是一种亵渎。在每个领域，情况都一样。他所献给读者的东西使读者得到充实，但也使他们受到惊扰；他们的怨言声盖过了感激声。

他依旧严守他们过去约定的规矩：随环境的改变而行事，不要事先确定自己充当什么角色。这样，萨特把自己摆到了一个易

受攻击的位置上。成名之后，他的习惯丝毫没有改变，他还住在旅店，还去坐咖啡店，仍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也避开社交界；他不结婚，而他与波娃双方过的这种独立生活也使他们的关系不可能成为“自由恋爱”的典范。如果萨特把作家这个幌子拿来保护自己，他所有的奇异举动都可得到谅解。但是，萨特从来没有这样做。他对自己会有作家这个幌子十分惊奇，从未想到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由于这种率直，他赢得了许多朋友，不过，舆论被惊动了。由于公众对作家创作的严肃性一无所知，所以作家只有以“异己者”的身份在公众面前出现，奉承公众对神话、偶像的崇拜之情，消除嫉妒，他才能得到公众的原谅。但是，“异己者”是非人格化的。无论是自负，还是声望，这些鬼把戏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著名的作家也是人，是与公众同样的存在；他也打哈欠，也吃饭，也走路——如此确凿的证据足够说明，如果他要充当“异己者”，他不过是在招摇撞骗。不过，人们之所以把作家抬到一个高处，只是为了更仔细地打量他。从而得出结论：把他摆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他被搁在高处，他与公众的距离会磨平他们怨恨的锋芒。萨特却不想做这种游戏，他留在低处，和公众在一起，和每一个人在一起，和任何一个人在一起。这样，因为人们一方面要把他看成是“异己者”，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他和他们一模一样，他们就把他贬为一个明目张胆的骗子。一天夜里，萨特走出戈尔菲-朱安饭馆，整夜都在恶恨恨地盯着萨特的一位顾客对他老婆说：“哎，你瞧，那家伙也抹鼻涕……”。这种种怨恨会互相强化，因为他不能与资产阶级的行为规范保持一致，他的率直甚至也成为人们对付他的武器。事实上，人们对这种率直半信半疑，这意味着，在那些“精英阶级”看来，这种平等观念太过分了，他们感到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战。

萨特认为：“名声，就我而言，即是敌意。”这是一种令人失意的感受。他赢得了出乎个人意料之外的名声，同时也开始为别

人而存在；不过，他是作为一个为人憎恨的人而存在的。在1945年到1946年，他还在希望能改变这一局面，同时他再也不认为这种转变是轻而易举的了。

波娃已经不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上帝早在她14岁时就已毁灭；并没有什么东西取而代之：绝对只在否定中存在，正如地平线的存在在于它在人们的视线前面不断消失。她非常肯定地明白，一旦永远闭上眼睛，与上述梦想紧密联系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她正随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消逝而消逝，因为在走向死亡；而在世界上除了死亡，人没有第二种结局。波娃只想在自己在世时，被人阅读、被人尊重、被人热爱。不考虑（或者说，几乎不考虑）什么后代。

波娃已经习惯于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她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铅字。在一个时期，人们对他们的捧场以及作为“巴黎名人”的身份使波娃沾沾自喜。当然，在许多方面，她发现这也会使她不愉快。当人们称波娃为“女萨特”或“萨特的圣母玛丽亚”时，她只是哈哈大笑。但有些人的脸色确实使她不能心平气和。这些脸色告诉波娃，他们把她当成一个与存在主义者放荡作乐的下流女人，当成他们的谈资，当成一个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渠道。对此，波娃真厌烦之至。但她喜欢自己新近获得的臭名声。同萨特相比，她的臭名声微不足道。波娃注视着她俩的差距，但毫无嫉妒之心，因为对她来说，他太重要了。波娃的处女作是在两年前才出版的，现在还没到“计算总分”的时候。未来在她面前伸展，她信心满怀。

总的看来，与萨特不同的是，波娃既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家身份，也未因为自己在社会现实中的境遇而受到伤害。和萨特相比，波娃更注重及时行乐，喜欢肉体的种种乐趣，喜欢从天气、散步、友谊、闲聊、学习、观察中得到种种感受。同时，她决不像他那样沉浸于奋斗之中。波娃能认识到：希望是没有止境的；我能去满足，但不会去沉浸。环境保证对每一个努力，甚至每一个细小

的成功作出反馈，激励她继续前进；任务会自己露头，完成它的手段同样也会出现。对波娃来说，有了现在和离现在最近的地平线，也就满足了。

（三） 人们会说，这是存在主义的时代

根据一位评论家的记录，在同一周里，《无用之辈》演出，《现代》杂志问世，萨特做了著名的讲座："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讲座是存在主义者展开的一场彻底的战斗，一场使妇女们昏厥，观众激动起来的战斗。新闻界或狂热崇拜或深恶痛绝，自称是先锋的知识分子也极度兴奋。人们将这一切称为"存在主义的攻势"。

存在主义是未被理解的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萨特和波娃成为其导师。可是无论萨特还是波娃都不希望贴上任何学派的标签，存在主义像任何一种标签一样令他们反感。萨特在多米尼加人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声明，"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然而他们的抗议显得徒劳。波娃写到："最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想法采用了所有人给我们的称号。"

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较宗教神灵启示的存在主义更为费解。比如马塞尔将上帝的存在、价值的来源与人类的自由调和在一起。赶时髦者也赶来掺和存在主义。一切都成为存在主义的，有存在主义罪行，存在主义黑色运动衫，存在主义长发，还有存在主义酒吧，那里人们跳舞、饮酒，唱存在主义歌曲。格雷科就是一位存在主义女歌唱家，穆卢迪是存在主义演员、歌唱家、小说家，他还是存在主义王子，萨特是国王，波娃是王后。这是那些心醉神迷的爱开玩笑并喜欢在马路上看热闹的记者想象中的离奇的王国。他们常常赶到"花神"咖啡馆门前张嘴瞪眼，猎取撰写

或到处传播的关于人们树立的偶像的最新废话。摄影师纠缠萨特和波娃，街上行人跟随他们，人们请他们签名。

波娃就小说和形而上学做了两次讲座，听众没有昏迷，但是同时意味着荣誉和愤怒的喧嚣声在她和萨特周围一浪高过一浪地上涨。此时他们别无办法只有承担这种引起轰动的荣誉。这是一次彻底的成功。文学就像号召他人和选择立场一样突然成为她面前的必要活动，它自天而降，波娃必须面对各种境况真诚地作出反应。

她从未在安静舒适的工作间写作。她生活在咖啡馆、旅馆，混迹于那些喜欢在人堆里生活的人中间。她和萨特不属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禁闭的小团体。他们的秉性使一些人快乐，也冒犯了另一些人。他们之间情投意合家喻户晓，丑闻也远近流传。他们相互结合，但不在一起生活，享有感情和性的独立，这使人们喧嚣一时。各家报纸议论纷纷，无缘无故地对他们评头论足。轰动传到国外，在那里存在主义即刻变成一面镜子，人们面对这面镜子，欣赏新法国出现的对立的、令人兴奋的形象。这就是波娃所谓的“愚蠢荣誉”。

其实，萨特和波娃奉献给摆脱了世界大战的民众以一种思想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们能够承担境况，超越1939年到1945年中蒙受的创伤。二次大战中他们经受了战斗的恐怖，发现了罪恶累累的死亡集中营，遭受了占领带来的侮辱，他们以为的永远消失的灾难重现了：饥饿、奴役、酷刑、专制、谋杀和告密。留下的是如此悔恨的良心和如此残酷的记忆，以致存在主义的到来仿佛远离海岸的洋面掀起的劲风驱散云雾，清除生活中的污浊空气，赶走5年来腐蚀人类的不吉利的魔术。敢于正视恐怖，承担并超越恐怖，这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调和历史、境况和自由三者的关系是非凡的使命。正视人类状况的荒诞：认为荒诞并非是强制的，亦非命中注定，更非决定性的；声明人是自由的，人应该承担责任，人能够超越过去的行为，使善获胜。这对于许多诚

心诚意的人来说是一件新鲜事物。萨特坚持认为每个人应为其道德负责，并以此来吸引这些善意的人们。然而这种道德比较奇怪，对于习惯以阶层、类别，根据宗教教育思考问题的大众，自由的概念加上个人责任的概念是难以理解的。“真诚”的概念——逃避一切谎言、一切遁辞、一切幻想、一切自欺、一切辩护，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让人提心吊胆。

资产阶级从萨特身上认识了自己，却不同意以萨特为榜样超越。对于波娃，形势令她异常不快。作为一个女人，她必须忍受社会对那些脱离既定道路的妇女的指责。多少粗暴的举动，多少骚乱！20年后，曾经讲过一些不适当的话的莫里亚克请求波娃原谅，他更正道：“的确，波娃向我们叙述的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美好的，尽管这种生活杂乱无章，缺乏节制……波娃和萨特的这些娱乐生活仅仅是一条闪闪发光的流苏。现实事物应该是一种狂热的、连续的工作和对将做出政治抉择的正义的渴望。”

存在主义一方面激起天主教徒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激起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判。它受到四面攻击：思想家攻击它的原则，文人攻击它的美学观点。有人控诉存在主义败坏青年道德，同时又有人指责它为寂静主义。有人谴责它是悲惨主义，是颓废。何为存在主义？有人描绘它是一个恶心、厌倦、超脱存在之责任的主义，至于女性存在主义者，怎样下定义呢？一方面，人们将波娃描绘成一个疯子，一个生活放荡、怪僻的人，她无恶不作，过着狂欢节般的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承认她在办公桌旁度过她的存在，她头脑清醒，脚穿平跟鞋，讲究发髻，具有童子军女领队的风度。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她反对各种分类：在左派一边，但不受共产党的欢迎；住在旅馆，却不是波希米亚人；名声显赫，却拒绝出入社交界；她的书使她富有，但其生活方式通常与成功无关。她在工作、写作，在为胜利和未来作自我准备的过程中度过了战争岁月。她在困苦与贫穷中，在与她的堂姊妹、女友们的令人感到羞辱的对比中度过了青春年华，她

没有失去奇妙的激情，恰恰由于这种激情，她解放了自己，并成为第一流作家。

“塔布”仿佛磁铁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一家私人俱乐部。每到晚上10点，就有一大群朋友走进地窖，纷纷拥向圆形演出场，跳 be—bop 舞。在这间长15米、宽8米的地窖里，鲍里斯·维昂与他的两兄弟组成一个乐队吹奏小号。“塔布”给这些发明家带来的收入恰巧够支付每天一餐的费用。不久，全巴黎的知识界头面人物都莅临王子街33号的地窖。克劳德·莫里亚克经常光顾“塔布”，他的父亲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进去冒险。人们在这里还能遇见梅劳一庞蒂、加缪、勒马尔尚，作家、画家、音乐家等一切重要人物。

当名噪一时的《周末晚报》的总编派遣的记者在两三个常客的帮助下撰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后，“塔布”便名闻遐迩了。1947年5月3日，“塔布”进入传说之列，其成员也变成了“存在主义者”。

有记者描写存在主义者：“当初，存在主义者比较贫穷，但后来，萨特、波娃、加缪在文学方面挣得了钱财，雅克-洛朗·波斯特在电影界、穆卢迪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方面，其他人在新闻界都挣了钱。这些富有的存在主义者选择皇桥酒吧为总部，他们喝好酒以至鸡尾酒。奇怪的是，有钱的存在主义者为数不多，而贫穷的存在主义者却俯拾即是。贫穷的则穷困潦倒。他们大约在16岁至22岁之间，通常出身于名门世家，几乎全都被父亲诅咒过。他们几乎全自称是喜剧演员，《魔鬼附身》的作者的侄子米歇尔·加利埃尼，22岁，他是某某将军的孙子，身高2米，已经一年没有梳头了。”记者还写道，年轻的存在主义女演员口袋里装着白鼠散步，让白鼠在肩膀上爬动。她们从不化妆。

记者认为“塔布”就是新一代的圣地。只有透过雾才能看见存在主义者在那里大喊大叫，沉醉于吉特巴舞和用钢琴演奏的低音连奏的狂热的爵士乐之中，或者精疲力尽地坐着，目光呆痴地

盯着他们的温水杯子。最后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时间表：从上午11点至凌晨，他们不停地转移，从“花神”到绿色酒吧，从“塔布”到“双叟喉”，又从黑人舞会到他们最喜欢的“刺客”饭店。想必这篇文章一定在国外新闻界作了一次旅行。当美国《生活杂志》攫取了这篇文章以后，美国准备将配备摄影机的旅游队伍引向存在主义地窖，存在主义也就在国际上得到接受。“塔布”在其自身的成功中死去。它出世时仿佛是一个玩笑，现在却死于报纸过分的剥削、旅游者的侵略以及厌烦了的邻居的抗议，他们强迫“塔布”必须在午夜关门，他们胜利了。

然而，“存在主义地窖”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去那里跳舞的年轻人被称为“地窖里的老鼠”，让-保尔·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波娃接受了“萨特圣母”的称号。人们完全将一种许多人不理解的哲学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混淆起来。法国及国外报纸无不含糊其辞。1949年1月3日的《新闻》周刊宣布：“存在主义地窖藏有鼓动战斗的奇怪的酒神节画。”1948年11月24日的《洛桑日报》谴责“塔布”的常客们：“‘塔布’……实际上是一支乐队，20对舞伴在3平方米的空间狂蹦乱跳，他们是萎靡不振的、得了痉挛病症的骚动的人。虚无、恶心。有人说‘存在主义’，于是‘塔布’的年轻的小人物为他们的恶心找到了一个名字。”苏联《文学报》这样写道：“这是巴黎社会底层的青年一代：厌恶、嫉妒、愚蠢以及最庸俗的性欲的稀奇古怪的霉菌。这就是存在主义者的面孔。”与存在主义最为对立的标题连续不断地出现：“圣·日尔曼·德·普雷造爱太多，”或者：“伊西多尔·伊苏想在巴黎最贞洁的圣·日尔曼·德·普雷区讲授爱情”，或者：“在存在主义的深处，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点点也没有，绝对没有。这令人愤慨。”这是一场离奇而古怪的轶闻趣事之间的竞争。“行了，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辱骂之词。人们议论存在主义画、存在主义政治经济、存在主义帽子。波娃和萨特的美食学众所周知，他们喜欢的猪肉食品、炸牛排、干酪成为存在主义名菜。人们重复

作家的词语。诗人莱昂-保尔·法格确认："存在主义是骂娘的哲学!"伊夫·冈东说："存在主义是粪便哲学。"左派跟右派同样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哲学，他抛弃生活的乐趣、颠倒价值的比例。纪德发现别人夺走了他青年导师的地位，恼火地随声附和："1920年的战后出现了达达派运动；1944年二次大战快结束又出现了卡卡运动。"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做了一次题为《从布痕瓦尔德到萨特的贬值法》的讲座。人们确认"萨特公司"之所以能够垄断文学市场，是因为做了广告："每天，荒唐的卡车一辆紧接一辆驶出存在主义的工厂。他们一直把无烟煤充斥到国外市场。在书店的橱窗、报纸上的所有栏目、公共场所的幕后，无处不堆积着黑市商品，这要算当天最出色的买卖之一。"

一位记者把存在主义的成功解释为缺乏教养、胆小怕事和以草率句法完成论著。还有一位记者写道：那只是咖啡馆里装作艺术家的人在软座上做的一种游戏，那不过是未来的装作年轻的可笑的老头坐在咖啡杯旁第一次感到恶心罢了。古特在《费加罗报》上肯定"存在主义是一个由圣·日尔曼·德·普雷区在'花神'露天座、圣·本诺阿街和雅各布街之间拼凑而成的词语"，并杂乱无章地提及所有存在主义始祖：康德、帕斯卡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谢林、马塞尔……。

"一种用不规范的存在主义一词作为哲学的抽象概念"，这就是人们翻开1945年11月7日的《周末晚报》所读到的。该报用一篇占三栏篇幅的文章评论萨特和波娃，其题目为"在《间隔》甚至地狱装饰下的露西安娜旅馆17号和50号房间"。文章写到，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那么谁是存在主义者呢？"首先是波娃女士。她具有历史的特性：她住在露西安娜旅馆50号房间，同时她是教师。她梳着一种大学里较流行的发辫，漂亮的黑眼睛闪闪发光。"波娃一定曾用这双蓝眼睛对这位记者怒目而视过，所以这位记者以如此的笔调描写波娃。文章继续写道："她写小说，写哲学评论，还写剧本。目前巴黎正上演《无用之辈》。一位名叫内隆的陌生人

前来找她说为了演出这个戏剧，给她10万法郎，波娃答应了。但此人原来是一个骗子。未过几天，警察来敲露西安娜旅馆50号的门逮捕《无用之辈》的作者。他们发现床单在抖动，他们在萨特先生下面发现了波娃。”文章还写道：萨特和波娃“在咖啡馆的桌上并肩撰写长篇小说，臆造从那些不三不四的旅馆到夜总会的半路上发生的恶心和流气的神话故事，乱七八糟地模仿海德格尔和美国小说”。这位记者描述“花神”里的萨特坐在奶油咖啡杯前，讲述“现实中的事物主义的观点”，“内部意识的裂缝”和“器皿的超越”，并说：“我看到了我的自我性。为了伟大的自我性，整个‘花神’时刻准备出卖灵魂。”

一年过去了，人们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有人告诉我们，存在主义占领了伽利玛出版社，它拥有自己的月刊《现代》杂志，它的头目萨特，在用一部愉快地取名为《伤寒》的电影占据电影界之前，已经控制了两家剧院。在韦莱娜剧院演出《间隔》的同时，安托尼剧院则用《毕恭毕敬的妓女》和《死无葬身之地》播下恐怖的种子。每天晚上，观众们有的感觉不舒服，有的大声责骂，有的撞击着大门离开了。舞台上，被自卫队士兵严刑拷打的抵抗运动成员痛得叫喊。萨特只愿意记载世界令人恐怖的一面和尘世的苦难”等等，一幅占三栏版面的讽刺画形象地反映了文章的内容：萨特臂肘支在桌上，波娃伏案写作，望不到边的纸铺满了脚下的地板。

然而有些人提出了疑问：萨特与卢梭一样伟大？波娃是否与史达尔或柯莱特一样伟大？倘若没有掩盖事实，那么某些文章的讽刺的一面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战后的时代。

波娃、萨特以及他们的朋友都很少逛夜总会，相反他们常去酒吧，因为有的晚上，在那里能碰见加缪、凯斯特莱、维昂、庞蒂等。当他们酒喝多时，有时便咄咄逼人。波斯特攻击所谓情敌，萨特变得好斗，他拒绝人家将他塞进回家的小汽车。有一天晚上，凯斯特莱把出租汽车的门撞在了加缪的脸上，将一只眼睛撞得青

肿。加缪一旦喝了酒便容易发怒。凯斯特莱曾经试图诱惑波娃，萨特则对凯斯特莱的妻子感兴趣。波娃对凯斯特莱产生过短暂的爱慕之情，后来她在《一代名流》中以斯克里亚西纳的名字刻画了凯斯特莱。

团体的成员间互相帮助。加缪在伽利玛出版社领导出版《希望》丛书，他替波娃出书。丛书的第一部小说的签名是勒杜克，书名为《窒息》，接着出了波斯特的小说《劣等职业》和奥德里的《输家》。波娃、萨特和加缪拥有最多的读者，也最受赏识，然而被评论得最多、遭受的诋毁也最多。从此他们成为青年的思想导师，人们爱慕他们，憎恨他们，但又常常谈论他们。波娃坚决捍卫存在主义，反对人们将存在主义说成是“失望的哲学”。她揭露建立在人的私利和对人们的鄙视基础之上的懦弱的文化，谴责那些“无利不干”或“先顾自己，后顾他人”的人。人们总是用一句“这是人性”来原谅所有的自私。波娃指出：“因为人们无不惧怕责任……他们如此害怕投身于自由之中以致对自由弃而不顾。”依照波娃的看法，这就是一些人激烈反对建立这自由和责任之上的存在主义的原因。

波娃接受意大利《科技学报》采访时强调，她相信人的伦理观念具有同样的基础；自由，就是对自主权的尊重。她坚决主张不断发明创新，设想一种能够使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自由协调，避免无政府主义的新准则。

1945 年 12 月 1 日，波娃在《法兰西文学》周刊中回答奥里道：人不仅由其行为，而且由他与别人及世界的联系表达思想。根据存在主义的原理，上帝是不存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允许。”而与此相反，波娃总结出的存在主义结论是：“上帝不存在，可一切都得不到允许。”上帝不会为了允许或者惩罚而存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彻底地负责他的行为。每一个人都是其自身行为的结果。“正是在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上，让自由的统治取胜才是人的权利和义务。”

为了从存在主义中引出一种伦理观念，波娃完成了一本233页的哲学论著，受到与《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同样热烈的欢迎，并很快被译介到美国。在《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一书中，她捍卫存在主义，反对有些人将存在主义视为“虚无主义的、悲惨主义的、肤浅、猥亵、失望和无知的哲学”。她谴责铁板一块的人性观点，用集体的实在性反对个体的内在性，在肯定目的永远不会论证手段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当代非常棘手的问题，即目的与手段。

（四） 对存在主义的解释

存在主义曾被指责为鼓励人们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因为解决的途径既然全部堵塞了，人们必然认为任何行动都是完全无用的，而终于接受一种观望哲学。来自另一方面的责难是：萨特、波娃、加缪这些存在主义者强调了人类处境的阴暗一面，描绘卑鄙、肮脏、下流的事情，而忽视某些具有魅力和美并属于人性光明一面的事情。

萨特与波娃都撰文对这些责难给以回击。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阐明了存在主义的思想观点。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这种学说还肯定任何真理和任何行动既包含客观环境，又包含人的主观性在内。也就是说存在主义是为人们的行为打开了选择的可能性。有许多人指责萨特、波娃他们过分强调人性恶的一面了，有甚者把丑恶和存在主义者视为同一回事。例如，有一位太太只要在神经紧张的时刻嘴里就滑出一句下流话，就为自已开脱说：“我敢说我成了个存在主义者了。”通常人们一听见谈到某些相当令人可恨的行为时，就说“人性都是一样的”——恰恰就是这些嘴里一直唠叨着现实主义的人，偏要埋怨存在主义对事物的看法太阴暗了。那么，

存在主义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的，萨特和波娃给予了回答。

问题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有两种存在主义。一种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这些人里面有雅斯贝尔斯和马塞尔，两个人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另一种是存在主义的无神论者，这些人里面有海德格尔、萨特、波娃、加缪等。这两种存在主义的共同点只是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或是说哲学必须从主观开始。

在18世纪的无神论哲学里，上帝的观念已被遗弃了，但是尽管如此，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仍然流传于哲学界。在狄德罗、伏尔泰，甚至康德的著作里都可见到这种思想。人具有一种"人性"；这种"人性"，也即人的概念，是人身上都有的；它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普遍概念。至尼采后，这一"人性"本质的观点才被揭底，尼采的权力意志将柏拉图的真实的"理念世界"变成了一个寓言，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和沿袭的传统观念被颠覆。在尼采看来人是不定形的，人的本质是人自己造就成的，人的伟大性正在于人通过"谎言"来设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行为实践来成其为人的。海德格尔、萨特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并执意要将此路径走到底，从而找到在"上帝死了"或"上帝缺席"的人类境况中，人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成为一个自主而自由的人。波娃也正是通过"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来研究女性问题的，她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的女性"这一个"本质"的东西。

无神论存在主义宣称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么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这个东西就是人。他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所以，人性是后来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

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人首先是存在。萨特认为，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在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不过，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因为每一个人的行为选择，都牵涉到整个人类。萨特举例说道：一个个人，我决定结婚并且生男育女；尽管这一决定只是根据我的处境、我的情感或者欲望作出的，我这一来却不仅为我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号召全人类奉行一夫一妻制。所以我这样既对自己负责，也对所有的人负责；我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在铸造自己时，我也铸造了人。

萨特为了将笛卡尔给予上帝的自由还给人，他必须取消“上帝存在”这一预先假定，而宣称任何先天的价值都不再存在了，原因是没有一个无限的和十全十美的心灵去思索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是容许的。”这对存在主义来说，就是起点。的确，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会随即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命令，使我们的行为成为合法化。这一来，我不论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不是处在一个有价值照耀的光明世界里，都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的办法。人们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无法自解。当萨特说人是被逼得自由的，意思就是这样。

人的确是被逼如此的，因为人并没有创造自己，然而仍旧自由自在，并且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一位哲学家说："人是人的未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人现在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他总有个未来要形成，总有个未来在等待他。

萨特为了说明人是无依无靠地进行自由选择，自己担负自己的责任而形成自己的命运，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一个学生在下述情况下来找他。这个学生的父亲正和他的母亲吵架，而且打算当"法奸"。他的哥哥在1940年德军大举进攻时阵亡，这个年轻人怀着一种相当天真但是崇高的感情，发誓要替哥哥报仇。他母亲单独和他住在一起，对他父亲的卖国行径和长子的阵亡感到极端痛苦，她唯一的安慰就在这个儿子身上。但她儿子这时却面临着一个抉择，那就是或者去英国参加自由法国军队，或者和母亲在一起，帮助她生活下去。他完全懂得他母亲就是为他活着，他走掉——或者可能死掉——就会使她了无生趣。这个学生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非常不同的行动：一种行动很具体，很直截了当，但是只为一个人着想；另一种行动的目标要远大得多，是为法国人民的，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行动变得没有把握了，说不定会中途夭折。与此同时，他也在两种道德之间踌躇莫决：一方面是同情，是对个人的忠诚；另一方面，忠诚的对象要广泛得多，但是其可能性也比较有争议。他得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有什么能帮助他选择呢？没有。哪一个目的比较有用呢？是参加整个社会斗争这个一般性的目的，还是帮助某一特定的人生活下去的具体目的？谁能够先天地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而且任何伦理学文献里也没有规定过。

如果价值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价值太抽象了，不像在100元钱和10元钱之间作选择，100元比10元要多，这是明确的，人们肯定是要100元而不要10元。当然，如果是赔偿什么，人们会选择10元而不是100元。价值太抽象时，人们就没法用它来决定人

们目前所考虑的特殊的、具体的事情，那就只有倚仗本能一法了。这就是这一学生所面临的处境，也是必须得自己作出选择而承担起责任。其实，他在得到忠告之先就已选择了他将会得到什么忠告。事实上，各个不同的人会给他各不相同的忠告。同样，在他去找萨特之前，他也知道萨特将会给他什么忠告，而且萨特只有一个回答：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当萨特在之后遇到这个学生时，他说："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情感，情感真正把我推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我应当选择的道路。"问题是我们用什么尺度来估量这种感情的深浅呢？萨特说：只有付诸行动，以行动来说明和肯定感情的深浅。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本能、倾向和情感的程度最终只能通过所选择的行为来说明，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听任"这一词的涵意，即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

萨特想说明的是，除掉行动之外，没有真实。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意图上方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了爱的那样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莎士比亚的天才就是他所有作品中的表现。为什么我们要说莎士比亚有能力再写一部悲剧，而这悲剧恰恰是他没有写的呢？一个人投入生活，给自己画了像，除了这个画像外，什么都没有。人人都能理解到只有实际情况是可靠的；梦、期望、希望只能作为幻灭的梦、夭折的希望、没有实现的期望来解释人。总之，在萨特和波娃看来，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

波娃是倾向萨特有关人的自由选择的思想的，但她认为萨特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的现实境遇，而有些太强调主观，抽象的人的自由。萨特接受了波娃的意见，深入地思考了人的境遇和限制的问题。他们认为，虽然不能在每一个人以及任何人身上找到可以

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然而一种人类处境的普遍性仍然是有的。今天的思想家们大都倾向于谈人的处境，而不愿意谈人性。对所谓的人的处境，即一切早先就规定了人在宇宙中基本处境的一切限制。萨特和波娃认为，在某种意义下，选择是可能的，但是不选择却是不可能的，我是总能够选择的，但是我必须懂得如果我不选择，那也仍旧是一种选择。这一点在限制人们想入非非或者随心所欲上却是非常重要的。纪德不懂得什么叫处境，他的“行动”纯粹是随心所欲。相反，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是，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存在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在可能的处境中自由选择的绝对性质。萨特和波娃解释了人类的处境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处境,没有借口也没有援助，所以任何人以自己的热情或者发明什么决定论学说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就是自我欺骗。自我欺骗显然是虚伪的，因为它掩盖了人有承担责任的完全自由。一旦人看出价值是靠自己决定的,他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只能决定一件事，即把自由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不需寻求任何借口，不必为自己开脱责任，不要自我欺骗，要勇于投入现实中行动，依靠自己确实的判断，倾听自己本能生命之流动倾向。否则，他就是一个懦夫。尼采所说的强者的主人道德也是要自己赋予行动的价值和意义，尼采要人坚强自己、引向“超人”之路的要诀就是：上帝死了！人要自己决定自己，自我决断！

存在主义无神论者并不意味着它要全力以赴地证明上帝不存在。毋宁说，它宣称就算上帝存在，它的观点也改变不到哪里去。问题不在于上帝存在不存在,关键是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连一条证明上帝存在的正确证据也救不了他。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而基督教徒只有靠自我欺骗，靠把他们自己的绝

望同存在主义的绝望混淆起来，才能把存在主义的哲学形容为没有希望的。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取得了存在主义的胜利。萨特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震荡着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继此之后，波娃的《第二性》是对女人的存在境况的研究。《第二性》是“女存在主义者”、“女萨特”的第一次胜利，它成了女权主义者的《圣经》。

（五） 《第二性》——像“比基尼”一样震荡世界！“女人不是先天的，女人是后天成为的”

《第二性》首次发表于1949年，并于1953年译成英文。在50年代和60年代，它对于孤独的中产阶级西方妇女有着显著的重大意义；在70年代，它是妇女运动和人们提高觉悟的一个起点。但是到了80年代，它在读者中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当今，年轻一代的女权运动者批评《第二性》是悲观的，缺乏明确的解放方向。

《第二性》的出版对西方社会是炸药，能够激起强烈的恶意、虚伪、无礼和猥亵之言行的书寥寥无几。作家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文艺》周刊上愤怒地写道：“我们在文学上已经达到下流的极限。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人就给我们灌吐根以让我们呕吐。现在也许到了最后一次拯救性的恶心时期。”他甚至写信给《现代》杂志的一位撰稿人：“我已熟悉了你们女老板阴道的一切情况。”[①]莫里亚克这类作家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波娃揭露了性的神秘，而这正是那些作家贮备秘密的领域。

《第二性》被右派视为怪物，这并不奇怪；使波娃感到惊讶的是，左派也对它抱着矛盾的或不赞许的态度；共产主义阵线认为波娃的结论与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两样，即妇女的从属地位将随

① 《现代》是萨特和波娃主办的一个杂志，“女老板”是指波娃。

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消失。更有甚者，不论它的支持者或批评者都以为它只不过是个声明而已。

波娃说她在写《第二性》时，她还并不是一个女权运动者。她原来只是打算写回忆录。她是在这本书发表后才参加女权运动的，尤其是在这本书为其他妇女接受之后。她收到千万封妇女的来信，其中有些人说这本书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妇女的从属性阐述得十分清楚：有史以来妇女一贯是附属于男人的。波娃从事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对妇女和“女性的温柔”有关的神话进行了分析。为了对“妇女”一词加以说明，波娃对世界各国的宗教，礼拜，神话学和文学进行了认真研究。她指出所有文化都有相似之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在那些幻想和虚伪的文化中或被理想化，或遭贬低，这些都反映且强化了现存的妇女从属地位。波娃所关注的是妇女的具体经历，她详细地叙述了妇女从生到死的生活过程，指出：“女性的温柔”并非天生，而是女子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被“使其然”的。通过对于不同身份的妇女，如妻子、母亲、娼妓和神秘主义者的描写，波娃探索了社会所赋予妇女的极其有限的成功机会，讨论了作为一位独立自主的妇女所应有的思想意识。总之，波娃为妇女提出了一条唯一的出路：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而必将实现妇女的解放。

波娃跟随萨特主张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前提，提出自己关于妇女的理论。存在主义向任何关于所谓万古不变的“人类本性”的观点提出挑战；人类在变化中的特定环境里创造了自己；因此，她宣称世上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女人的本性”。她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妇女一贯被视为男人的“身外之物”。女人从来没有在同男人的斗争中获胜过。在男女的相互交往中，女子从未成为主体，而总是被视为客体。所谓的“女性”特征既不是荷尔蒙所支配，也非由大脑器官所决定。生理上的差异并不足以解释男性主宰一切的原因，妇女被排除在外，并将女性从他们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事务中排挤出去的时候，妇女的从属地位就被确立下来了。妇女接

受了这种状况，后来又通过教育手段一代一代地不断得到强化。

《第二性》一个重要主题是：女人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由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书中既对于现存的妇女从属性作了深入的描写，也对于妇女对这种从属地位的反映作了描写。人们经常认为，妇女在她们失去自由这一问题上抱姑息、暧昧的态度。但不管怎样，妇女从属性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她们也采用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波娃想使妇女明白：世上并不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女性地位。

波娃的话鼓舞了许多女性读者去抵制婚姻。波娃对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作了描写，她说，这个制度把妇女作为提供诸如家务、劳动、性、感情支柱和照料孩子等服务的经济依赖者。尽管在对待性行为的态度、避孕、合法的重组家庭和离婚等问题上发生了变化，婚姻仍然被视为是一个对妇女的从属性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制度。波娃的这些论述仍然是有其说服力的。波娃坚决反对：女人是先天的观点，即认为有"永恒的女性"气质的理论。有人教诲道，要做一个女人，像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于是，似乎每一个女人并非都一定是女人。女人似乎必须具有女人气质的东西。波娃问道：这种女性气质起因于卵巢的分泌物吗？或是柏拉图所说的精神本质？或是体现于沙沙作响的拖地长裙之中？虽然有一些妇女热烈希望把这种精神本质具体化，但这种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在圣托马斯时代，这种女性气质，就被认为是鸦片烟那样能使人产生梦幻效力的东西。

但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已不再承认那种固定不变的本性，那种决定了某些被认为属于妇女、犹太人或黑人的天赋特征的本性。科学认为任何特性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看作对于环境的反应。如果今天的女性气质已不存在，那么它们过去也并不存在。特别是很多美国妇女认为，女人不复具有这种"从属"地位。在美国，如果一个女人依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她会被认为是思想落伍者，她的朋友会劝她去找心理医生，以摆脱这种念头的萦绕。

第十章　多情的春天。密西西比河的情人

萨特倡导的存在主义运动迅速地从法国传播到整个欧洲，进而跃过大西洋在美国也掀起存在主义浪潮。萨特、波娃太有名了！他们的存在主义思想，他们的书，他们的演讲，他们的情爱和生活方式，整个法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知道，还有更多的人想知道。因而，他们俩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讲学。战后一段时期，萨特和波娃忙于写作，讲学，到过许多国家和地方。可在美国这个地方，他们俩人并非只是讲学，他们又各自地体验到新鲜的事情。

（一）　萨特说："陶乐勒丝对我很重要，但我要和你守在一起"

1945 年 2 月，波娃与萨特一起到葡萄牙讲学旅行。1946 年 5 月他们又一同到瑞士讲学，11 月又赴荷兰作巡回演讲，紧接着萨特被邀请到美国去讲学。

萨特从美国归来后，常同波娃谈起陶乐勒丝。如今，他们已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希望以后每年能有两三个月在一起。波娃感到有一种不安，她原以为吸引萨特的是冒险的浪漫色彩！看来这次浪漫色彩太浓了些，而且不会短暂。波娃突然寻思，陶乐勒丝在萨特心目中是不是比自己更重要？她与萨特持续 15 年之久的关系中，到底有多少仅仅属于习惯的成分？这种关系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独占权？波娃比过去更深切地认识了他，也感到更难理解他了。看来俩人间还有很大的差异。而萨特说，陶乐勒丝的反应、

情绪、不安、欲望完全与他协调一致。他们一同出门，她要停步的时候正是萨特要停步时，她要再度上路时正是萨特要再度上路时。这表明，他们的生命泉源里的生命节奏的和谐，而萨特与波娃之间还从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和谐。波娃心想，这种和谐是不是比她与萨特间的相互理解更为重要？波娃要将这个在嘴边发烫的问题向萨特提出。她问萨特道："坦白地说，我同陶乐勒丝哪个更重要？"萨特回答："陶乐勒丝对我很重要，但我要和你守在一起。"波娃理解这句话是："我尊重我们间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为什么了。"这个回答使波娃感到整个未来都岌岌可危了，心情一下沮丧，表情也木然了。萨特在这天的下午向波娃解释了他那句话的意思："我们过去总是把行动看得比言辞更真实。"波娃知道这种解释的含量，她相信了他。

（二） 在美国讲演的"最漂亮的存在主义女士"

因为陶乐勒丝的出现，萨特与波娃之间好像隔着一块玻璃。他们不再感到是同奥尔加的三人关系。在那"三重奏"中，萨特与波娃是"同谋"关系。而现在的三人中，波娃与陶乐勒丝是敌对关系。萨特似乎是中立的，他从波娃这里得到心心相印的语言交流和理解，从陶乐勒丝那里得到的是激情的东西，波娃多少有些惶恐不安。美国一直是诱惑他们向往的国家，没想到，萨特真的被那里的女人给迷住了！1947年1月，波娃也被邀请到美国去讲学。她没有想到，她在美国也燃烧起她一生中最热烈的情火！这是与萨特的感情不一样的，它是情欲的火焰！

波娃从心里喜爱美国。美国神话使波娃自青少年时期就产生了幻想。她看来自好莱坞的电影，贪婪地读福克纳和海明威的所有小说，她在酒吧听到萨克斯管如泣如诉地演奏美国乐曲时，她无法抵御布鲁斯的伤感，泪水模糊了双眼。要说美国，曼哈顿的

摩天大楼、亚利桑那的沙漠、加利福利亚的海滨、到处无边无垠的风景；那里是自由、冒险、充满各种机遇的乐园。

当波娃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她惊愕地发现：这里的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组织化"了的人，甚至少男少女，也缺乏任何内心的冲动。他们没有能力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独立想象，独立选择，独立决策。这种无能表现为对外界的顺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他们都把抽象的货币尺度作为判断的标准，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美国妇女也令波娃惊讶，她们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美国是一个男性至上的社会，但伊娃·梅里厄姆写文章认为，美国男性不是被女性，而是被"组织"打垮了。

波娃这次美国之行的目的是在美国各大学做巡回演讲。美国渴望了解法国的知识运动，期待从那儿获得新的思想意识。波娃一到美国，就受到记者们的包围，他们问她：何为存在主义？她拒绝以三言两语回答。所有的人都为她所倾倒。《纽约人》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介绍"最漂亮的存在主义女士"。人们期待她的令人惊奇的演讲！称她是"萨特的女性复制品"，娴雅淳美、谦逊端庄。

在普林斯顿大学，波娃用法语讲演了一个小时，听众无不入迷。演讲中，波娃说道："作家应该介入，作出抉择，并且自感肩负责任，因为我是自由的"。这是她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讲演的主题。她在《纽约时报杂志》周刊上解释存在主义："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我认为人类的存在应该支配现实、侵入现实，将现实的结构纳入人类的世界，从而表现出其反对一切事物的惰性的本身的存在。"正因这一点，她喜欢自选商场和百货商店，那里的一切都表明人类的设想会立即转变为有益于众人、众人都能获得的物体。这种实用主义的赞扬讨她的听众喜欢。她将存在主义说成为世界上最正常最合乎伦理道德的学说，人只有拒绝被动地安于现状，具有将人从现在推向未来、引导人接近事物、支配事物并给它们定型的冲动，人才成其为人；对人来说，存在意味着改

变现状。

她说："我们认为人是自由的，然而人的自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现实的和具体的：自由得以介入，它具有目标，并努力使世界发生一些变化。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赞赏以行为判断一个人的美国方式。"她告诉美国人，他们不知不觉已成为存在主义者，并因此向他们祝贺。

波娃想用她的双手、眼睛、嘴捕捉美国，她边走边观察，逛商店、进电影院、酒吧、饭店。这位不知疲倦的渴望了解美国日日夜夜的秘密的女探险家，希望抚摸美国的人、事物、城市里的生活，可是，她却偶然地、惊喜地获得了一个"爱的神话"。

（三） 我总是响应各种欲望的诱惑，我迷上了纳尔逊·阿尔格雷

巡回演讲将波娃带到芝加哥。在纽约时，波娃与纳莉的女士共进晚餐，她对波娃说："你到芝加哥时，替我去看看阿尔格雷。这个人令人惊奇，他是我的老朋友。"她将阿尔格雷的地址、电话给了波娃。波娃得知阿尔格雷是一个美国作家，他在小说中描写芝加哥贫民窟的生活，描写的对象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和吸毒者。这正是波娃想了解的。她一到芝加哥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并约定在芝加哥的帕尔默大酒店等他。第一次会面，开始是尴尬、烦躁、误解、疲乏，最后，他们都陶醉于深入的相互理解之中。阿尔格雷是一个高大俊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个冒险家、自由人、反抗者，一位与众不同的作家。

几个星期过去了，波娃又从芝加哥回到纽约，想从纽约回到巴黎。可这时，萨特给波娃写了一封信，要求波娃推迟归期，因为陶乐勒丝要在巴黎呆 10 天。这使波娃产生了怀乡之情。波娃此时想到："我旅游已经够久了，我想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臂膀上散散步，这个男人应该暂时属于我。"她于是给阿尔格雷打电话说：

“你能不能到这儿来?”他说:“不能,但很希望在芝加哥见到你。”波娃要他到芝加哥的机场去接她。

波娃又与阿尔格雷呆在一起了。波娃对阿尔格雷说:“我将永远在巴黎生活下去”,阿尔格雷没有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波娃向他保证,“我们会再见,但不知道这种会面在何年何月以何种方式实现”。就在失魂落魄的状态中,波娃回到了巴黎。

波娃虽回到巴黎,但仍与美国魂牵梦绕。写作的痛苦和兴奋不足以磨灭在美国最后几天的记忆。

(四) 重逢芝加哥

萨特不断接到陶乐勒丝的信。陶乐勒丝起先答应在波娃与阿尔格雷出外旅行时,前来与萨特过四个月,可她突然决定不来了。波娃渴望同阿尔格雷重逢,但她毕竟只同他在一起半个月,还不知道阿尔格雷对她到底有多大价值。波娃决定去美国旅行。起先,波娃与阿尔格雷商量好在美国待 4 个月,但后来又决定待 2 个月。波娃不敢明明白白地把新的安排告诉阿尔格雷。

1948 年波娃到了芝加哥。阿尔格雷领着波娃走访了一群吸毒成癖的小偷,还带她逛声名狼藉的酒吧;深夜,他领她去警察局,因为囚车常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各种人带到这里。他们一同前往观看杂耍表演,去动物园、赛马场。阿尔格雷同波娃在密西西比河看夜景,密西西比河的夜景把波娃深深迷住了。他又带她到墨西哥去游玩。

波娃一直没有把提前回巴黎的事告诉阿尔格雷。日子一天天过去,波娃终于鼓足勇气在墨西哥城到莫雷利亚的路上,她对阿尔格雷说:“我得在 7 月 14 日回巴黎。”“噢,好啊”,他这样答道。他如此冷漠地反应使波娃很伤感。波娃心想他对她并不怎么在乎。随后的旅程中,阿尔格雷一直对波娃很冷淡,他总甩开步子跑得

很快；当她赶上他时，他也不同她搭话。在旅馆，波娃不停地问："怎么啦？明明一帆风顺，你为什么要大煞风景？"他完全不为她的痛苦而动。当她痛苦地流下眼泪，他却快步离开。

阿尔格雷显得越来越神经质，墨西哥使他愈来愈心神不宁。一天，他们在阳台上俯视着巴罗克式教堂，品尝着可口的威士忌酸味鸡尾酒。这时，阿尔格雷说道："再这么过两天，我一定会惹事生非的，我会拿起一支枪，走到街上开几枪。"于是，他们就飞回到纽约。

波娃开始吞咽懦弱和轻率而得的苦果了。阿尔格雷与她交谈的神态已不像过去那样了，甚至带有敌意。一天夜里，波娃问他："你对我不如我对你那样体贴了吧？""对"，他答道："两者永远不会是一样的。"那天晚上，波娃倚着窗户，看着冷漠的城市，哭了一夜。有一夜，他们在中央公园中的一家露天饭馆吃完晚饭，随后来到咖啡厅听爵士乐，他显得格外不高兴。波娃对他说："我可以明天就走。"他们随后又说了几句话。突然，阿尔格雷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波娃一下子明白了，永远不能以任何理由怨恨他；所有的错处全归咎于自己。过了几天，波娃离他而去。波娃觉得这次美国之行犹如一场噩梦！

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两难处境，波娃说道："即使萨特不存在，我也肯定不堪忍受自己在不止一两年的时间里生活在一个会把我写作的原因和可能破坏殆尽的世界中。在他那里，他也决不会来巴黎过上半年。为了写作，他需要扎根于祖国，扎根于自己的城市，扎根于他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我们双方的生活很早就定了型，这两种生活也不可能互相嫁接。每一方都为对方不愿来同自己共同生活而痛惜。"

（五） 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温暖了

每周，波娃都会在信箱中找到一封盖着芝加哥邮戳的信。阿尔格雷来信说，他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与她结婚。到12月份信件到波娃手中时，阿尔格雷声称已几乎不和那位年轻女子约会了。他解释道：

我将不能与这位女孩保持关系了，她对我真的已毫无意义了。但是，这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我依然需要她在两三个月中给我带来的某种希望：与属于我自己的女人，或许加上属于我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在属于我的空间中。需要这类东西不足为奇，事实上，它相当平凡，只是我以前从未感受到它罢了。也许，这是因为我正步入不惑之年。你截然不同。你有萨特，有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对思想的浓厚兴趣。你生活在法国文化界的中心，每天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满足。相比之下，芝加哥几乎如乌斯马尔一般远离一切。我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毫无例外地围着自己转，我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我告诉过你，你也明白我是被粘在这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写这个城市，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做这份工作。重起炉灶已毫无意义。但是，这使我没有一个说说话的人，换言之，我已陷入我自己的陷阱里。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我自己选择了一种最适于写作我所擅长的那种作品的生活。政客和知识分子令我厌烦，他们显得不真实；我当今结识的大多数人是在我看来显得真实的人们：妓女、吸毒者，如此等等。但是，我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生活。这位女孩帮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我周围的现实。去年，我还担心因为对你不忠诚而毁坏了一切。如今，我懂得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我懂得生命如朝露，

生活太冷酷，我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中把一切温暖拒之门外。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谈到了这一话题：

那个可怕的下午，在中央公园的那家饭馆，我大煞了风景。自那以后，我产生了在上封信中告诉过你的那种心情，即想得到某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的心情。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几个月中对我来说如此亲近、如此可爱的那个女人带给我的（那几个月虽然已经结束，但这种心情丝毫未变）。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她，那肯定也有别人取而代之。这不是说，我已不爱你了，但你离我好远啊，到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相隔好久啊……我感到谈论我们早先的交往有点无聊。但我们只能这样无聊，因为你不会远离你的祖国来到芝加哥，我也不能去巴黎，因为我总要回到这儿，回到我的打字机旁，回到我的寂寞中，我总感到需要别的什么人来亲近我，因为你离得好远啊……

复信中，波娃无言以对。假如他们关系当即中止，波娃会一辈子感到苦恼、懊悔。在芝加哥，在密西西比河上，在危地马拉、墨西哥，他们度过一个个良宵，而突然的一刀两断会使这一切成为一个梦。使波娃感到兴奋的事又来了，阿尔格雷写信说，他 6 月份要到巴黎来，正在预订船票。波娃心境平静下来而又欣喜，但也不时地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俩人的关系注定要走向尽头，而且这已为期不远。

1949 年，阿尔格雷 6 月初的一天来到巴黎，他给波娃带来了巧克力、威士忌、书、照片和一件有花形图案装饰的便服。波娃带着他同所有的朋友见面。同萨特在一起时，他们的谈话有一点困难，因为萨特不懂英语，而波娃并无足够的耐心为他们翻译。不过，他们相处融洽。他们谈了一会儿铁托，又对中国议论了很久。中国是那样神秘莫测，种种夸夸其谈的学说往往拉上中国作根据。

人们惊愕地得知，毛泽东竟然会作诗词。这些革命家都是投笔从戎者，他们身上有着古代的聪明才智，这些同无产阶级结合，变成某种神秘的、诱人的人物。在“红玫瑰”酒吧里，博斯特和阿尔格雷一同回忆起军队生活。奥尔加惊愕地睁大眼睛，听着阿尔格雷讲的一个个故事，完全被迷住了。

波娃和一些朋友一起陪着阿尔格雷，逛街道和到舞厅里跳舞。带他参加了国家的一些庆典活动，带他欣赏凡高和劳特累克的画，也带他参观了格雷万博物馆，还带他观看赛马和拳击比赛；他们还一起去听疯狂的爵士乐。阿尔格雷想看看欧洲大陆，于是，波娃同他一起乘飞机去罗马。在阿尔格雷看来，意大利人更富有魅力。

回到巴黎，9 月的城市分外漂亮。他们在一起时还从未过得这么痛快。然而，阿尔格雷觉得旅行时间已够久的了，他要回美国去了。此时，阿尔格雷的著作已获美国的全国图书奖。

（六） 我给你的什么时候不是爱情？到此为止吧！

1950 年，波娃又一次来到芝加哥，同阿尔格雷度过了 10 月份。阿尔格雷就要同前妻复婚了。在 10 月的最后几天，波娃心想：“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见不到这所房子，见不到这个湖泊，也见不到这片百鸟云集的沙滩了。我不知道最令我怀念的是什么：是那个男人？是那片景致？还是我自己？”他们都想使分手尽可能平淡。最后那天早晨，他们俩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他们不想说话，但沉默又感到困窘。后来波娃说：“我在这儿过得很愉快，起码我们之间的友谊还在。”“这不是友谊”，他粗声粗气地回答道，“我给你的什么时候不是爱情？”

波娃回到巴黎，在平静了四个星期之后，这两句话在突然之间又勾起了波娃对往日的疑惑：假如爱情犹在，何必做这样一去

不复返的最后分手？她噙着眼泪，给阿尔格雷写了一封短笺，问他是不是真的什么都完结了。

阿尔格雷回信说："一个人能依然保持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同时又不让这种感情凌驾和干扰他的生活。如果你爱一个女人，而她又不属于你，她把其他事、其他人置于你之上，而且你又没有占据首位的可能，那么，难道你能忍受这种局面？我丝毫不为我们的交往而遗憾。但是，我如今需要另一种生活，我需要有属于我自己的女人，属于我自己的房子……。3年之前，我开始意识到你的生命属于巴黎，属于萨特，当时我大为失望。如今，这种失望已成为过去，时间把它冲淡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生命从你那边拉走。我的生命对你来说十分重要，但我不喜欢我的生命属于一个相隔那么远、一年又只能见几个星期的人……"

留给波娃的话只有一句：到此为止吧！波娃在复信中也是这么写的。7年前的情景宛如发生在昨天。波娃再次埋葬对芝加哥的记忆，不想让那段爱情再使她痛苦。她已不再那么喜欢所谓的冒险了。在她看来，年龄和生活环境也不允许她去寻找新的爱情。波娃曾写道："我的肉体轻而易举地适应了新的习惯；它不再涌动什么欲望。但我内心不愿屈服于这种生理方面的冷淡。我将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肉体温暖着睡觉了。永远不能，这多叫人丧气！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自己正坠向死亡。"

（七）　公开于世的情书

1981年，阿尔格雷回答了记者W. J. 威泽白的提问，这位记者是就他的最近一本书《魔鬼的袜子》来采访他的。当话题涉及到爱情方面时他回忆起往事，对波娃发怒，"她在《一代名流》中以莱维的名字将我也写进书中；在一卷回忆录中，她把我们的爱

情描写成一场国际的和文学的伟大冒险，她透露了我的名字，列举了几段我给她的书信。她的出版商请求得到我的允许，我说：OK。然而是不情愿的，因为情书本应该属于私人范围。我曾经游历世界各地，进过窑子。所有的女人，不管是在朝鲜还是在印度，总是关着门。然而这个女人却敞开大门，召唤公众和新闻界……我不再恨，可是我认为这种做事方式非常可怕。我猜想这也是欧洲人对待现实的方式吧。”

阿尔格雷越来越恼火。记者知道他已经72岁高龄又患有心脏病，因此有些害怕了，他竭力使阿尔格雷安静，改变话题，然而这是徒然的，阿尔格雷正怒火中烧。“既然她发表了我的情书，我也要发表她的，它们将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喊道，“我们书信的一半被她商业化了，为什么我不将另一半也商业化呢？她的所有书信都在那儿。”他打开一个壁橱，用拳头敲击一只巨大的金属匣子。他愤怒之极。记者悄悄走掉了。第二天，为庆祝他的书的出版，阿尔格雷将在家里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第一位客人推开门时发现阿尔格雷躺在地上。他死了，被心脏病发作压垮了。爱情毁了他。虽然经过两次结婚，两次离婚，但他最后的愤怒却是对着他依旧永生不忘的波娃的。这位美国情夫在向一位被他的狂怒和激情震惊的记者吐露隐情后孤独地离开了人间，这是一次没有仪式的永别。

阿尔格雷去世前夕给前来采访的记者看的金属匣里藏有两枝枯萎的花：这是一些采自法国一个偏僻的地方的风铃草。它们束在一封信里，30年来，妥善地保存在波娃寄给他的1800页书信中间。从这些信中，我们不难察觉，偶然出现的波娃像缪塞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温柔、调皮、敏捷、苦恼，而且极其多情。

这些情书蕴藏着波娃《回忆录》里缺乏的某些东西，它们出于一位随心灵的悸动而写作的作家之手，是一种感情自发的见证人。透过表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位讨人喜欢、动人而敏感的女性。其中一封信被这位狂怒的情人撕碎，而后又被精心地、满怀温情

地粘了起来。一次阿尔格雷恼怒中将这些书信全卖了，而后又立即买了回来。它们在这个金属匣子里，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阿尔格雷，我亲爱的……”，“我亲爱的阿尔格雷……”，“我亲爱的情人，我每天都在靠近你”，波娃以“完全诚实”的心讲话。

在淡紫色的风铃草旁边的信中，波娃向阿尔格雷叙述自己的生活，跟他谈萨特，谈“自家人”、朋友们，谈波斯特、奥尔加、旺达、维昂、让·热内、穆卢迪，给他讲迪兰重演的《苍蝇》一剧的排练过程，《现代》杂志的工作，以及她所写、所见和她的旅行生涯。波娃回忆起阿尔格雷曾跟她说过：76 岁时我们一起死吧。她说：这将是最理想的，然而 76 岁太早了。并且对他说，他们的相遇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毫无疑问，每封信中不断重复的勉励是真诚的：“我们不应该意识到分离。相反，当我们在 9 个月或 10 个月后重逢时，我们一定比分离时更加亲密无间。”波娃不仅不放松自己的写作，而且还挤出时间来翻译阿尔格雷在美国发表的短篇小说《多盐的面包》，译文后来发表在《现代》杂志上。

波娃当然知道阿尔格雷需要芝加哥如同自己需要巴黎一样，而且波娃也离不开萨特。然而，对于阿尔格雷这位受了打击的美国情夫来说，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接受她所给予的，接受这种分享；要么失去一切。阿尔格雷爱波娃，对这位与男人一样自由的作家的爱情和欣赏征服了他。他觉得自己被这位光彩夺目的、不循习俗的妇女超越了。但个人的性格和追求，注定他们永远不会生活在一起。

第十一章　不惑之年的行动

（一）　《一代名流》

波娃对愈来愈吸引萨特的政治实践并不感兴趣，她只想通过写作采取行动。1949年，她着手写作《一代名流》。她希望在这本书里写进自己的一切，尤其是叙述令人烦躁、绝望、虚无、荒谬感的战后历史。人们所谓“抵抗运动的失败”使她感到不安，她发现一种幻想的消失。

3年来，波娃一直忙于撰写《一代名流》。在这本书里，她倾诉了对阿尔格雷的恋情：奇异的相逢，断肠的离别。她将这种不灭之爱转换为文学以求自我解脱。她让萨特阅读手稿，萨特的批评第一次令她不安。她相信这本书将是一种失败。夜里她紧张得梦见书中的人物，醒来时，她记下梦中闪现的句子。44岁的她以为生命对于她就此结束了。

《一代名流》于1954年10月发表了。《巴黎新闻》上登有一篇颂扬《一代名流》的文章，波娃颇为震惊，因为她料想《一代名流》会像《第二性》那样遭受指责。萨特告诉她《法兰西文学》周刊给予小说极高的评价。4万册书不到1个月就销售一空，伽利玛出版社立即谈论起龚古尔文学奖一事。

在这本书中，波娃花费了如此多的心血，以致这辉煌的成就引起的喧哗反而使她局促不安。她有时一想起这些素来漠不关心或是敌对的人注目这本书，她的两颊就发烧。书中的人物、作家亨利体现了追求创新的一面，波娃赋予他生存的乐趣，行动的快乐，写作的欢娱。后来她非常惊奇，因为评论家认为：亨利就是

加缪。她在书中描述了“自家人”，这是指《现代》杂志的小团体。书中迪布勒伊以其荣誉和无度令人想起萨特。迪布勒伊像萨特那样狂热地献身于政治和文学。书中的莱维是阿尔格雷的化身，波娃写信告诉他：这本献给他的书，是描写1945年到1948年间法国人的小说。此书试图叙述战后的法国百废待兴的新生和后来漫长的醒悟过程。这是一本描写大量的人和故事的长篇巨著，书中用相当的篇幅描写了波娃与阿尔格雷的亲密关系。波娃在给阿尔格雷的信中写道：“我设法叙述我们的故事。”波娃说道：“在书里，当我追念这逝去的一幕时，一切都是如此真实，近若咫尺，令人感伤。这不容易，我太眷念你了，你在我的记忆中如此俊逸。”

1953年，《一代名流》在美国出版，记者纠缠阿尔格雷。记者们认为书中的莱维就是阿尔格雷。阿尔格雷发现波娃几乎毫无改动地描述了他们之间的情爱故事。阿尔格雷感到非常愤怒，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知羞地坦露他们的情爱呢？这是法国女人的方式吗？他撰写了一篇冷酷的幽默文章，然后给波娃寄去 一封信，预先通知说他将给她打电话。她等待着他的电话，可电话一直没有打来。她寄去一封信，他也回信了。由于《一代名流》的发表，波娃和阿尔格雷恢复了中断了5年的书信往来。

伽利玛出版社的人们确信，波娃的《一代名流》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很大。波娃也渴望得到这个奖，并拟定了许多方案来处理她焦急不安期待着的奖金。在公布这个奖的那天，她始终都坐在收音机旁边期待结果，那激动不安的心跳个不停。中午12点，她获胜了。《一代名流》以7∶2的投票战胜了雷蒙的《美好的时刻》而荣获文学奖。当天的晚餐聚集了萨特、维昂、奥尔加、波斯特、朗兹曼和作家西皮翁、记者罗兰，庆贺波娃的胜利。

不少评论家谴责评委背离了龚古尔兄弟的遗嘱，将荣誉授予一位业已成名的作家。更多的人从小说各个情节中发现了以现实为基础的移植书中的插曲，并给作品中的人物加上真实姓名。波娃声明《一代名流》是一部重要小说，她已经将一切都“拆碎、改

变、捶打、膨胀、重新组合、前后挪动、扭曲，有时甚至颠倒”，旺达能够在某一个人物身上找到自己吗？可旺达勃然大怒，用餐刀戳《一代名流》，弄破了自己的手指，割断了手腕上的血管，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波娃用龚古尔文学奖金和一个月售完13万册的版税，在塞尔街买下一间艺术室，后来她一直住在那儿。1956年，圣职部像对待《第二性》那样将《一代名流》列为禁书。天主教徒不能读这部大家谈论的作品。《罗马观察家报》评论道：“波娃的所有作品都让人们呼吸某种存在主义哲学散发出来的毒气。如果一个社会汲取这样一种文学作为营养，那么它将会真正地腐朽，走向堕落，陷入被奴役状态。其作者认为应该保护恋爱自由，婚姻制度是故弄玄虚……。天主教会必须竭力控告这些践踏良好道德风尚，破坏家庭圣洁的学说。”波娃这部描绘一个腐朽世界的小说，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阶层。波娃的作品持续不断地遭受各方面的攻击，带来了连续不断的笔战，也获得了许多读者的褒奖。

（二） 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新鲜又回到了我身边

波娃在自传中写道：“年轻的女子们对在她们成年后，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都有着敏锐的感觉。她总是说：‘我真不懂，一个女人过了40，怎么还染发，怎么还穿着比基尼展示自己，怎么还向男人们频送秋波’。30岁时，我也曾下过同类的决心：‘40岁以后，人就不该再去追求什么爱情了。’我厌恶那些被我称为‘丑婆’的女子。我向自己保证，到那个阶段，我会理所当然地‘安分守己’。尽管这样，我在39岁时照样搞了一次恋爱。如今，我已过40岁了，已被划到日薄西山的那一类人中了，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尽管我的肉体对这种划分毫无异议，我的想

象却不那么驯顺。当又有机会使我回到生活中时，我欣喜地抓住它不放。”

6月将尽，波娃打算驾车去米兰。萨特乘火车去，在那儿同她会合。她们俩人计划在意大利作两个月的旅行，同时，波斯特正兴高采烈地准备飞往巴西。为了给波斯特送行，波娃建议把朗兹曼请来，几位朋友一起把波斯特送上了飞机。第二天早上，她的电话铃响起，是朗兹曼在说话：“我想带你去看电影。”“看电影？什么片子？”“噢，随便哪个片子都行。”她犹豫了片刻。她最后几天的日程很满，但她知道她不能拒绝。于是，她们约好碰头的地点和时间。波娃和朗兹曼的约会，不是仅仅看电影，而是很快他们陷入情和欲的交融之中。5天以后，波娃离开了巴黎。当她起动车子时，朗兹曼站在人行道上向她挥手告别。波娃知道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情感，她沉浸在一片分离的柔情之中。

在波娃度假期间，朗兹曼去以色列跑了一趟。他们互相通信。波娃回巴黎两周以后，朗兹曼也回到了巴黎。他们的情和欲又一次愉快地重逢了。他们互相倾诉往事以便建立共同的未来。为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朗兹曼劈头一句话就是：“我是犹太人。”波娃懂得它的含义。朋友们对朗兹曼的犹太人身份不置一词。朗兹曼坚持要波娃认识这一点，因为这是他生命中压倒一切的力量。

为何朗兹曼要人们，至少是波娃认识到他是犹太人呢？这与朗兹曼的成长有关。在孩提时代，他一开始有着一股自豪劲。他父亲常摊开世界地图，告诉他说：“我们无所不在。”当他到13岁时，他看到了反犹太主义，整个世界为此动摇，万事万物无不受到影响。当他与别人交谈时，说到“我是犹太人”，对话总是戛然而止，问话者成了一个又盲又聋的凶猛动物。到后来，他不知道到底是说自己是犹太人还是不说自己是犹太人才算撒谎。因为他的特殊出身，他被世人所厌弃，而在他这个年纪，是多么喜欢与他人交往啊。这种孤立状态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他的父亲是最早一批抵抗战士中的成员，是他使朗兹曼恢复了自豪感。在朗

兹曼还是克莱芒费朗公立学校的学生时，他也成立了一个抵抗组织。1943年10月14日以后，他到了一个游击队营地中参加了与德国法西斯的战斗。这样，他的经历显示了犹太人并非顺从苟生、低人一等、受人迫害之辈，他们可以成为斗士。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名字总使他内心充满自豪。随便什么时候，一旦他发现某位知名人士是犹太人时，他总眉开眼笑。当人们在赞扬杰出的苏联物理学家朗道时不提及他是犹太人，他会气得七窍生烟。

朗兹曼留恋孩提时代，怀念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世人皆兄弟的岁月。可是，现实已把他撕得四分五裂，世界已陷入一片混乱。他想把自己重新拼起来，他也想找回世界的秩序。20岁时，他曾相信文化的世界性。他勤勉地钻研，以便使世界性的文化也成为他的文化，因为他感到它还不完全属于自己。他寄希望于真理所具有的调解力；但是，人们还是带着情绪，带着功利对待他，他们还是四分五裂。无论是知识还是理性都不能帮助他避免孤独。他只能无可奈何地陷入孤独状态，体验由偶然的出身带来的种种感受，到最后，他竟变得厌恶一切。他知道，凭内心取巧，他不能得到解脱；他唯一的拯救之道是，相信某种客观的必然性，以便使自己继续活下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至少同他自身的存在一样，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他和共产党人在有些观念方面是相互合拍的，因此，他一度从共产党人的目标中看到了自己的梦想。于是，他有一段时期抱着非常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是，朗兹曼的这种乐观主义令波娃厌恶，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的逆转罢了，因为他需要有一个颠倒一切的远景来补偿他往昔遭受的种种苦难。朗兹曼这么一个思想敏锐，甚至可以说思想成熟的人却抱着善恶对立说不放，真令波娃大为诧异。由于他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对手看作绝对恶的象征，人们如果要重建失去的天堂，他们必须毫无瑕疵。在他眼中，没有什么是完全真实的，尤其是他本人就不完全真实。在他孩提时代，世界迫使他要么否定"犹太

性”，要么否定自己的个性。因此，他的“自我”已经被世界窃走了。他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摆脱情绪和欲望的支配，无法抑制自己狂烈的想象。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禁忌和规矩置之不理，悲伤时听凭自己流泪宣泄，反感时听凭自己口出恶言。波娃、萨特以及好多朋友都是清教徒。他们总压抑自己的感情，务使自己的举止不出格，感情很少外露。朗兹曼这样率意而行，使波娃感到不很习惯。不过，正是在朗兹曼情绪发作时，才显得与波娃更近。“当初”，波娃说：“我同他一样，往往凭着一股狂热制定计划，随后如痴如狂地坚持不懈。我往往也号啕大哭。如今，在我心底依旧埋藏着对往日狂热的留恋之情。”

作为一名犹太人，也作为一个长子，朗兹曼从孩提时代起就肯肩负种种责任，这使他在内心达到了可贵的成熟。因此，波娃说道：“我同他讲话时，总是忘记他比我年轻。但我们明白两人相差 17 岁，不过，这个差距并没有使我们着慌。对我来说，如果要真正奉献自己的心，我需要某种距离，因为我不想去重复我与萨特间具有的那种理解。阿尔格雷属于另一个大陆，朗兹曼属于另一代。”这种差异使波娃与朗兹曼的关系维持了一种平衡。他年轻，因此，她同他在一起的时间注定占他生命的一个短暂的部分。这也为波娃提供了一个借口，可以不必在现在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12 月间，他们在荷兰过了两天。他们沿着封冻的运河漫步，他们坐在窗帘紧闭的小酒馆喝阿德沃卡特酒，他们不停地交谈。波娃每年的夏天都要与萨特共度假期，这使她左右为难。她不想放弃那假期，但是，如果同朗兹曼一别就是两个月，那又会很痛苦。最后，波娃与朗兹曼商定，波娃每年夏天同萨特在一起 10 来天，再和朗兹曼在一起 10 来天。谈着谈着，波娃和朗兹曼之间最后几分拘束、最后几分疑虑也消散了。回到巴黎，他们已经讲定在一起生活。

在共同生活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早上，他们肩并肩地写作。他从以色列带回一些旅行笔记，想把它们写成一部

游记。在朗兹曼到以色列旅行期间，所见所闻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看到，在以色列，犹太人并非局外人，他们是拥有一切权利的民族。他带着自豪，也带着某种反感发现，那里有犹太人的船只、犹太人的海军、犹太人的城市、犹太人的田野以及犹太人的树林，但是，那里也有贫富分化。惊愕之余，他给自己提出了有关他自己的几个问题。他也给萨特讲述了自己的观感。萨特劝他写一本书，把以色列的情况与他自己的身世融为一体。朗兹曼觉得这个主意很有吸引力。可是，真正写起来，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他才25岁，缺乏写他自己所必需的洞察力。虽然他的头开得很好，但他马上碰上了来自他自己内心的绊脚石，最后被迫搁笔了。

由于朗兹曼与波娃一起生活，波娃摆脱了自己年龄的困扰。首先，她打退了焦虑的冲击。有两三次，朗兹曼目睹波娃正经受这种冲击，分外着慌。鉴于此，她痛下决心不向焦虑低头，因为波娃觉得，这么早就使朗兹曼体验衰老带来的恐怖，那太可恶了。其次，有他在，波娃复苏了对万事万物的兴趣。在此之前，她的好奇心早就收敛了。她正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存在，她的处境、命运、工作都是有限的，这限制了她的欲望。在过去的岁月，她曾期待一切从自己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出现！现在，虽然她还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虽然还是注意新出版的书，新上映的电影，新展出的绘画，新开演的戏，但是，她更关心的是如何支配、深化、完善早年的体验。对朗兹曼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新的，这样，他往往使波娃得到了意外的启示。正是由于他，数不胜数的东西——喜悦、惊愕、忧虑、开怀大笑——世界的新鲜又回到了她身边。就在前两年，世界形势暗淡，朗兹曼正巧也遭到了恋爱的挫折，同时又得到了身体在衰弱的第一次警告。如今，他们跳到了幸福的天地中，战争也在退却，他们沉浸在个人生活的欢乐中。

她还像过去一样经常去看萨特，但是，她的习惯改变了。新年前夜，他们一群人——波娃、萨特、奥尔加、旺达、米雪尔、朗

兹曼都聚在波谢里埃路，他们都特别高兴。他们几个人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不须动口，一个微笑即能表达千言万语。在这样的小群体中，交谈更成了世上最惬意的消遣。相反，一旦缺乏他们所达到的默契，交谈则成了一桩困难的、常常是无益的苦差事。这时，波娃已经对乍合即离的会面失去了兴趣。莫尼凯·朗依提出要带她去同福克纳共进晚餐，波娃回绝了。一天夜里，萨特在米雪尔家与毕加索和卓别林一道吃晚饭，她没去。波娃宁愿与朗兹曼看《聚光灯》。

（三） 中国、苏联之行

波娃渴望访问苏联，但更想去中国看看。她已经读了贝尔当的报道。虽然为数很少，但只要是以法语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她都读过。她曾经一连数小时地欣赏卡蒂埃-布雷松的画册。波娃自述到："我们遇见的旅行者，只要去北京，无不以炫耀的口气谈论它。当萨特告诉我，我们已经得到了去那里的邀请时，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6月，当我们坐在北京，观看奇妙的京剧表演时，我还在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这次旅行非同一般，它不是到处闲逛，不是冒险，不是为了增加阅历，而是一次实地研究。对波娃来说，中国完全是个陌生的国家，直到见面前，她总想象不出中国人是怎样一副模样。另一方面，除了两三个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以外，波娃和萨特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也不代表什么。中国的某些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与波娃交谈的中国人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之外，彼此的话题就转到了烹调。双方的这种互不了解，比各种各样的政治障碍更严重地妨碍了相互的交流。不过，波娃喜欢京剧，喜欢那程式化的做功，喜欢那悲剧性的急迫音乐，也喜欢那细长如鸟啭的嗓音。她喜欢北京的灰色

胡同和北京的金秋之夜。有时是在看戏的时候，间或也在沿街散步的过程中，她耳闻目睹的一切突然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一下子忘却了自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她正面对着一个自己正努力去理解，但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确难以理解。波娃是第一次来到远东，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她看到了，当贫困困扰着6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她也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体验互相交叉，互相重叠。波娃写道，中国人的贫困只是通过他们为克服它所作的努力才显示在眼前。正是因为这种贫困，中国政府的建设任务才这样严峻。看看从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他们的欢乐和愁苦都在一块奇异的面纱后面掩盖起来了。不过，通过看、问、比、读、听，波娃最终还是从自己朦朦胧胧的意识中归纳出这样一种认识：中国人在几年以前已胜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国大地上猖獗的种种苦难——肮脏、寄生虫、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也有东西吃了。随后，波娃又看到这个国家是以怎样现实的急迫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她渐渐觉得，无论她的观感多么表面，假如把它们写下来，想必十分有趣。

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波娃在莫斯科呆了一整天。不过，没有谁，也没有任何事来败坏她这一天的兴致。由萨特做向导，从一早开始，她就在莫斯科大街小巷上转悠，一直到克里姆林宫塔顶上鲜红色的星星亮起，她才返回。在中国访问结束后，从北京返回的路上，他们又到了莫斯科，在那儿过了一周。莫斯科使她眼花缭乱，这正和当初她一走出物资长期短缺的欧洲时，纽约使她眼花缭乱一样。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西蒙诺夫到机场来接他们时，天色已暗。他们同西蒙诺夫夫妇吃了晚饭。因为西蒙诺夫的妻子是一位著名女演员，所以总有人盯着她看。他们吃饭的地方在苏维埃港。一到晚上，那里的饭厅改成歌舞酒吧。又回到了能

随便吃，随便喝的地方，多令人愉快。酒吧中有一支乐队，人们正在做即兴表演，一对对男女两颊泛红，频频起舞。穿过城市，只见到处在建设。不过，他们用的不是泥刀和小泥兜，他们有的是卡车、推土机、吊车、蒸汽锤等大型机械工具。差不多在每个街区，至今还有一两幢旧式的枞木层，不过，在这些地方，几乎到处竖有电视天线。

波娃与苏联原著名作家、现为文化官员的爱伦堡见了几面。他满脸是毛，体格结实。如今，他的打扮随便、大胆，灰绿色的粗毛西服、桔黄色的衬衫、毛料领带。不过，他的身体已非昔日。在一头梳理整齐的白发下，他的脸变长了。他声音宏亮，法语说得十分流利。在波娃看来他身上只有一点令她不舒服，那就是他的自信。他自以为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使者，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都不能怀疑他真理在握；于是，他自然而然地以权威自居来发言、讲话。还亏得他有多面的、强烈的魅力，他才没显得那么武断。他以友好的、几乎是祖父般的口气，把萨特批评了一番，说萨特向《解放报》记者发表的有关苏联情况的谈话在几个细节上不对头，因为，和解是如今的当务之急。他本来曾打算建议一家杂志刊登萨特的《美国纪行》的节选，但现在他认为这样做不合时宜了。爱伦堡还跟波娃谈起了《一代名流》。在莫斯科，所有懂法语的知识分子都抱着赞同的态度阅读、讨论这本书。尽管他们认为那个恋爱故事是画蛇添足。“不过”，他补充说，“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翻译你的作品。”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在文学方面，俄国的传统是过分拘谨；第二，前几年有关劳动营的讨论本来不会使任何人着恼。但是，人们如今知道，这种事情是真的，这样，情况就不同了，过去的那些流放者不愿意让人在伤口上撒上一把盐。爱伦堡还给波娃讲了几则有关斯大林的奇特故事。其中一则是这样的：有一次，斯大林同几个作家非常随便地交谈，他说道：“要成为大作家，有两条路，一条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绘制宏伟的、具有悲剧色彩的画卷；另一条是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异常精确

地描绘生活的细枝末节。”他打了一下顿，又说道：“假如我是作家，我就做一个契诃夫。”为了使苏联的创作“解冻”，爱伦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在他的杂志上，他试图尽量多地创造与西方接触的机会；他也保护非官方的绘画。凭他敏锐的头脑，凭他常被人称作是“先锋派”的情趣，他致力于在已有的自由主义和苏联的正统理论之间创造有效的和谐。当然，这项工作自然不会毫无危险。

波娃现在才明白萨特一年之前为什么会住进医院：俄国作家们的身体个个棒得要命，而他们好客的要求个个如命令，让你难以拒绝。在波娃和萨特访问苏联期间，从全苏各地区来的评论家在莫斯科召开全体会议。西蒙诺夫请萨特参加他们在一天下午举行的会议。在此之前，他们先要与西蒙诺夫及几个从格鲁吉亚来的朋友吃午饭。“好啊！不过我不喝酒，”萨特说道。他们表示同意。不过，饭馆餐桌上还是摆上了 4 瓶不同的伏特加以及 10 瓶葡萄酒。“只尝一口，”西蒙诺夫劝道。随后，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酒，前后 4 次给杯子斟满。接着，又不能不喝下一点葡萄酒，为的是吃下一道野蛮、豪华的菜：一只在烤肉铁钎上烤熟的血淋淋的肥壮羊腿。西蒙诺夫和其他三位客人笑呵呵地说他们曾通宵作乐，莫斯科人与格鲁吉亚人互相一杯接一杯地比赛喝伏特加和葡萄酒；就在前一天晚上，西蒙诺夫也通宵没合眼。几个人就这样不停地喝，直把所有的瓶子都倒空才作罢。但是喝完以后，西蒙诺夫他们个个面不改色，话语不乱。

在访问苏联期间，波娃不得不写两篇文章，接受了记者的几次采访，在电台上发表了谈话。她患了感冒，也累坏了，躺在床上过了一整天。她病了的这一天，享受着孤独，享受着寂静，读了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通向耶稣受难之路》。

在回国时，波娃越发坚定了决心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作品。她认为，饱食终日的西方人不可能抽出自己的点滴工夫关心别人的冷暖。不过困扰他们的无知，或者说他们所喜欢的无知，仍使她

感到茫然。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使反共分子们多少受到了打击。于是，他们转向中国，把它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一味为中国人一式穿蓝衣服(这样的情况只有在穿单调服装已成传统的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地方才存在）而遗憾，却闭口不谈还在不久之前，3/4 的中国人衣不蔽体。类似的一些极端歪曲真理的情况触动了波娃，她随即想起了自己在赫尔辛基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她要通过揭穿从香港传出的种种宣传，使自己变得有用。这个任务的确很艰巨，但这并没有使她却步。这是一桩需要她作出相当努力的任务。为了弥补她记录中存在的空白，她往图书馆和情报中心，去查阅有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报告、文章、论文、书籍和数据。她也没有忽视阅读那些由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所作的种种指责文章。她拜访了几位汉学家。他们给她帮助，解答她提出的问题。收集材料花费了她不少时间，而把这些材料同她自己的种种发现相结合，最终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认识，则需要她拿出更多的时间。她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从头到尾紧张地工作过。早上在自己家中，下午在萨特那儿，她不停地工作着。有时，她甚至一连 4 个小时扑在写字台上，连头也不抬一下。

不用说，当《长征》出版时，波娃受到了反共分子们的攻击。特别是在美国，当译本问世时，一片哗然。这些美国人，听信阿伦·杜勒斯散布的胡言乱语。不过，自该书出版年以来，包括勒内·杜芒、若苏·德·卡斯特罗、蒂博·芒德在内的几个专家(他们之中谁也不能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证实了她当时所说的一切。中国是唯一的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如果把她同印度、巴西等国作比较，这个胜利看起来几乎是奇迹。

波娃本人从这项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在把她自己所在的文明与另一种相差悬殊的文明相比较时，她发现，一些过去在她看来是双方共同的属性事实上根本不是共同的。即使是田野、农民、村庄、城镇、家庭这样简单的词，它们的含义在中国和欧洲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她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在这个

时期，她读了莱维-斯特劳斯的《可鄙的热带地区》。在她看来，这本书的优点之一在于使她宛如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了地球表面的一切。这倒不是因为他所作探索的范围很广，而只是因为他采取了新的眼光。波娃想采用同样的眼光来描述北京以及她过去走过的其他地方。总的说来，这次旅行摧毁了她旧有的立足点。到那时为止，尽管她阅读面很广，尽管她走马观花地去了几趟墨西哥和非洲，但她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她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他地方始终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什么地方朦朦胧胧地存在着。看到中国的老百姓以后，她对这个星球的全部看法被动摇了。从那以后，远东、印度、非洲以及那里的长期食品短缺成了世界的真面目，而西方的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

波娃说："《长征》一书不如《美国纪行》那样生动，书中有些章节也早已过时，但是，我丝毫不为自己为此付出的辛苦懊悔。仅仅通过写这部书，我就获得了一个知识框架，找到了帮助我理解其他不发达国家的钥匙。"

（四） 加缪之死

波娃和萨特曾深切地喜爱过加缪，后因政见不合而分道而行。而加缪的突然之死震惊了他们。波娃在自传中写到，一月的某天下午，她独自一人呆在萨特的寓所。电话铃响起，朗兹曼告诉她："加缪刚刚死于车祸。"加缪是陪伴一位朋友从法国南部返回，小汽车撞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上，他当即身亡。波娃搁下电话，喉咙紧缩，嘴唇发颤。她站着，靠在窗户上，望着夜幕盖上圣日耳曼-德普雷，既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真正感受悲痛。萨特同样感到沮丧。这一夜，他们和博斯特一起老是谈加缪。晚上上床之前，她吞下几片苯巴比妥，但就是睡不着。波娃下了床，抓起一件衣服套在身上，走出屋，在黑暗中散步。她哀悼的不是刚刚

去世的那位50岁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严谨，本质却傲慢、暴躁，没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由于他赞同法国犯罪，波娃早把他从自己心间赶走了。她哀悼的是在他们抱有希望的年代，神色开朗，谈笑自如的同伴，哀悼的是疯狂地享受生活及其乐趣、胜利，追求同志情谊、爱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的作家。死亡把他送回到生活中，对他来说，时间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昨天与往昔的昨天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波娃当初曾热爱过的加缪从周围的黑夜中升腾起来了。每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同时逝去的也有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每一个人各为自己心爱的不同时期的他而哭泣。清冷的雨潇潇而下，奥尔良大道两旁的门洞里，流浪汉酣然大睡，他们生活的是另一个世界。贫困、不幸、城市、世界、生、死一切都使她肝肠寸断。

波娃想到：他不能看到今天早晨了，这样自言自语已非首次，但一天的第一次都是首次。她看一切时，无不带着已死的他的眼光。她早到达了万物皆无的彼岸，带着无言的痛苦意识到，即使自己不存于世，万物仍会继续存在。整整一天，一直摇摇晃晃地在那不可能经历的天地的边缘，触摸着自己虚无的另一面。

波娃本打算在那天夜里再去看一遍《公民卡恩》。她去剧场太早了，于是坐进对面的那家咖啡店。人们在读报纸，头版的大字标题和照片使她睁不开眼，而他们却过分冷漠。波娃在想爱着加缪的那个女子，想象她看到在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那张面孔时的痛苦。乍看起来，这张面孔似乎既属于她，也属于每一个人了，但这张面孔却不再能说话，不能告诉她实际不是如此。人的内心的痛苦被别人在每一个街角传扬、广播，这多么折磨人啊。米歇尔·加利马尔因意外事故受了重伤也死了。加缪、维昂、米歇尔，一连串的死亡开始了。这一过程还会继续，直到有一天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一天或早或晚，将不可避免地来到。

（五） 古巴之行

萨特与波娃常痛惜年老一步步地扼杀了他们的好奇心，但他们一直对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他们还是觉得有责任亲眼看一看在古巴正在进行的革命，应该支持卡斯特罗。于是，他们偕伴作一次古巴之行。

一踏上土地，眼前头晕眼花：颤动的教堂，肆虐的阳光，蜂拥而至的宴会、恭维和提问（有一个记者问萨特："你对古巴革命有何想法？"他答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一张张陌生的脸。汽车带着他们沿着一条宽广的公路向前，两旁是棕榈树和硕大的鲜花。路上，有人给他们简要地介绍途经的地方、纪念碑，但波娃听而不闻，她眼前看到的只是左边那浩渺的大海，只觉得睡意朦胧，全身燥热，想洗一个淋浴。然后，他们坐到了二楼窗户前，窗下是一个灰色的石头广场，广场边是一座很美丽的教堂。波娃拿着一杯鸡尾酒（在萨特的笔下，这酒非常醇厚），耳边老是响着提问和回答的声音。他们稍作休息后，前往一家仿照质朴的茅棚式样建造的豪华饭店吃午饭，这时，来见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天，疲劳离波娃而去。在蓝天下，在温柔的夜色中，这个城市欢腾一片。从马德里、巴黎到达这里，他们就像目睹了一个奇迹。萨特已在他的访问中详尽地叙述过古巴革命使古巴人民得到了什么好处。亲眼观察 600 万人同压迫、饥饿、流浪、失业和文盲作斗争，亲身体验这场斗争的机制，认识这场斗争的意义，这种经历的确使人心潮澎湃、兴味盎然。他们在与卡斯特罗一起作的三天旅行中，除了开始有点拘束外，他们一直被融化在亲密的气氛中。他们随他挤进热情的人群中，体验到久未感受过的欢乐。她也喜欢古巴简洁、蔓延的自然风景，在光滑、银色棕榈树

干顶端是深绿色的棕榈叶，它们与灰绿色的甘蔗构成了完美的和谐。最使她震惊的是看到棕榈树下吃草的公牛，它们的相貌总使人联想起沙漠的面目。她喜欢圣地亚哥，喜欢那里的黑人群众。她喜欢特立尼达，它荡漾着往昔殖民地的肃穆情调，但同时又以它烂漫开放的鲜花充满生气。波娃喜欢哈瓦那。韦达多，这是他们旅馆的所在地。富裕的资本主义城市所拥有的一切诱惑物这里都有。宽阔的大道、美国式的长体汽车，漂亮的摩天大楼以及夜间辉煌的霓虹灯招牌。她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座伸向大海的花园。远处，她能看见哈瓦那老城，望见大浪狠命地冲击着岬岩。早上她常与萨特一起喝浓黑、几乎发苦的咖啡，再吃一点松软、多汁的松果。随即，萨特为尼桑的《亚丁-阿拉伯》写前言（卡斯特罗想要重印这本书），她则走出装着空调设备的凉爽旅馆乱逛。她来到一片草地上，嗅着青草的芳香和海洋的气息，读一点书。晚上，当她离开空调房间时，她能感到潮湿的晚风扑面而至，晚风中还荡漾着温室的热气和耷拉着的花朵的香泽。萨特对哈瓦那老城有所了解，他带着她去游览那里拥挤的老式街道、拱廊和云集着人的广场。他们常在那儿吃晚饭，有时单独两人，有时与朋友们在一起。每次走进餐馆的时候，她总觉得好像有人往她肩上丢了一块湿披巾。他们常坐进“西隆”，海明威曾是那儿的常客。一天夜里，他们与诗人巴拉加涅瓦、摄影家科尔达夫妇、一位模特儿和一位女子武装部队的士兵一同来到集市的一个摊位上，在周围一股浓烈的蔬菜和鲜鱼的气味中，吃了一份中国式的炖煮菜。报纸每天刊登萨特与格瓦拉、与杰梅内兹、与卡斯特罗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那以后，每一个人都认得了萨特。他们走在路上时常有出租车司机叫：“萨特！”男男女女们在路上挡住他。在萨特那次讲话之前，他们还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呢。卡斯特罗告诉人们，“这个人是我们的朋友”。人们就把友情狂热地倾泻到他身上。卡斯特罗究竟如何有威望？他们从中有了一点了解。

这时，正值古巴喜庆日子。在每一个星期天晚上，一群群业余演员拥上街头，兴奋地演出他们已经准备了一年的节目：古装戏、音乐、哑剧、杂技、舞蹈。这些街头狂舞者的口味、创新和艺术鉴赏力使他们头晕目眩。黑人舞蹈演员尽情地表演了西部芭蕾舞，他们都表现出农家礼仪。乍一看，在其中第二部舞蹈中表演的清一色是女子。男演员们戴着假发，涂脂抹粉，穿着彩裙、小棉袄，还挂有胸饰，系着远古女祖先的围巾。萨特、波娃与一群朋友一直呆到天明，与这些至今还沉醉于胜利之中的平民大众共享欢乐。在剧院中，虽然夹杂着天主教的某些影响，黑人的一些礼仪与非洲的礼仪十分接近。幕终的帷幕落下之后，波娃看到，在舞台边侧的女舞蹈演员们还没有从痴迷忘我的境界中完全恢复过来，把礼仪转化为辉煌的戏剧。

看惯了哈瓦那多姿多彩的喧嚣、湛蓝的天空和慷慨激昂的人民之后，波娃将他们在美国时的感觉进行了对比。纽约看起来萧瑟、贫困。街上的人们看上去衣衫褴褛，无精打采。几幢高楼大厦、新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但周围的许多街区却是仿照低租金住房重建的。1947 年，他们曾注意到在美国的富庶和欧洲的贫困之间的鲜明对比。如今，这种对比已不复存在。波娃也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美国了。它还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不再是创造未来的地方，她眼前的人民也不再站在人道主义的前列，他们只是身受“组织硬化症”的折磨、被谎言所毒化、借“美元帘幕”与世隔绝的社会的成员。像 1945 年的巴黎一样，纽约给她的印象是衰落之后的巴比伦。

（六） 人们为何钟情

发行量很大的美国《麦考尔》杂志邀请波娃就爱情问题写一篇文章。如同所有名人一样，她的私生活使人们感到惊讶，她没

有躲避爱探听秘密的好奇的读者。她与萨特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是自由爱情的一种表现，但是，波娃找到了幸福的秘诀吗？“一位著名的法国女人与我们谈论爱情”，《麦考尔》杂志向它的读者预告说。

这是以雅致诙谐的形式出现的彻底的波娃式的《论爱情》的精髓：“人们为何钟情？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您钟情于某人，因为您青春焕发，因为您将衰老，因为您上了年纪，因为春天已逝，因为秋天来临，因为您精力充沛，因为您疲惫不堪，因为您快乐无比，因为您烦恼厌倦，因为某人爱您，因为某人不爱您……我的答案太多了。也许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爱情神秘莫测。为什么这个男的、那个女的，而不是另一个男的、另一个女的？大凡情人都说过“你不同于任何人。”这句话解释了不包括所有其他人在内的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力，也就是说被爱的人是在与所有其他人相比较并且异于其他人后才被选中的。爱情不包含两个情人，它囊括整个社会。“一个与社会过分协调的人永远找不到爱情。”根据波娃的看法，爱情的诞生等于藐视双亲、丈夫或者妻子，等于对抗社会环境和朋友。“西方社会第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特里斯丹和绮瑟，便是一个反抗的故事。”确实，特里斯丹背弃了叔叔交给他的使命：他必须给他的叔叔带回未婚妻绮瑟，然而特里斯丹偷走了绮瑟。许嫁给马克王的绮瑟却委身于特里斯丹。这两位情人的一生充满反抗，他们反抗他人强加的法令，反抗宗教戒律和道德准则，反抗骑士制度。在西方文学迎来曙光之际，他们不屈的爱情成了反抗社会的情人们的典范，他们用爱情向全社会挑战。

波娃选择了萨特和自由，反抗她的家庭，反抗道德准则及宗教戒律。她根据自身经历写道，大凡情人都忘记那些凭借法令与他们对抗的人的存在，忘记社会的习俗。

她以藐视战胜了两个人的孤独，她写道，情人们正是出于藐视才决定“单独地生活在世上”。连接两个人的一见钟情的爱情方式是一种取消他人权利，骤然解放情人的革命经验。

波娃在对爱情的分析中走得更远，这不仅仅指反抗和解放，还是一种复仇："如果爱情素来不以一种复仇为开端，那么它将不会这样凄切、激烈。"向社会复仇，您会突然逃脱这个社会，向拒您于门外的阶级复仇，您会突然属于这个阶级。《灰姑娘》的故事全部建立于爱情复仇之上，复仇使灰姑娘脱离女佣的境况，成为剥削她的众人之公主，然而爱情同样是一种幸福的征服，被爱的人将您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下子交给您各种钥匙，因为对于相爱的人，一切都是公用的。波娃回忆起她曾通过与奈尔松·阿尔格雷的爱情发现了美国。"探索一个陌生国度是一项义务，然而通过对一个令您着迷的外国人的爱情拥有这个国度那才是一个奇迹。在这种情况下，正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爱情成为一条神奇的捷径。"

波娃发现女人尤其易受爱情的感染，因为人们很少看到她们能够有办法扩大或者改变她们的宇宙。在她们没有职业或才能的情况下，爱情就成为她们唯一的运气。"即使是最幸运的女人也宁愿不甚费力地得到一切出乎意料的绝妙神奇的乐趣。"

对于男人，情况并非如此。行动之男人能够改变与世界的关系，他甚至可以改变世界。倘使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他的计划，那么爱情就没有办法左右他，他只知道漫无目的的冒险。

根据波娃的观点，爱情是反抗、解放、复仇、满足一种"模棱两可、不确定甚至无边无际的"需要的征服。这是一种力量、一种快乐、一种自我的显示。

作为这一"爱情颂歌"的结束语，波娃再次用诙谐掩饰若隐若现于字里行间的不遵习俗的思想。"人们为何钟情？没有什么比这更复杂了：因为是冬天，因为闲暇无度，由于意志薄弱，由于孤独难忍，由于需要安全感，由于偏好冒险，由于失望、希望或绝望……"

（七） 被控告的萨特

撰稿人让松的诉讼案即将开庭，律师们希望《现代》杂志的主编萨特回来作证。萨特通过电话让人记下他的声明，然后在军事法庭上代读。他在声明中为让松以及秘密行动辩护，证明独立是一件既成事实，并提及曾经发表演说“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属于你们”的戴高乐将军。铿锵有力的证词表明：由于在《121 人宣言》上签名，萨特已准备回国后接受控告。9 月 8 日，《巴黎新闻》的标题为“让-保尔·萨特、西尼奥莱和另外 100 人有坐 5 年牢的危险。”法国驻里奥大使馆流传说萨特一旦在巴黎走下飞机，就将被投进监狱。朗兹曼打电话通知波娃，让松诉讼案已经判决，《121 人宣言》的签名者将没有权利继续在电台或电视台上发表他们的讲话。警察在《现代》杂志、《大众思想》、《真理与自由》社进行搜查和逮捕。《现代》杂志 10 月号被扣发。5000 名退伍军人走上香榭丽舍大街示威游行，大叫“枪毙萨特！”《巴黎竞赛画报》的标题为：“萨特，内战的机器”。朗兹曼详细地通知波娃，让他们在马德里着落，接着去巴塞罗那，波斯特将在那里与他们接头。

波娃与萨特开始于 8 月 24 日的巴西旅行于 10 月 23 日结束了。在此期间，巴黎的工会领袖和大学教员发出了“议和”的号召；电视演员与被从一项节目中除名的埃娃琳娜·雷团结一致，展开了罢工。洛朗·施瓦茨被剥夺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教授权利，国民议会书记兼会议记录员布膺和奔戈的职务也被解除了。朱安元帅鼓动人们签署一项反“背叛的教授”的宣言。所有军官食堂都贴着 121 人的名单，全国军人联合会、全国预备军官联合会要求制裁“头脑不清的人，尤其是叛徒”。

返回途中波娃和萨特经过哈瓦那，与第一次一样，他们受到

热烈欢迎。他们举行电台、电视记者招待会。飞机起飞前两个小时，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出现，并将他们带上自己的吉普车。他希望他们看看自他们第一次旅行后这里所取得的成就。汽车风驰电掣，载着他们穿越市区和大学区，然后正点送他们到机场。

在巴塞罗那，波斯特与布庸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坐上轿车驶向法国。海关警告他们，说应该将他们的过境通知巴黎，他们应该一抵达巴黎就去警察局报到。

11 月 4 日他们回到巴黎。同一天戴高乐在电视讲话中提及“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波娃和萨特执著地要使自己被控告。11 月 8 日，警察来到波娃的工作室，通知她和萨特诉讼一事。预审法官传唤他们，但约见前却自称有病。下一次约见无限期地推迟着。接着他们接到一系列诉讼已告终结的通知。当一个人在全国范围内享有荣誉时，他不可能让人家控告自己！他们决定在他们的总部——波娃的工作室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大约 30 位法国和外国记者赶来参加。萨特陈述了他们共同的观点，声明将为“否定”自决问题全民投票进行活动。“如果政府提出的问题是：您是否赞成无条件地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议和以达到阿尔及利亚自决？我将投‘赞成’票。但是左派将对一切能够导致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予解决的问题以‘否定’的答复”。报界冲淡了他的宣言，一切就此告终。他们成为“不可被控告的被控告者，或者是没有被控告的可被控告者”。

波娃的《而立之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书出版之前读者就预订了 4 万册。这部献给萨特的书是回忆录的第二部，它记载了从 1929 年到 1944 年的事情。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国外，对该书的分析都是颂扬文章。波娃的读者范围日益扩大。她的个性、政治观点、旅行和成功将她置于全巴黎知识界头面人物的漩涡之中。

波娃勇敢地参加了“否定”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全民投票。安托尼大学区的学生们对她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比利时极左翼

社会党的学生邀请她前往布鲁塞尔作“知识分子与政权”的讲座。大厅里坐满听众，然而不是政治上积极的大学生，而是大资产阶级、部长，还有风雅的太太，他们出于好奇前来倾听一位闻名遐迩的作家演讲。应社会党和国会议员的要求，她首先在市政府，然后向一群工会干部发表讲话。

她太出名以致不可能不受损害。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存在主义”节日的美好岁月里，每当她走进一家饭店、坐在一家咖啡馆，不受善意或恶意的包围是不可能的。她的社会形象走到她自身的前面，身不由己地成为一个知名人士，信箱里装满了陌生人的信。她的避难所仍然是这个由亲密朋友组成的小团体，它还纳入了《现代》杂志的两位新成员高兹和奔戈。这个小团体无时不搅动思想意识和语言，同时也是各种对抗运动极力怂恿的一部重要机器的中枢。一切都必须达到目的才告终的位于赛尔街的工作室，已成为国际左翼最炽热的策源地之一。

朗兹曼交给波娃一份关于金滴地区穆斯林遭受北非前法国殖民军在当地的雇佣军官的拷打的材料。获悉在巴黎的地窖中竟然发生了拷打事件，波娃让《现代》杂志登载了这一材料。

因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意大利获得奥莫尼亚奖，并将全部奖金 100 万法郎捐给了阿尔及利亚战俘。《现代》杂志委派朗兹曼和马塞尔·贝居出席在突尼斯举行的反殖民主义者的会议，这意味着他们与阿尔及利亚军人的团结一致已经发展到整个第三世界范围。

（八） 罗素法庭

担任罗素组织秘书之一的年轻的美国人斯凯曼于 1966 年 7 月前来寻找波娃，邀请她参加英国哲学家罗素希望组织的审判美国对越行动的法庭。该组织负责向现场派遣调查委员会，负责获

取美国反对派的资料，其宗旨是激起世界公论，打击美国舆论。一些国际知名人士代理法官的职务。波娃对这个主意颇感兴趣，同意与萨特一起加入组织。萨特被推为执行庭长并负责制定罗素法庭章程，他指定朗兹曼为代理庭长。会议本想在巴黎举行，但是戴高乐将军在一封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的信中通知他，政府决定拒绝罗素法庭在法国领土上开庭。萨特回信说若有必要，法庭将设在法国领海之外的一只抛锚的船上。瑞典同意接受法庭。法官们来自南斯拉夫、德国、土耳其、意大利、美国、古巴。曾阻止阿尔及利亚酷刑、支持修改流产法的古赛尔·哈里米也在协助法官工作的法律委员会成员之列。8天中，“被此举动吸引”的波娃对这些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人们之间的激烈的纠纷感到震惊。波娃、萨特、施瓦茨、哈里米代表法国非共产党左翼，从1967年5月2日至10日，他们倾听医生、记者、历史学家、物理学家描述新武器试验在越南造成的损害，聆听他们的报告和证词。受伤的老百姓控诉战争地狱。吉赛尔·哈里米刚刚从越南返回，描绘了越南严峻的形势。

每天，同一时刻，青年们在法庭所在地人民之家前集队游行，标语牌上写道：“美国万岁？那么布达佩斯呢？”一些反示威游行的人挥动着其他标语牌。

波娃经历了一个火热的介入时期，她深感“彻底地被动员入伍”的兴奋。她喜欢这种有规律的持续不断的工作，兴趣盎然地预测罗素法庭将在明年秋天重新开庭。

萨特、波娃这对伴侣越来越碍事。伊拉克政府禁止书店出售他们的著作，其原因是“这两位知名人士支持以色列”。《现代》杂志的总编辑委员会签署了一篇文章，抨击雅典军事政变，这样，他们的作品在希腊也被列为禁书。

波娃的剧目《无用之辈》具有特殊的现实性，在圣·日耳曼·德·普雷艺术节重演。百姓的牺牲并没有中断。1945年继纳粹主义之后提出的人权问题到1967年仍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解决。波娃的介入增加了。7月，她在一篇致委内瑞拉总统莱昂尼的文章上签名，抗议逮捕和消灭反对派，要求公布各种情况下的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接着在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危地马拉驻巴黎大使阿斯杜里亚的公开信上签名，抗议许多危地马拉人进行绑架和暗杀活动。11月，罗素法庭在丹麦再次开庭。一位日本人呈递了一份关于植物落叶的报告：化学产品使动物和人中毒。涉及酷刑、谋杀的证据纷至沓来。难道存在种族灭绝者吗？法官们对此产生分歧。波娃和萨特怀疑是否能将对越南的种族灭绝归罪于美国，坚持控告战争罪行。来自古巴的代表、一位标致的古巴女士和所有日本代表认为萨特和波娃的顾虑是多余的，并说服了萨特，对于他们，这乃是一次政治事件。作为执行主席，萨特必须草拟法庭判决的事由，这篇写于凌晨的文章被大家一致通过。萨特宣布种族灭绝就是“只在单方面进行到底的、彻底的、没有丝毫相互性的战争”。罗素法庭谴责美国为种族灭绝者。

（九） 女权运动

1970年10月底，一个由青年女权论者组成的团体，决定发表一份关于流产立法的宣言。安娜·泽林斯基和克里斯蒂娜首先提出了这一主意，她们曾担任过1968年女权运动的领导工作，并都来自妇女民主运动组织。为了震撼舆论界，必须有著名人士的签名。安娜·泽林斯基与两位女权论者来到赛尔街波娃的工作室，向波娃介绍那篇文章并请她签名。“法国每年有100万妇女做流产手术。为了保守秘密，她们的手术往往总在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然而如果经过医学检查后再完成，这种手术就是极其简单的。人们闭口不谈这100万妇女。我声明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做过流产手术”。

波娃审慎地、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没有打断对方的话语。“好

吧！我认为这个主意非常妙。我将在宣言上签名。我可以努力联系我认识的妇女。我们来列一个表格。”她拿起纸和钢笔写出一连串名人的名字。《新观察家》在头版上登载了宣言文章以及343个签名。《世界报》为他们开辟两版登载了一篇标志这件事的重要性的题为《一日》的文章。国外新闻界大肆传播该条新闻。

早在20年前，波娃就在《第二性》中对禁止堕胎及其悲惨后果表示抗议。她从没有忽略声明避孕永远是更可取的办法，但她认为目前大多数法国妇女除了堕胎外并没有找到其他办法。11月20日，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在巴黎游行。波娃随着高举要求获得生育、避孕和堕胎自由的标语牌和燕尾旗的游行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径直走到民族广场。4000名妇女解放运动成员挥舞挂有衬衣、纸娃娃的铁绳，分发象征秘密堕胎的香芹。

妇女解放运动组织邀请波娃参加一次反对普莱西-鲁宾逊中学的行动。这是一个接受被学校开除的第一次怀孕的12至18岁的女孩子的组织。人们将这200个轮流地络绎不绝地到来的女孩看作轻罪犯人。三名教师对她们进行初等教育，这将破坏这些中学生的未来。

计划生育组织提议就1968年取得合法地位的避孕而组织一些免费讲座，但遭到学校校长的拒绝。寄宿生们希望校长能听听她们的心声，又遭到拒绝。她们开始绝食，集体向家里发电报。妇女解放运动接到中学一位女学监的通知后决定占领学校，波娃参加了出征。她陪同一组寄宿生前往校长办公室。在得到邀请陈述她们的请求后，这些青少年要求摆脱束缚，要求国家救济她们以抚养她们的孩子。结婚自然可以解放这些15岁的女孩，然而当一个独身者还未成年时，只有她的父母才有权利决定是否留下她的孩子。根据法律，这个孩子应该属于产妇的母亲。

波娃认为社会是唯一的真正的罪人。学校没有性教育，没有避孕，只有建立在禁止之上的教育，没有任何东西给这些女孩指路。如果她们了解一定的知识后，一般情况下，她们将会谨慎从

事；波娃认为家长和大学所持的态度是荒唐的，因为他们混淆了愚昧和天真这两个概念。她在为《人民事业报》撰写的文章中揭露父母滥用权利以及“我们的社会使青年处于悲惨境况之中的事实”。

波娃的女权论愈来愈激进，她“允许在政治挑战的行动中使用她的名字”。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建立一个秘密堕胎网。为了尽可能引起公众轰动，她将自己的工作室让出来给运动成员使用。这次战役轰动一时，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妇女解放运动，使该组织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社会力量。

波娃和一些运动成员在互助大厅组织了“损害妇女罪行揭露日”活动。她确信她们必须制订一个双重策略：同时进行合法和非法行动，并且避开一切政党。她打算不受任何运动收买地进行一次专一的女权斗争。这种态度使她成为最受赞赏也是最受憎恨的女权论者。

在《第二性》中，波娃说她对未来抱有信心，期待社会主义将公正和平等地对待妇女，可在1972年，她却相信为了立即取得平等，她应该以实际行动参加斗争。她将阶级斗争和女权斗争区分开来，表示随时准备“为妇女特有的要求参加斗争，在此同时参加阶级斗争”。

波娃向一位南斯拉夫记者谈了她对目前法国妇女境况的看法：“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民主意即平等，然而我们接触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该阶级强迫别人尊重它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经济状况使失业人数增加，以致目前不可能给妇女安排工作，而必须首先满足男人的需要。经济问题是首要问题，意识形态只占第二位。”波娃从对工作平等的否定中同样发现了一种政治原因。“我们的政体首先是一个个人权利的政体，为了不致引起对抗，它希望公民尽可能不具有政治观点。工作与一种政治相牵连，如果妇女不能工作，那将有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领域，当妇女较少地过问政治时，男人们也将不搞太多的政治。妇女坚决要求丈

夫留在家里，看看电视，照料孩子，与她们一起度过更多的时光”。波娃具体地说道：“政治活动只能存在于工作范围之内，不参加工作的人等于被孤立了。”这位南斯拉夫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在她访问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妇女条件比较优越。她回答道：“我访问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使我震惊的是尽管人们认为不参加工作的妇女远不及参加工作的妇女，但妇女却得不到和男人们一样的待遇。即使最有才干的妇女希望取得领导职位、担任重要职务，也是困难重重。”她补充道：参加工作的妇女同样必须料理家务、抚养孩子，然而给她们的生活提供方便的幼儿园、洗衣店却数量有限。

“妇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谋取平等权利，然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因为一些影响妇女活动的古老传统依然存在。这些不平等世代相传，妇女有自卑感，而男人却有优越感。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巨大进步。”

在艾丽斯·施瓦泽的一篇引起轰动的报道中，波娃声明，当今的男人没有建立家长制，然而他们使家长制内在化，他们从这种文化现象着手进行思考，仿佛它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文化现象，即使是古老的，也是可以改变和废除的。一个新型社会亟待建立。”波娃认为应该发明一种东西以代替必将消失的家庭，应该拒绝结婚、解放孩子。不进行深刻的革命，解放妇女将行不通，因为男人利用家长制社会，并稳稳扎根于这种社会之中。妇女被迫用暴力还击暴力，男人在大街上侵犯她们、侮辱她们，在家里鞭打她们、伤害她们，这一切之一切都正在应该被控诉的陈旧法律的掩护下进行着。

以暴抗暴的观念惊人而新颖。波娃明确地指出：“被男人侵犯的女人应该同时以暴力自卫。某些女人学习唐手，或者其他形式的搏斗，我完全同意她们的做法。”

1972 年 6 月，波娃接受了“抉择协会”的主席职务，这是她与吉赛尔·哈里米、克里斯蒂安娜·罗什福尔、德尔菲娜·西里

格和法兰西学院的让·罗斯唐一同创建的组织。协会中有两位成员分别获取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他们是雅克·莫诺和弗朗索瓦·雅各布教授。协会的宗旨具有三重性：促使自由、全面、免费的节育；争取取消一切抑制堕胎的禁令；无偿地保护、帮助一切被指控犯有堕胎罪或同谋罪的人。6月15日，在格勒诺布尔文化宫召开的会议上，波娃和吉赛尔·哈里米向2000名与会者宣布，“抉择协会”正在制订一条自由堕胎法案，负责各种堕胎诉讼案件，并发表辩论经过，尽管这是法律禁止的。这条法案在国会得到了米歇尔·罗卡的保护。

11月发生了波比尼诉讼案。一位17岁的少女由于堕胎到庭应诉；诉讼程序强行规定不公开其名并禁止旁听。“抉择协会”完整地发表了辩论的内容。波娃在一篇文章的强有力的前言中写道，遭到起诉的不是刑事被告，而是被告以法律名义到庭应诉的这种法律，“彻底脱离集体意识的一种法律”。她指责法律将最不幸的妇女变成禁止的牺牲品，同时提醒人们注意某些矛盾的言辞：认为胎儿是人类的一员，这是一种明显地违背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态度。“一个女人在一家医院做了一次假分娩，政府将胎儿扔进垃圾桶，而教堂却表示同意。”确认堕胎合法，将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屈辱、恐慌，有时甚至是肢体的毁伤和死亡。计划生育促使它们与职业培训相调和，那样妇女将能够要求自主。

波娃的女权论有其道德伦理基础：力图以实际行动建立一个将消灭不平等的世界。她认为自由最为重要，而其他一切则是次要的。“行动是真正的道德。”她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中写道：“天空属于会飞的人，海洋属于航海者和搏击风浪的人。”倘使妇女们行动起来，参加工作，走进实际生活，那么她们将直接接触世界，脱离压迫，像男人们一样拥有拒绝给予她们的这种自由。“我从未发现那些拥有工作的妇女像婚后被抛弃的妇女那样陷入困境，处于失落的境地。”

波娃没有局限于为妇女权利而进行的战斗，纵观其一生，她无时不在保护人的权利。甚至在女权斗争中，她也没有忘记两性问题。只有当男人从他们自己造成并受益的，同时又受骗的偏见的负担下解放出来，女人才能摆脱文化压迫，不做其牺牲品。“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这一主张由“男人不是天生的，男人是变成的”加以补充而完整。男子气概以及其引起的一切社会后果都是一种文化现象。经过世世代代人工造就的男子和女子，现在应该重新创造了。唯有一种涉及两性的变化能够给予大家正义、和平，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波娃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志着她为人权（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的权利）的斗争的又一个起点。她在文章中写道：她对中东战争中的一些现象感到愤慨。有些国家拒绝提供战俘名单，不允许红十字会了解他们对待战俘的方式。被解除武装的年轻人遭受“不保证其出路的监禁带来的恐惧”，他们的家庭遭遇“疑虑的折磨”。这篇文章中没有任何政治选择，唯有藏于内心深处的怜悯之情，它是促成她采取反对来自任何一方的压迫的态度的源泉。

她的回忆录是一篇记述当今风俗的论著，是一篇证词，它时而讲求道理，时而加以指责。《万里长征》是一本评论中国的书，它报道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为大众谋利的社会。在《衰老》中，她为那些被推向生活边缘的人讲话。《加米拉·布巴夏》是一篇反对酷刑的诉讼词，《波比尼事件》的序言是对压迫牺牲者的法律的指控。

波娃坚持不懈地为妇女尊严进行斗争，在此同时，为了揭露广告、张贴、电视或电台的节目不择手段地利用妇女形象，她在《现代》杂志上新开辟了一个专栏，该论坛的宗旨是设法使人们相信性别歧视的侮辱同种族歧视的侮辱犯有同样的罪行。一个人在第三者面前认为另外一人是“肮脏的黑人”，或者让人发表侮辱犹太人、阿拉伯人的言论，他将被法庭起诉，并被判处犯有“种族

侮辱”罪。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喊一个女人“妓女”，他不会冒任何危险。这是种侮辱性的性别歧视。

波娃与几位女权论者创立了一个旨为抗议日常性别歧视的妇女权利同盟。她坚持不懈地斗争，筹备《现代》杂志专号：《固执的妇女》，并起草文章介绍专号。她在专号中论及的语言问题成为1974年女权论者产生分歧的主题。根据部分人的意见，语言和逻辑是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通价值的工具，尽管几千年以来是由男人们锻造的。对于另外一部分人，语言则代表她们所受的压迫的一种形式，她们希望发明一种体现女性特征的文字。波娃发现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一种万能的工具，指出语言中潜伏着一种妇女犹太区的危险。

1974年是《第二性》发表25周年，法国尤其外国出现了许多会谈、电视节目和文章。这是一种全面觉悟。《费加罗报》指出这部在刚刚问世时遭受诽谤的论著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波娃接受让-路易·塞尔旺-斯克雷伯的邀请，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让-路易·塞尔旺-斯克雷伯将她介绍给电视观众：“正是通过她的小说，公众才认识了当代的一位伟大作家。然而又是通过25年前发表的论著《第二性》，波娃在当代思想演变中起着历史性作用。这难以理解的厚厚两卷书第一次描述并解释了妇女在人类中的地位。《第二性》成为当代世界女权论者的参考。”

第十二章　清算已毕

冷峻的岁月把波娃推向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她感到生命力的衰竭、人的有限性。既然未来的终结处已不遥远，她理应将她那饱经沧桑的一生作一次清算。1972 年，她发表了她自传中最后的一部《清算已毕》。通过 1962 年至 1972 年之间的事件、友谊和介入，她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次总结，叙述了她的友谊、阅读和谈论电影、艺术、旅行以及创作对她的诱惑。当然，她不再能感觉到是在奔向一个新的目标，而只是有不可避免地滑向死亡的感觉。

波娃认为，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30 多年来，他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不和之中分手。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他们从对方言谈之中得到的兴致丝毫未减。波娃发表了萨特写给她的情书《致海狸》，人们从中了解到了本世纪文学中最负盛名的伴侣关系是那么的独特、感人而不可模仿。他们的关系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它抛弃一切所谓的传统道德、习俗、禁令、枷锁，而用真诚的透明性原则谱写了一曲情歌。他们用语言突破了两个肉体间的限制、阻隔，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性。他们培植的爱情之树不是悬垂着的两颗雌雄之果，而是一颗包藏丰富的硕果。

50 年来，波娃与萨特牢不可破地联结在一起。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他们曾在旅馆生活过很久，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房间，各人有极大的独立性，双方的生活在自由的愿望中生长，而不相互牵扯一些琐碎的烦恼。这种解放性的情侣关系首先使他们摆脱了世俗的沉重负担。

萨特与波娃都彼此把他们的关系视为各自命运中最大的幸运。萨特一直就说，波娃的奇才就在于她有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敏感，也就是说，他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渴望的一切。他们相互是情人，用他们的价值、思想和志趣共同建立了胜于情感的同盟世界，而且不断用自己的创造更新这个世界。同时，两人相互渗透、促进、帮助，由此导致不可低估的一对力量……“当海狸把这种同盟臻于完美时，其结果便成了夏天一样热烈的幸福”。

波娃说她与萨特是：“我们只是一个人”，而萨特在1977年解释说：“我们之间存在一种深入的关系，它不断地创新，有时几乎能建立成一个个体，一个我们不是两个你，它是真正的一个我们。我的一生都同波娃共同拥有这个我们。”如此融洽的关系不是被赠予的，而是自己建造的。波娃，浪漫，感情充沛，野性子，依恋栗子园的风、太阳和宇宙，被死亡的烦恼所折磨，面对景物激动不已。一首歌剧的乐曲、一幅画、瞬间的美都会使她热泪盈眶。她常常使自己的好恶达到极端。萨特对她说：“你简直得了精神分裂症，”但却欣赏同他个性完全相反的人的喧闹。萨特厌恶叶绿素、田野和大自然，而对一个物体，他凝视它，而不是在魔术中变掉它，不是含糊地带过一个词，掩盖一种印象，一种先入之见。以固执而天真的注意力抓住生动的内涵丰富的东西，这吸引波娃的兴趣。她说：“只有一些在玫瑰花瓣中发现神秘而错综复杂的情节的疯子才唤起我类似的谦恭。”他们都具有当作家的志愿，都希望通过写作来建造未来的人类，担负揭示世界的使命。他们同样鄙视等级制度、资产阶级、陈规旧习、仕途、权力、责任，以及生活中一切严肃的东西。

世界上有这样的机遇，这样的运气：两位天赋的作家相逢了，他们创立了一种只适合于他们的默契。《致海狸》中表明了他们俩的爱情是超越与任何一个人的关系的，具有最优先权。波娃也说道：“所有出现在萨特和我的生活中的第三者从一开始就清楚我与萨特的关系是不可代替的最牢固、紧密的关系。”

波娃像萨特一样，总是放纵自己，只要有可能，总是听凭自己的兴趣、冲动行事。她说，如果应该重写回忆录，她将对她的性欲作一次坦率的总结。那是真正的坦诚，并且具有女权论的观点。“我真想告诉妇女们，我怎样过性生活，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萨特讲到当接触波娃时，波娃就表明：她认为在她的生活中最好与几个男人发生关系，并且不愿意因她与萨特的关系而阻止这样做，她不认为性生活应该只由与一个男人的关系来决定。但在萨特以外的人，萨特仍然占据主要位置，这是确信无疑的。萨特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非常牢固，即使她与一个类似阿尔格雷的男人的冒险也与我无关。不会夺去我的任何东西。”

有些人说，波娃的背后有萨特，甚至说波娃的书是萨特写的。波娃说：“我选择了萨特，这绝非出乎偶然，因为这个选择毕竟是由我作出来的。我满意地跟随他，因为他领我走上了我要走的路。”“哲学方面的思想都是萨特的，他善于创造新思想，而我却拙于此道。”但波娃坚持认为女人应该独立于世，社会上总热衷于维护一种旧观念，即女人只是第二等公民，只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或者只是有权势的男性的附属品。

在人们的心目中，波娃有两种形象：一种是，她是一个女怪人，偏执、放荡、无节制，还谣传她年轻的时候在几只桶上跳裸体舞，体验每一种恶习；另一种形象是女能人、女教师、女首领、女作家、女权主义者，认为她“除了学问，生活中一无所有”。波娃不想介入公众的舆论，她从来没有上过电视屏幕，从来没在广播中谈论自己。她保持超然的态度植根于她笃信“绝对”的孩提时代；直到她老年，她始终确信尘世的成功是虚无的。她愈了解世界，这一超脱态度就愈坚定。

在《清算已毕》中，波娃谈到：在晚年，她与萨特的生活还是密不可分。萨特住在拉斯佩尔大道上，离波娃的住处仅五分钟的路；从他10楼的书房里，可一览巴黎的景象，蒙巴纳斯公墓是

它的前景。每天下午，波娃在萨特的住处工作，夜幕降临时，眺望落日，它有时是那样辉煌。他们常在波娃的公寓中度过夜晚的光阴。她在书中还谈到有关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一幕。

1964年夏初，帕切要萨特把将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讲稿寄给他。萨特倾向于拒领，波娃则怂恿他去领。他们的一些中年朋友要他去领，但当问起一些学生时，他们反应强烈——要是他听任他们给他授奖，年轻人会多么失望！

萨特打定了主意。他对“荣誉”极度恐惧，他不想把自己放在斯德哥尔摩去展览。萨特认为，选定他获诺贝尔奖的院士们有着政治色彩，从来没有哪位共产党员得奖。给萨特颁奖，不是表示他们承认他的政治立场，而是显示在他们眼里政治立场无足轻重。萨特不想钻进圈套。他写了一封信，客气地恳求瑞典科学院不要拿一项奖来折磨他，如果颁奖，他会拒领。他发表声明说：他过去一直拒绝接受正式的荣誉，因为他感到一个作家不能听任自己变成一块招牌。他为诺贝尔奖只授给“西方作家以及东方的叛逆”而遗憾。

萨特这个声明一发表，许多记者和电视摄像师们一直跟到他的寓所。当他跨进门的时候，他回头对他们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当天下午，一个邻居的妇女对波娃说：“萨特先生真可怜！前年是秘密军队组织，如今是诺贝尔奖，他们总是不让他清静！”

很自然，报刊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安排了这一切。他们暗示说，他拒绝领奖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或者就是因为波娃嫉妒。他显而易见腰缠万贯，所以根本不把这两千六百万法郎放在眼里。更使萨特吃惊的是有些人写来的信，他们要他把奖金领回来，再把钱的一部分或全部甚至可以再添点给他们。他们要把它用于保护动物或保存某个树种，去买个实业，修个农场，或者去作一次航海。

萨特的赫赫名声和波娃的崭露头角所带来的一切，使他们深感焦虑。自从他们被众人所知之后，无忧无虑的日子就一去不复

返了，早年历程中冒险的乐趣也永远地消逝了。为了保护自己的私生活，他们不得不筑起隔墙将旅馆和咖啡馆的生活抛在身后。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压抑了，他们曾那样喜欢与别人在生活中融为一体。现在，与他们相识的许多人都与他们的关系变得陌生起来。鲁瓦曾这样写道："再也看不到萨特与人们在一起了，人们只看到别人与萨特在一起。"波娃也一样，因为她无法完全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也就不再能真正去理解他们。

他们是经济上的富裕者。1954 年以来，仅波娃的书就为她赚了一大笔钱。1952 年她为自己买了辆汽车，1955 年又买了套公寓。波娃不进社交场所，也不宴请他人。依然如同年轻时一样厌恶那些光怪陆离的奢华。她的衣着不加修饰，饮食虽有时很好，但通常吃得很少。诸如此类的事她都是随心所欲地做，不刻意剥夺自己的权利。她认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里，那就无法希望通过什么方式使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整个世界，而她又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困扰在这堆矛盾中，而对它们视若无睹却是自欺欺人。这样做的结果是她的生活走向孤独。客观因素把她和人们隔开，如此生活也确实剥夺了她对某种人生温馨的体验。这种生活限制了她的人生经历。

随着老年的到来，枯萎的花朵还在枯萎，谁又能阻挡时间的流逝！柏拉图就说，哲学就是学会死亡。在福克纳的小说里总是跟时间抗争，可没有人能战胜时间。死亡是一个决定性的否定，是宣布你一生奋斗艰辛，你崇奉的价值、信念，你确信的人生目标、意义顷刻间的结束。

波娃尽管内心深处流淌着不信一切的潜流，尽管她已无法确信："我在为谁写又是为什么而写作，但写作这一活动本身现在对我来说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了。"她不再认为写作需要什么正当理由。有时，时光仍是那么美丽而激荡着她，她真想像太阳一样放射光芒，想把新鲜而灿烂的词句倾撒在整个世界上。有时，

她所期待的光又是那么的暗淡，此时，除了放声痛哭以外，什么也不想干。语言就是有如此奇妙的力量，在她年老时所给予她的力量仍如她 20 岁时的那样势不可挡。语言，这无可置疑的、普遍的、永恒的、能将万事万物一一作出描述的精灵，是波娃所认识的并深受其影响的唯一能够超越物质世界的力量；它们在她舌尖跳跃，通过它们波娃得以和人类进行交流。它们从瞬间中、从偶然中可拧出眼泪、黑夜和死亡，然后再把它加以变形。因此，她所抱有的最大愿望只是因她写的文字、句子被人们阅读、记诵。

波娃再也没有兴致在这个地球上四处旅行了。要是一个人不是什么都期待的话，那他也就没什么可期待的了。不过，波娃还是非常想知道人类故事的续篇。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在明天就会是成年人，但波娃仍对他们感兴趣，未来在他们的手中。波娃说："如果我发现在他们年轻人的计划中包含着我的计划，那么我会感到——即使我进入坟墓——生命将会延续下去。"她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1963 年秋，波娃还结识了一个比她小 35 岁的大学生，名叫西尔维。波娃说道："我越了解西尔维，我越感到与她情投意合。我喜欢她的激情、愤怒，对中庸的憎恶。我日复一日地让她了解我的生活，并将我的过去详细地告诉她。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受益于我所能提供的东西，也没有人能够比我重视我从她身上所汲取的东西。"她与西尔维的友情持续了 20 多年。她们每天见面，一起阅读、看戏，开车远足。波娃将《清算已毕》献给了她。波娃与女性的友谊在她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她说道："我素来与妇女非常亲切，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爱抚的温柔。但是这从未激起我的色情情感……。何况，我认为大凡女性已经或多或少成为同性恋者。非常简单，因为女人比男人更能激起情欲，她们更漂亮、更温柔、皮肤更令人惬意。总之，她们更妩媚动人。"正因如此，有些人指责波娃既是慕雄狂者，又是一个同性恋者，而波娃也的确声称："理想的性爱应该能够同时爱女人和男人，男女无关紧要，或者爱整个人类，没有恐惧、强迫和义务。"这些观念的确

太惊世骇俗了！同性恋是否是违反自然？是不是用恶心的方式来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萨特所宣称的，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由的，自由选择自己承当责任。会不会使某些人的邪恶、怪癖、残忍的本能将人类应有的规范、程序染上病毒？这也是人们面临这些问题而值得深思的。总之，人类的未来应该朝向健康、自由的方向发展。

对于波娃最大的灾祸是："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而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因而也无法再与你说话，这同样可怕。"有时，波娃真想尽快结束一切，以便减少等待的痛苦。她无不伤感地回想起读过的所有的书、到过的所有地方、积累的所有知识，这一切不会再增多了。各种音乐、各种绘画、各种文化，数不清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变得毫无价值。它们酿不出蜜来，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任何营养。即使人们还读她的书，他们最多也只会想：她没见过的东西还多着呢！波娃伤感、绝望地说道："我曾发誓活好这一生。我丝毫没有失言。当我回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那位年轻而又轻信他人的少女的时候，我才茫然若失地意识到自己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然而，命运之神将波娃最为恐惧的事降临到她身上。萨特将要去了。他抓住波娃的手腕，没有睁开眼睛："我多么爱你，我的小海狸。"他把嘴唇移向她，波娃拥抱了他。萨特又昏睡了过去。波娃一连几小时静静地凝视着他。1980 年 4 月 15 日，晚上 9 点，萨特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想躺进被里，紧靠萨特，护士拦住了我：'不能这样，小心，坏疽。'我这才明白他得的是恶性焦痂。我在被子上面睡了片刻"。

波娃沉痛地追忆着萨特，在写给萨特的《告别式》的前言中写道："这是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在出版前您尚未先读过的。当我们还年轻时，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其中有一位在大胜之

余，向另一位说：‘你已经在你的那小盒子里了！’你现在正在你那个小盒子里了。你不能出来，而我也不能在那里和你相会，即使他们把我葬在你身边，把你的骨灰放在我的遗骸旁，那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一直和睦相处。”

附 录

我与波娃在一起是生命的全部

萨 特

1977年元月萨特72岁时，接受《新观察家》女记者卡勒的访问，谈他与波娃的关系。

问：您是怎么和西蒙·波娃相识的？您是否立刻就感觉出她在您生命中所占的位置？

答：不是马上就这样。我们的关系是以一种相当有意思的方式开始的。我是在巴黎大学上课时遇见她的。我喜欢她，我觉得她很可亲、漂亮，但穿着很差。这是真的，因为她的穿着是依照她父母的方式。我看着她去上课、回来，上台报告。我没和她说话。她的好朋友是马俄。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们怎么不认识一下？"我说："有何不可？帮我约个时间。"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我邀她在Médicis街的一家糕饼店见面……可是，马俄开了我一个玩笑。波娃要她的妹妹来赴约，我就不得不和她在一起。结果是，我对她妹妹一点也没有兴趣。后来她成了我们的同学，我对她较有好感。但是，当时……

问：您那时很愤怒？

答：是，我很不高兴。她来了之后对我说："我姊姊要我来，我不知道她被什么事缠住了……"

问：那么她那晚上一定过得很不痛快了？

答：非常的不愉快。但我还算是友善的，因为也应该要这么做。但那时我很不高兴。总之，两三天之后，波娃和我会了面，我们和马俄、尼让、艾宏决定一起准备会考（agrégation），地点在我的大学城宿舍。我们和同学一起研读两三个小时的希腊文文章，或讨论哲学问题。之后，波娃和我离开了他们，一起在巴黎市内散步。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问：很快的就成为一种关系了？

答：成为一种确确实实的关系，是后来的事。那是 11 月，而我们是在 7 月认识的。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

问：在读波娃的回忆录时，所得到的印象是，你们的感情很快就成为相互性的。

答：是的，我想是马上就这样子了。我们在几次的长假中，相互了解得更深刻。我去过她家附近……

问：……而您被她的父亲赶走过……

答：我不是被赶走的。有一天，有人看到我和她一起坐在草地上。我想，我们俩人并不是坐得很靠近，但她的父母跑了过来，带着很窘困的样子。我表明了我尊重的态度，但他们并不太接受。她父亲并没要我滚蛋，我想他没这么说。总而言之，我还是留下来了。我原订要停留 5 天，我是到了想走的那天才走的。

问：到了立秋，你们签了一项两年的合同……

答：是的，那是有点闹着玩的。你也知道我不会维持终身式的关系，但事实却证明那是终身式的关系。那时立即的想法是：我和波娃已有完全的关系，这会维持多久呢？先试两年看看。她自己也觉得这个合同的想法不错，因为她也不打算结婚。此外，合

同也有机会可以修改……

问：很快的就成了终身的合同？

答：是的，在我去服兵役之前。

问：这不会让您不安吗？您说过，在通往成年的过程中，对您而言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否成为另一项额外的束缚？

答：不，不完全是。让我不安的是在省城中的大学圈子，我觉得那些同事、他们的太太、那些校长，这些人让我厌恶。

问：波娃在她的《盛年》书中说："我们从未觉得对方陌生，也从来没有在一方呼唤另一方时，会觉得无谓。"你从来没觉得这是一项约束吗？

答：啊，不会，从来没有过。我和波娃的关系，从来没让我感觉到是一种约束。在任何方面都是这样。我们随时都可以为对方做任何事，而且都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如您所知，我们马上就面临到和其他人的关系。

问：你们所订的这项约定（即两人之间相互不隐瞒、不欺罔、无秘密），是否遵守下去？

答：是的，一直到最后。有时候，波娃会开玩笑地说我有些事没告诉她，说我有些细节没交代清楚。但这并不是真的。

问：您从来没对她隐瞒过什么？

答：没有。

问：这很重要吗？

答：啊，是的！能不相隐瞒是很重要的事。对别人，我有时会隐瞒一些事，有点说谎者的样子。但对她，却从来没有过。

问：为什么要不计一切的坦诚？

答：因为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最重要的层次上，超越同时代其他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我那时候是个大男人主义者，但我认识波娃时，我觉得和她之间的关系，优越得超过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最完整的关系。我并不单指性生活和私生活而言，在日常的对谈，以及在生活中有重要事要做决定时，也是如此。这种完整的关系是建立在关系深处的相互平等之上。我们之间是相互平等的。我们构想不出还有其他的事。我找到了一个女人，她的地位和我这个男人完全一样，而我认为这把我从大男人主义里拯救了出来。那个女人也有了她真正应有的地位。

问：波娃说你们是“同一类的人”，说你们的“额头上有双胞胎的记号。”您是否一开始就有这个感觉？

答：当然是。总之，这很快的就发生了。我不能说我之所以接受马俄的提议去和她会面，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股相似性了。我也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和她一起研究功课。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她很让人愉快，因为她让我感到欢欣，因为她和我们做同样的功课。但是，很快的，在讨论哲学问题之后，我们在巴黎市内散步、谈话时，我们才了解到我们之间的特殊相似性。

问：您是否有可能和另一位不是读哲学的女人，例如一位雕塑家或医生，有这么完整的关系？

答：这我就完全不敢说了。我所能说的，是我和跟我有关系的女人之间，所谈的话题绝对和哲学没有关系。

问：也许是这样，但波娃更能了解哲学……

答：是的。我一直都在和她谈我的哲学。例如，我在服兵役时，她周末来都尔城（Tours）和我会合，我和她所谈的，是我在

一星期之间有过的想法、思考过的事。这也是把观点厘清的一种方式。我和朋友谈论时，比如和马俄或尼让，我谈的是我的“理论”，我是这么说过，但这是有点夸张。当我们有好夜晚时，我会掌握这个机会。事实上，除了对她之外，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谈过我的理论。

问：这是孤寂结束的时刻？

答：是的，因为之后我就再也不感到孤寂了。

问：一开始，你们之间就相互认定你们的爱情是必要的，但两个人也都可以各自有偶尔的外遇。我想，你们一定多次讨论过这件事。所以，你们之间的共识也不一定是那么稳定吧？

答：我记不得那些讨论的内容，但我知道波娃接受了这件事，而且这对她也好。她觉得，她如果在生命中能和几位男人有关系，会对她有好处，而且她不愿因为和我的关系，而妨碍了那些机会。所以，她的想法是能和其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系。她也认为在性生活方面，不一定只限于和同一个男人。

问：为什么和其他人的爱情是不可或缺的？

答：那是因为和其他的人会有另外的友谊，有不同的关系！但也没有理由去接受这个从婚姻和教会里衍生出来的单一原始规则。实际上，性关系和任何特殊的社会组织之间，并没有任何的牵连。过去一直认为男人和好几位女人有关系是可以谅解的事，而波娃则带来了新的关系形式。所以，我必须同时持有这两种观念。

开始时相当的困难，但我愿意坚持下去，而我也做到了。大部分的情形下，我和波娃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而且也一直都是如此。而我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属于次要的层次。

问：而那些“邂逅者”也能接受这种情况？

答：大致说来，是的。她们是不太高兴，而我也不掩饰真相。我对开始约会的女人说：有位叫做波娃的女人在我的生命中。那只好强迫她们接受了。

问：是否有些女人把您当作外遇的对象？

答：在我们所谈的那个时期并没有。要是后来真的发生过的话，也没人这么告诉我。我不会喜欢这种事。

问：您觉得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系，是一种绝对自然的事？

答：是的，但同时我也得到新的启示，知道我有一种最基本的关系，也就是和波娃的那一种关系。

问：是最基本的，但仍不是足够的？

答：几乎可以说在各方面都足够了。

问：那又为什么需要和其他人的关系？

答：也许是因为肉体的关系本身，就是需要和好几位女人或男人发生。这种关系是没有定论的。你要是和别人有性关系，那很好，但那是和谁呢？和一个或是和十多个？就性关系本身而言，并没有一定的事。

此外，也正如我对您说过的，我认为一个男人和女人，自从他们的关系有点完整之时起，就达到了深刻的程度。不论是男人或女人都是如此。因此，我和波娃之间的关系已很深刻，也很合而为一时，就成为最好也是最高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我和其他任何一位女人有深刻的关系。而这也预设她在转化，并且她也在转化我。也就是说，和我来往的女人，我对她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知识地位，都有了新的适应方式。要是这个女人的智慧并不很高，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很深刻，那么，我自己的智慧也就不很高，但关系仍然很深刻。

和一位知识不比我高的人来往，我不会从文化的角度去接近她。因为她所凝造出来的世界，也就是我的世界。我和女人的关系就是如此。如果关系已经深刻到成为一体时，“我们”就不再是两个“你”，而是真正的成为一个“我们”。这个“我们”，是我和波娃一生中所共有的。但在某些时段中，我也和其他女人有这么深刻的关系。

如果偏离了这种关系，就会掉入诡诈、算计之中，许多小说、剧本都有这类的故事，而我觉得这些都乏善可陈。

我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最寻常也最真实、最习以为常的，就是这种深刻的感应。而这不一定是女人和我之间的情爱，而可以单纯的只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对我的生命而言，占有相当的重要性。

问：您是否确信，不可能有两三个必要的爱情？

答：只能有一个。如果有两个波娃的话，那也没什么意义。况且，我会做出不良的利用行为。我也会被分割开来，因而茫然无措。如果你把一切都交付给一个人，然后又把一切交给另一位，她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接受你，那么你就会陷入自我矛盾的情况。

问：这种安排（有个主要的爱情和几个次要的爱情），在您和波娃之间持续了一辈子。这样的持续有哪些优点？

答：优点太多了。因为一对男女在一辈子当中，总有一些对事物的看法，也有些人和事会在周遭出现。10年之后，有一大堆事情会改变，这表示人也会变。如果你随着外在环境而变，你对事物就会有新的看法，而和从前不同，仅此而已。如果你还有另外一位，就可以试着以两个人的观点来看事情的变化：你们对事情的看法，有过哪些历程，发生过哪些事，等等。重新调整一下，把事物重新复原，清醒一下紊乱的事，这些只能和另一位才能做得到。而且也需要这个人和你有性的关系，因为总是会有“性”的

事情以及其他和性相关的事。所以，要能够找到这种思想上的联合，只要三言两语就能相互了解，波娃和我就是这样。

问：您说到人把自己最深刻的部分投入爱情里，请更精确地说明您的意思。

答：好吧，和波娃在一起是生命的全部，在写作方面更是如此。我常说，人与人之间常常像凶恶者一样相互谩骂，每个人都很严厉地指责他人的作品，指出错误、愚蠢等等。和我有关的是，我觉得波娃的指正是相当有道理的。我想她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我们提出这种讨论时，是以一种愤怒的语气来进行，这多少是带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所以，一方面是作品的讨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对眼前发生的事都会去思考，在咖啡店前有男男女女走过等等之类生活里的事物，都发生在我们俩身上，我们也都不得不接受。我们也有各自认识的人，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同时也接受另一方的判断。

例如，当我介绍我认识的某个人给波娃，她的判断会改变我对那个人的看法。其他人的判断则不会有这种影响。波娃从来不会说暧昧不清的话："那个人会伤害到您，不要再跟他来往。"总之，她的判断对我很有影响力。这种事时常发生，我们俩继续来往的朋友，也都是我们都喜欢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意义，也知道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兴趣等等。当我们说"那个人如果对他说了那件事，他会怎么去做"。这时候，并不是我们之中某一位说的，而是两个人的共同意见。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关系，是长期经验成熟的结果。眼前生活中的一些小小新发现，等于是在两个人对事物与世界整个的共同观点上，增添一些新的经验。

问：这种共同的经验，通常是讨论、争执的结果……如果您们可以算是平等的话，其实也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人……

答：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方向。例如，波娃有

她自己特殊的领域，是在女性问题方面。那个领域我从没进入过。她在写《第二性》时我就读过了，我提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也一直这么做。我们读了之后再做批评，为的是要使书更有力量。而我所做的批评通常是："这里并不很合逻辑，因为在某处写过另一点。"这些都是形式上的批评，而不是内在的批评。至于她发现她文章中的女性研究，不论是在她本身或她人身上，我都没话可说。而另一方面，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会犯逻辑上的错误，这时我就指出来。我如果觉得写得好或没那么好，我也会说出来。波娃对我的作品全都提出过批评，我对她的所有著作，也都提过意见。

问：假定您不认识波娃，或她在10年之后离开了您，或您离开了她。那么，您的作品会有所不同吗？

答：第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她不能在10年之后离开我，我也不能离开她。要是我没遇见她的话？嗯，这么说吧：我在认识她之前所写的作品，已经构成了我日后发展写作的基本素材。例如，在《恶心》中，偶然性和恶心的概念早已存在我的思想里，而我那时还不认识波娃。所以，可以确信的是，有一部分是我无论如何日后都会写出来的，因为素材已经在那里了。而现在，至于哪些是该写而未写的，我不知道。由此可见她的重要性。

问：您能够衡量出这种影响力吗？

答：当然可以，在一起生活，有共同的经验，这已经够重要了。我们所写的就是所经历过的。当我们俩去做一件事时，另一个人也会介入。要是没有波娃，我的经验就会有所不同，有许多细节的东西就谈不出来，较特别的事也就更少了。有人曾指责我，说我在哲学著作中太强调了特殊性。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相反的，我认为这是我的一项优点。我把行为、事件、生活当作哲学的理论来描述。有人说："他掉进了事件、轶事之中，而不是谈一

般性的问题层次。”这一点和波娃有关系，因为我们面对着我们周围的事，我们和一些轶事夹杂在一起，所以就拿这些事来当作我们写作上的例子。

这些和波娃在一起生活中所见到的日常事物，真真实实的，我都收录在自己的哲学作品中当作例子。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她的重要性在我的作品中非常大。同样的，在写小说时，我也告诉她我所想到的过程。我在写《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时，波娃那时在马赛，她还保留我那时给她的信，我告诉她我每天的想法有哪些进展。她检视这些想法，然后在回信上告诉我她的意见。

问：你们之间各自保有的自由与独立，确实可以阻止两个人的关系因为习惯而恶化？

答：啊，是的，这很明确：我们和相当不同层面的人都有来往……

问：在传统的夫妇关系中，习惯是不可避免的？

答：我想是的。是不可避免的。

问：波娃还会让您感到新奇吗？您会让她有这种感觉吗？

答：我不知道是否会让她惊奇……你知道，要是相互很了解的话，这表示已经有过许多次的讨论，有的已被遗忘，有的又重新提起，又吞咽了下去等等。

问：有哪些是出乎意料的？

答：我想，也没有所谓真正的出乎意料。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问：但有时总有一方的想法或反应，会使另一方感到惊奇？

答：在想法上，这会发生。在反应方面，一般不会发生……总之，我会猜想波娃可能的反应，而她也会这么做。所以我们能相互在政治文件或抗议书上，为对方联名签署。我们也从未顾忌过这种事。但我很可以这么说：我签了名，波娃也签了；或是我签而波娃不签；或波娃签而我不签。她的想法也是这样。我想我们相互不欺瞒。我记不得在过去十几年中，曾经惊讶于波娃所做的事。我从不去猜想她要做哪些事。有些事是我所没想到的，但这算不上是一种惊奇。有些事虽然我没想到，但仍然是涵盖在她的行为范围之内。

问：波娃在她的书中，以很长的篇幅说明她为什么不想要有小孩。而您所持的理由呢？

答：这很简单：从八九岁起，我就想成为一个大作家。你可以说，大作家也可以有小孩呀。我不反对，但如果真的想做一件持续性的事，例如写作，从年轻时代起就会觉得，不应该像其他较不"重要"的人一样，把那么多的情感投入在家庭里。

问：所以，是因为有了顾忌……

答：是的，有一点。小孩不是我的基本关怀，因为我的主要关怀是我的作品。

问：如果您有个小孩，您会偏好哪一种？

答：女儿，当然。这是由于父亲对女儿一直都存有一点乱伦禁忌感情的缘故。

问：您周围的人物几乎全是女性。您为什么喜欢她们的陪伴？

答：因为我一直喜欢女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即使她很粗俗，讲些笨话，我也无所谓。

问：为什么？

答：我喜欢她们的感性、她们的样子。我喜欢她们谈话中的深度。她们把事情都当成必然的，而和某个行业或某件工作无关。当然，必须靠工作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多少会受到职业的影响。但是，她们还是让人觉得外在的事物在她们身上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女人对事物和人都有较好的观察，她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出某项暗示、某个人的姿态可以显现出他的特质，而且她可以表达得出来。在和男人的对话中，从来不会显现出这种事。

问：她们更能了解别人？

答：好得多了。只要听父亲和母亲在谈论他们的小孩就可以知道了。母亲比父亲谈得更好。父亲通常是以他自己的原则来谈，也不算是分析，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而母亲正好相反，以孩子的学习为例，就算她不太懂学校的课业，但还是可以感受到老师的态度，知道评语中的涵义……这是在谈她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也可以谈女人和丈夫或和情人之间的关系：除非她只套用别人的说法，否则她观察、谈论的方式，会比一个男人谈论他的情妇时，更显得细腻，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也更真实。

问：您是否曾经为了一个女人而弄乱了工作进度？

答：开始的一个星期会如此。之后就不会了。

问：了解女人在您生活中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女人时的孤寂，对您而言是一件最糟的事。

答：当然。就这件事来说，当我参战那年以及之后被俘的那一年，是很不愉快的。我和其他女人以及波娃都有关系，就算在战时也都借助信件来联系。但被俘之后，信件中断，所以就得考验她们的耐心与感情。波娃的感情我有把握，但其他几位，有好几项原因使我觉得不那么可靠。而我对这些事也很厌烦。在

Trèves 的集中营里，我领导大家的生活，我在剧务组工作，写了一出戏，还在圣诞节时上演。所以我有一项让我感兴趣的活动，而其余的事就缺乏了。当然，和我处于同一情况的人，所缺乏的就更多了。

问：您最缺乏的是那种温柔的气氛？

答：是的，是那种气氛。我在我的小说中，如果没有非常明显地呈现这件事，那也许是因为这太属于我隐私的部分，所以就不想写出来。

问：在文学或历史上的女英雄中，有没有您所喜欢或厌恶的？

答：最有名的如 de Sévigné 夫人、de Staël 夫人、乔治·桑(George Sand)，我都没有很大的兴趣。除此之外，我可以说，文学上或历史上的女人我都有兴趣。

尤其是斯汤达尔（Stendhal）笔下的女人，我很喜欢她们。因为她们尖锐、激情、明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知道她们可以去做自己所决定的事，她们走在同时代女人之前。例如，我觉得 Sanseverina 这个女人描写得尤其好，也非常的吸引人。此外，我也很喜欢 Castro 笔下的女修道院院长，这个女人爱上了一个大盗。她有点像 Julien Sorel 以及 Lucien Leuwen，而且也了解这个世界，她有个世界感。

问：如果想想几年之后，你们两位之中有一个要先逝去，您比较希望是她或是您？

答：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没有我她会很不快乐。我也是，没有她的话，我不知道。

问：要是今天您才 20 岁，愿不愿意过同样的一生？

答：有何不可？是的，我想我愿意。当然，我不会放弃西蒙

·波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我也许也会有一些较不重要的邂逅。所以，还是一样。

问：您认为能遇到波娃，对您来说，是一项殊遇？

答：当然，我们之间是有运气的成分。究其实质，就是能够建构出这么深刻、这么真实的关系，尤其更重要的是能分享。但这并不表示两个人的想法会相同，而我们所确定的是，另一位会以相同的程度介入问题的同一层次。波娃可以和我想的不相同，或甚至相反，但矛盾在某个层次上，是可以真实地存在的。

问：总而言之，女人使您快乐？

答：她们给我带来幸福。女人很少给我带来不幸，只有几次事情并不太成功。但一般而言，她们给我带来幸福。我现在并不觉得不快乐，而我也很少不快乐。

妇女的处境和特性

西蒙·波娃

现在我们可以懂了，为什么从古希腊到现在，对妇女的指控中会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的特征。除了一些表面上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一直未有根本的改变，而正是这种地位决定了所谓妇女的“特性”：她“沉迷于固有性”，她是忤逆的，她审慎而褊狭，她没有事实感和精确度，她缺乏道德意识，她是卑劣的功利主义者，她是虚伪的、装腔作势的、自私自利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指控中，确有事实的因素。但是，我们终将注意到，这里报告的种种行为，既不是由女性的荷尔蒙决定的，也不是由女性的头脑结构决定的。她们是被她们的处境塑造出来的。我们将从这一角度，努力对妇女的处境进行广博的观察。这将会带来某种程度的重复，但是，它也将使我们理解在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制约下的不变的女性气质。

有时候，“女性世界”常被用来和男性世界作对照，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妇女从来没能构成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社会；她们只是男人统治下的集团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集团中，她们处于次要的地位。她们仅仅由于地位相近而形成一种机械的团结，她们仅仅在这种机械的团结中联合起来，但是，她们缺乏那种有机的团结，那是每一个统一的团体的基础。她们总是被迫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反抗机制，比如古代的神秘仪式和现代的俱乐部、沙龙等等，但是她们建立的种种东西依然包含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内。因此她们的处境是矛盾的：她们全部属于男性世界，那个男

性世界正面临挑战；她们被封闭在女性的世界中，这个女性世界又被男性世界所包围，所以，不可能有她们的安生地方。她们必须有时顺从，有时拒绝，有时接受，配合运用。在这方面她们的态度和年轻姑娘相近，然而保持这种态度却更困难，因为对成年妇女来说，生活不只是梦境，而是现实。

妇女自己承认这个世界就整体来说是属于男性的；建造世界，统治世界，直到今天依然支配世界的，是男人。至于她，她不认为自己要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她的依赖性是可以理解的；她从未学习使用激烈手段，也从未作为一个自主的人站在团体的其他成员面前。封闭于她的身体、她的家庭中，她在那些确立目标和价值的男性人面神前，被动地看待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她被称为"永恒的儿童"也有几分符合事实。工人、黑奴、殖民地的土著，只要他们不使人畏惧，也常常被叫做"成年儿童"，这意思是说他们必须驯服接受别人给他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妇女的命运是谦恭地服从，甚至在思想中，她也不能把握周围的现实。她的眼前一片昏暗。

妇女缺乏能使她们支配事物的技术训练，也是事实。她所把握的，不是物质，而是生命。而生命是不可能通过工具来掌握的，生命只服从于自身的秘密法则。世界对于妇女来说，仿佛并不像海德格尔解释的那样，是居于愿望和目标之间的"工具的集合"；恰恰相反，世界对她来说是顽固不化的，是不可征服的。世界被天命所支配，反复无常，神秘莫测。母亲体内的一团血肉转化成一个人，这种奇迹既不能由数学方程式表达，也不能由机器来催促或延缓；她感觉到的持续不断的力量，最灵敏的仪器也难测知；她感到这种力量在她体内随着月亮的圆缺韵律摆动，随着岁月流逝而成熟、腐败。每一天的厨房工作也教会她忍耐和顺从；做饭也像炼金术，必须服从于火和水，她得等待糖熔化，等待生面团发酵，等待洗好的东西晾干，等待橱柜上的水果变熟。家务劳动虽然近似技术操作，但是它们实在太初级太单调了，不能向妇女

证实机械的因果法则。除此以外，甚至在家务劳动中也有很多东西出没无常：有的衣料能洗而有的不能，有的污点能去掉而有的去不掉，有的物品不动自破，灰尘像植物似的生长起来。

妇女的心理状态中，保留了农业文明对土地魔力的崇拜：她相信魔力。她的被动态度使她显得似乎既无意愿，又无进取心，她们吸引男性，好像土地一样对种子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她相信心电感应，占星术，催眠术，通神学，扶乩，千里眼，信念治疗法；她的宗教信仰充满原始迷信，比如蜡烛供奉和咒语等等；她们相信古代的自然界的精灵化成了天使，其中有一个保佑旅行者，有一个保佑分娩的妇女，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找回遗失的东西；于是，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怪事能使她惊讶。她的生活态度，不是恳求，就是祷告；为了取得某种结果，她会举行某种预测凶吉的仪式。

了解妇女为什么僵化刻板是容易的；时间从来没有带给她新鲜的东西，时间对她来说不是创造之流；因为她命中注定过着重复性的生活，她看到的将来也只是过去的重现。每一次怀孕，第一次行经，都和先前的并无二致。在这种循环现象的运行中，时间的唯一影响是慢慢衰老；时间使家具和衣服慢慢变旧，也使她的面容渐渐苍老；生育能力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消退。在这种无情力量的摧毁下，妇女失去了信心。

她不仅不知道什么能构成真正的行动，什么能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她在这世界的中心迷了路，她似乎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朦胧模糊的星云之中。她不熟悉逻辑的使用。司汤达认为，如果被需要所迫，她也会像男性一样机敏地掌握推理的方法。但是，逻辑是她很少有机会运用的工具。三段论法对她成功地制作生菜调味汁没有用处，也不能帮助她使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对于她要对付的现实来说，男性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用的。在这男性的世界中，因为她做不了什么，她的思想，不能专注于任何计划，和白日梦难以区分。她缺少对事实真相的判断能力。除了表面的字句

和心理的想象，她从来未能抓住事情的本质；明显矛盾的主张，也并不使她感到不安；她信口开河地解释越出她接触范围的神秘事物；为了她的目的，她心安理得地使用一些极端含混的概念，把参与者、意见、地点、人物、事件全都弄乱；她的头脑里塞了一大团稀奇古怪的东西。

但是，清楚地观察事物毕竟不属她的职责，因为她一直被教导的是接受男性的权威。所以，她放弃了批评、调查和判断，并且把这些都留给高等性别——男性去做。男性世界对她来说似乎是超越的现实，有绝对的价值。弗朗之说："男人造神，女人拜神。"男人不可能信以为真地跪倒在他们造好的偶像面前；但是，当妇女看到立在路边的强有力的塑像时，她们不以为这是手造的，她们驯服地弯下腰去。她们尤其希望领导人成为"秩序"和"权利"的化身。在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奇妙的男性精华必定凝聚成一个原型，父亲、丈夫和情人，都只是原型的模糊影像。说她们对这些伟大图腾的崇拜含有性的成分，是相当挖苦的；但是，她们通过这种崇拜满足童年的梦想——顺从地跪倒于英雄脚下，却也是事实。法国的将军们，比如布兰格、佩丹和戴高乐，总是受到妇女的拥戴；人们还可以回忆起当年在《人道报》上，女记者以多么潇洒的文笔赞颂铁托和他的辉煌的军装。将军，鹰眼方颔的独裁者，正是所有并非开玩笑的保守思想家希求的神圣的父亲，所有价值的绝对保证人。妇女的无能和无知，助长了她们对男性世界的法律和英雄的顺从。她们接受这些法律和英雄，不是经过头脑清晰的判断，而是凭着一种信仰——信仰从未知的事实中得到狂热的力量，它是盲目的，情绪化的，顽固的，愚蠢的；它无条件地宣称反对讲理、反对历史、反对所有的克制。

这种固执的崇拜，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定，可能表现为下列两种情况之一：妇女们热情坚持的，或是法律的内容，或是法律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属于具有特权的精英阶层，受惠于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那么她希望这个秩序永不动摇，并且相当固执地坚持

这一愿望。男人知道他可以发明不同的习俗制度，另一套伦理观念，新的法律经典；意识到自己有超越现实的能力，他把历史看作变化的。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些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认识到他的行动和思想必须适应这种演变。但是，由于妇女不介入历史，她不了解历史的必然性。她对未来满腹狐疑，于是想要阻挡时光流逝。如果她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树立的偶像被摧垮了，她不会想去供奉重居天际的新神，而会愤怒地冲去保卫旧神。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人并不比妇女更热衷于维护奴隶制度。在波尔战争期间的英国，在巴黎公社时代的法国，最为激动好战的是妇女。她们企图用她们展露的强烈热情，弥补她们行动方面的怠惰。如果赢得了胜利，她们像猎狗一样冲向倒地的敌人；如果失败，她们怨恨地拒绝任何和解的努力。她们的思想只是个空样子，她们毫无顾虑地支持最为过时的理想：比如她们可能在 1914 年成为主张王位继承的正统主义者，在 1953 年支持沙皇分子。有时候男人会微笑着鼓励她们这样做，因为看到她们对他用较有分寸的词汇表达的思想作出如此狂热的反应，使他觉得很有趣；但是，当他发现他的思想被弄成了如此愚蠢刚愎的样子，他可能大为光火。

只有那些处于完整和谐的文明及社会阶级中的妇女，会采取不屈不挠的态度。就最一般的情况而言，妇女尊重法律仅仅由于那是法律，因为她的信念是盲目的；如果法律改变了，它仍然保持魔力。在妇女眼中，强权就是公理，因为她从男人那里看到的都是依仗强力的公理。也正因此，当社会崩溃时，妇女最先拜倒在征服者脚下。就整体而言，她们接受存在的一切。她们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服从。当埋藏在火山灰下的庞培城被挖掘出来时，有人注意到，那些焚烧过的男人的身体，保持着反叛的、向天抗议的、企图逃跑的姿势，同时，那些妇女，则是脸朝土地，缩作一团。妇女们觉得她们无力反抗很多东西，比如火山、警察、监护者和男人。“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她们说，“这就是生活，能有

什么办法！”

这种退让的态度，使妇女产生了常被夸奖的耐性。她们比男人更能经受肉体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具备苦行者的勇气；尽管缺乏男性的进取意识，很多妇女以她们在被动的抵抗中的镇静倔强而闻名。面对危机、贫困和不幸，她们往往比她们的丈夫更有活力；她们做起事来不慌不忙。当她们以坚韧的意志从事某一事业时，她们有时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功。“不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在一个豁达的女人身上，服从表现为忍耐：她忍耐所有的东西，她不怨恨任何东西，因为她认为无论人还是物，都只能顺乎自然，保持原来的样子。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可能使服从成为向上的美德，如像某些坚忍进取的妇女所作。但是服从也往往酿成一种没有结果的谨慎；妇女总是在设法保全、适应或周旋，而不是破坏和重建；她们宁可妥协或调整，不愿革命。

在19世纪，妇女是工人解放运动中最大的阻碍之一。有多少胆小的家庭主妇，恳求她们的丈夫千万别去冒风险！她们不单单害怕罢工、解雇和贫困，她们还怕造反是一种罪过。这是容易理解的：假如她们不得不受苦，她们宁可忍受那些受惯了的痛苦，而不愿忍受新的，因为在家里苦巴巴地过活比上街闹事容易些。

妇女的命运，同一些易于毁灭的东西密切联系在一起；失去这些东西，她们也就失去了一切。只有自由的主体，确信自己超越于这些东西的延续存在，才可能制止一切衰颓；但妇女不可能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资源。她之所以不相信争取自由的解放运动，真正的原因是她从未试验过运用自由的力量；对她们来说，世界似乎被一种晦涩朦胧的天命所统治，起来反抗这种天命实在是太冒失了。要求她追随的那些危险的道路，并不是她自己选择拟定的，所以她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让未来在她们面前展开吧，这样，她将不会再因无望而死守着过去。当妇女们被召唤起来投入具体的行动，当她们认识到她们的利益存在于指定的目标之中，她们会像男人一样大胆和勇敢。

妇女为之广受责备的许多缺点，比如平庸、懒散、轻浮、奴性等等，也表明了她们的思想、经验、兴趣、观察力范围非常狭小的事实。可以说妇女是情绪性的，沉陷于内在的固有性的泥沼中；但是，首先是她自己被封闭起来了。后宫侍妾狂热嗜好玫瑰蜜饯和香水浴也并非病态，因为她不得不打发时间。当妇女被窒息于沉闷的闺房中，无论在妓院还是中产阶级的家里，她都只好从舒适和安逸之中寻找慰藉；此外，即使她确实失之检点，也常常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有关的权利。她命中注定不可能从粗野的丈夫那里得到满足，于是在调味汁、烈性酒、天鹅绒、阳光和水、闺中女友和年轻的情人身上寻找安慰。如果在男人看来她似乎是非常“动物化”的人，那是因为她的处境导致她把她的动物性看得特别重要。她的动物性要求并不强于男人，但是她常为此低声抱怨或夸大其辞。在性爱中她获得片刻的胜利。在被尊奉为神的短暂时间里，女人不再感受到受损害或受挫折。但是，这不过是又一次说明，她珍惜那些固有性的胜利，只是因为固有性是她的命运。

女人的轻浮和她的“太实际”产生于相同的原因；她把小事情看得很重，是因为她很少参与大事情。而且，可以进一步说，充塞于她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对她来说就是最为严肃的活动。她把她的魅力和机遇，都归功于她的服装和美貌。她常常显得懒洋洋的、有气无力的。种种消遣使她变得空虚无聊。如果她唠唠叨叨、喊喊喳喳，那是为了排遣她无事可做的时光；因为行动已不可能，她就用说话来替代。事实上，当妇女从事一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业时，她是能够像男人一样表现出积极肯干、讲求效率、沉默寡言、吃苦耐劳的。

女人被指责为有奴性；有人说，她随时准备倒在主子脚边吻那打过她的手。一般来说，女人确实缺少真正的自尊心。在报纸或杂志的“失恋者顾问”专栏里，给予被欺骗的妻子和被遗弃的恋人的劝告，充满了奴颜婢膝、可怜巴巴的味道。妇女在矜持和

傲慢的情况中弄得精疲力尽，到头来只拾得些男人作为恩赐而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那些把男人当作生活的唯一意义和唯一理由的女人，离了男人的支持，又能做什么呢？她只能忍受各种屈辱；奴隶不可能具有人的尊严感；一个奴隶只要没被摧残得体无完肤，就算过得去了。

最后，如果说妇女是世俗的、平凡的、信奉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们被迫献身于做饭和洗濯尿布，无法求得伟大和崇高！负担所有不被留心却又切实存在的生活的单调重复，就是她的义务。无怪乎妇女只能重复做着相同的事，无所发明创造，因为对她来说时间只是一圈一圈地在原地打转，却不能把她引向别处。她忙来忙去却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于是，她把自己等同于她占有的东西。这种对物的依赖性，是她对男人的依赖性的随之而来的结果，也可以解释她的吝啬和贪婪。她的生活并不指向任何目的：她全身心地进行生育后代及照料一些没有更多意义的东西，比如食品、衣服和住所。这些东西是动物生活和自由存在之间的非本质的媒介。属于非本质的方法或手段的唯一价值是功利，家庭主妇就生活在这种功利的水平上。她不过是个对家中亲属有用处的人，在这方面，她没有更高的妄想。

但是，人不应满足于充当非本质的角色，因为那种情况就等于使手段变成了目标——比如在政治家身上可能看到的情况——并且使手段的价值似乎变成了绝对的价值。于是，功利在家庭主妇的天堂里占了优势，压过了真理、美和自由；她正是从这种功利的透视角度来观看整个宇宙的。也正因为这样，她采纳奉行亚里斯多德道德理论里的中庸之道，那也就是说，要平凡、普通。我们怎么可能期望她表现得大胆进取、生气勃勃、公正无私、高贵庄严呢？这些优良品质，只有当自由的人们走向广阔的未来、远远超越了所有给定的现实之时，才可能显现出来。妇女们被封闭在厨房和卧室里，人们却惊异于她的视野如此狭小。她的翅膀被剪了，人们却叹息她不会飞。让未来展开在她的面前吧，她将不

再被链条拴在现存的状况里。

类似的不一致及前后矛盾，也体现在以下的情况中：妇女被封闭限制在自我或家庭的范围内，人们又指责她自我崇拜，指责她以自我为中心，指责她虚荣、恶毒、心理不正常，等等。她被剥夺了和其他人交流来往的具体的可能性；她从来不曾经验过团结一致的吸引力和益处，因为她被整个儿供献给她的家庭了，她处在孤独中。人们也不指望她能朝向普遍性的福利超越自己。她固执地停留在一个她所熟悉的王国里，在那里，她能够控制各种事物，并且从中享受一种视他人脸色而定的、靠不住的统治权。

然而，即使她闭紧门窗，妇女在家里也依然找不到充分的安全感。被男性的宇宙所包围，她只能对这个宇宙作远远的膜拜，却不敢有所冒犯。也正因为她没有能力通过工艺技术、逻辑推理和明确的认识去把握这个男性宇宙，她像儿童或野人那样，被危险可怕的神秘东西所包围。她把关于现实的魔术性概念投射进男性世界；对她来说，事件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她分辨不清楚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情愿相信任何事情，不论是什么事情。她听信谣言，传播谣言，并且开始为谣言恐慌，甚至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她也焦虑不安；夜里半睡半醒地躺着，她也会被与现实相关的恶梦搅扰。因为妇女处于被动状态，不可测知的未来笼罩着战争、革命、灾荒和贫困的幻影；没有能力去行动，她常常苦恼。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当他们从事某项事业或面临紧急情况时，冒着他们自己的风险；他们的计划，他们遵循的规则，指示出一条穿越黑暗的正确道路。但是，妇女们在混乱和黑暗中辗转挣扎，一筹莫展；她惯于如此，因为她什么都不能做；在她的想象中，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同等的现实性：火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出错，生意可能失败。在晦暗混乱的思绪中，她的软弱无力的状态，幽灵似地萦绕出没。

她的焦虑表现了她对现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这个世界看起来充满威胁、随时可能崩溃，这是因为她生活在其中并不幸福。在

大多数的时间里，她并不顺从于她的顺从状态；她清楚地知道，她遭受的，如同她做的，都违背她的意愿。她是一个无人请教的女人。她不敢造反；她无可奈何地屈服；她怨天尤人。所有女人与之谈心的人，医生、牧师或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惯常的腔调就是抱怨。在朋友中，妇女反复诉说她的烦恼，她们像合唱队似的，一齐抱怨命运的不公平，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一个自由人，对于他的失败，往往只责备他自己，他承担失败的责任；但是，对妇女来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通过别人代理的，所以别人要对她的灾难负责。她的疯狂的绝望状态，使她拒绝所有的补救方法；向那些一味怨天尤人的妇女建议解决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什么也不接受。她坚持生活在她的现存状况中，也就是生活在一种无行动能力的愤懑状况中，如她平时所为。如果有人向她建议某些改变，她把手一摊说："这有什么用！"她知道她的困难实际上比她在托词中所说的还要严重，她也知道仅靠权宜之计不能真正解救她。她坚持认为整个世界都应为她的不幸负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她的份，并且反对她；她从少年时代开始，甚至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一直不满于自己的境遇。人们许诺给她种种补偿，保证她只要把自己的运气交入男人手中，就可以得到一百倍的回报——她感到她受骗了。她向整个男性宇宙提出公诉。怨恨是依赖的反面：当一个人给出了一切，他总觉得收到的回报不足不够。

然而，妇女不得不怀着某种尊敬对待男性宇宙。如果她从整体上反对男人，她会觉得失去了头上的屋顶似的身陷险境；所以，她采纳了摩尼教徒的见解——把善和恶截然分开，这也是受她当家庭主妇的经验启发而生的。一个自主行动的人，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对善和恶二者都应负责，他知道是他制订了目标，并将使之实现；在行动中，他领悟到所有解决办法可能都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意义：正义和非正义，得与失，都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但是，那些被动服从的人置身事外，并且拒绝思考伦理学的

问题。好的就“应该”被实现，如果没有被实现，那么一定是有人做错了，这些人应该受责备，应该被惩罚。像小孩子一样，妇女把善和恶想成两个简单的形象，看成并存而又分立的实体；她的这种善恶二分的摩尼教思想，使她摆脱了进行艰难的选择时所生的焦虑而心安理得。要在大恶和小恶之间、在现存的善和将来的更大的善之间作出决定，要确切定义对她自己来说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胜利，所有这些都过于繁难。对于摩尼教徒来说，只须除去毒草，和毒草明显不同的就是好麦子；彻底除去污垢就是清洁；把房子弄干净就是扫除灰尘和垃圾。

所以，妇女会有“这都是犹太人在捣乱”或别的什么人在捣乱的想法；她们总是反感一些人或一些事。她们从来不知道恶的原则可能位于何处，但是她们一心盼望有个“好政府”把邪恶扫除干净，就像她们把灰尘从房子里扫出去。

但是，这类希望总只能是对某种无法确定的未来而言的；眼下，恶继续不断地侵蚀着善；由于她管不上犹太人或别的她认为有问题的人，她就在周围寻找应负责的人，给她的愤慨找到具体的发泄对象。她的丈夫就是最合适的牺牲品。他是男性宇宙的化身，男性社会通过他来管制她、欺骗她。他似乎能承当世界重任，什么事情出了问题，都是他的错误。夜里他回到家里，她向他抱怨孩子、商店售货员、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想要他感到他应为之负责。她经常向他发牢骚；他有罪，首先因为他是男人。他可能也疾病缠身或心事重重——“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他拥有她时时感到不公正的男性特权。令人注目的是，她虽然对丈夫或情人怀有敌意，却不离开他，反而贴近他。男人一旦开始厌恶妻子或情人，就想离开她；但妇女却想要她所痛恨的男人留在手边，这样她可以使他付出代价。反唇相讥不能解除她的痛苦，反而使她更加沉陷其中不能自拔。妻子的超级精神安慰是自命为壮烈牺牲的烈士。生活和男人征服了她，她要把这种失败转化成胜利。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她会痛痛快快地放纵自己

嚎啕大哭或乱发脾气，如同她小时候所作。

可以肯定，妇女动不动就哭的脾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事实，即她的生活建立在一个无力反抗的基础上。无疑，从生理学的角度说，她不如男性善于控制神经，同时，她所受的教育也使她放纵自己，随随便便。说这是教育或习惯影响的结果，是确有证据的。比如，在从前，像本杰明·科斯坦和狄德罗这样的男人，也常常泪如雨下，后来，时代风尚变了，男人们也就停止哭泣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妇女们永远准备采取受挫折、受委屈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因为她从来没有慷慨地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男人是对世界承担责任的；即使遭到不幸，他也并不改变态度，他正视人生的苦难，他不会自暴自弃；然而，女人们碰到一点点麻烦事，就认为世界和她作对，命运对她不公。于是，她急忙退回她最可靠的避难所里：她自己。那些热泪纵横的面颊，那些哭红肿了的眼睛，不是她的充满忧伤的灵魂的视觉表达方式吗？冰凉地淌过皮肤，略带咸味地落在舌上，眼泪是一种虽然苦涩却犹文雅的抚慰；她的脸在慈悲的泪水下发光。眼泪是哀伤，也是慰藉，是狂热，也是一贴平息事态的清凉剂。眼泪是妇女的超级辩护词；它突然而来，突然而去，像狂风，像四月的阵雨。流泪的妇女好像忧伤的喷泉，风雨的天空。她的眼睛朦胧迷茫，它们浸没在泪水中，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回到了自然物的被动状态。有人想要征服她，但是她自己先就崩溃于失败中；她像石头一样沉没，她落下去了，她使那些注视着她的男人困惑，他像站在大瀑布面前似的束手无策。他认为这种表演不公平；但是她认为这种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因为除了眼泪，她手里没有别的有效武器可以使用。她一次一次地使用这种魔术符咒。她的哭泣能激怒男人，使男人生气，这也是她要哭泣的又一个原因。

不论何时，如果眼泪不足以表达她的反抗，她就大吵大闹发脾气，弄得男人更感困窘。在某些文化圈子里，丈夫可能就会动手打妻子；在另一些文化圈子里，他可能拒绝使用暴力，正因为

他是强者，他的拳头是一种有效力的武器。但是，妇女却像小孩子一样，纵情于象征性的胡闹：她可能扑到男人身上，打他，抓他，但是这仅仅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而已。归根到底，她是在通过这种神经质的闹剧，表达她事实上无法实行的不服从。她的种种胡闹并不只是出于生理性的原因。胡闹是一种内部能量的发散，但对任何东西都不起作用。这是一种因处境刺激而生的否定性力量的无目的的宣泄。母亲很少对她的年幼的子女发脾气，因为她可以责罚他们，打他们。只有对她的成年儿子，她的丈夫，或她的情人，那些她没有真正力量控制的人，她才会大发脾气，大光其火。托尔斯泰夫人歇斯底里的吵闹是意味深长的。她从未设法真正理解她的丈夫，这无疑是她的错误。从她的日记来看，她似乎显得小器量、无感情、不诚恳，远非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但是，不管她是对是错，都决不会改变她的可怕的处境。她的一生，除了忍受无休止的指责、怀孕、孤独和丈夫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什么都没做。每当托尔斯泰发出新的命令加剧冲突，她手无寸铁地敌意地反对他，她以缺乏力量的愿望来对抗他的不友好的愿望。她爆发了戏剧性的抗议——假装自杀，假装逃亡，假装生病，等等。这些使她周围的人不快，也使她自己精疲力尽。很难看出她还可能有另一种出路，因为她没有积极的方式来隐藏她的反抗感情，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表达这种感情。

对于那些走到了反抗的尽头的女人来说，只有一条路还向她们开放，那就是自杀。但是，以自杀作为最后手段的，妇女少于男人。从统计资料看，自杀致死的，在男人中比在女人中常见，但是，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后者多于前者。这可能是由于妇女较喜欢从演戏行为中得到满足，她们假装自我毁灭的成份，常常多于她们真心想要自杀的成份。这也可能是因为使用残酷的方法使她们感到厌恶：妇女几乎从来不用冰冷的铁器或火器自杀。她们比较可能投水自杀，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莪菲利亚一样。这证明了女人和水的密切关系。在水里，在寂静的黑

暗中，仿佛生命可能自然而然地溶化。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矛盾的情况：妇女厌恶的东西，她并不真心想要放弃。她假装要和给他带来灾难的男人决裂，但最后又还和他在一起；她假装要摆脱使她伤心的生活，但她在自杀方面的致死率相对来说很低。她不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她向男人抗议，向生活抗议，向她的处境抗议，但是，她并不努力从中逃脱。

妇女行为的很多方面，都可被解释成是一种抗议的形式。我们知道，女人欺骗丈夫，常常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违抗丈夫或蔑视丈夫；她可能故意粗枝大叶并挥霍浪费，因为他是有条不紊并精打细算的。厌恶女人的人，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她缺乏守时的观念；但是，就我们所知，事实上她能使她适应时间的要求。她迟到，是有意的。有些爱卖弄风情的女人，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吊男人的胃口，使她们的出现得到更高的赞赏；但是，归根结底，妇女要让男人等上几分钟，主要是为了向她终身都处在等待之中表示抗议。

在某种意义上说，女人的整个生命就是等待，因为她被监禁在固有性和随意性的囚牢里，因为她的生存意义永远掌握在别人手中。她等待男人的尊崇和赞许，她等待爱情，她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和夸奖，她等待来自男人的供养。不论她掌管支票簿，还是仅仅按周或按月从丈夫那里拿零用钱，如果她想要能付钱给杂货商或买一件新衣服，都必须由丈夫去领取工薪或争取加薪。她等待男人露面，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她听命于他；她只是男人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存在。丈夫有职业，成天不在家，妻子不得不容忍他的离开；情人，尽管他非常热情，还得由他决定是否见面或分手。她等待男人的欲望，她等待自己的快乐。

她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在和情人约会时迟到，在丈夫指定的时间还未准备完毕。她用这种方式来维护她自己的重要性，她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她的独立性；在这种时候，她成了本质性的主

体，别的人只能被动地服从。但是，这些只是一种怯懦的报复尝试；不论她能让男人等候多久，都不能补偿她在观察和期望、在等待男人的好兴致中耗费掉的无休无止的时光。

虽然妇女承认男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一般来说，她喜欢和男人的统治斤斤计较。由此就产生了她那常遭指责的、著名的"爱闹别扭"的特性。妇女没有独立的领域，她不可能用她自己的建设性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来对抗男人主张并拥护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她仅仅只能否定它们。她的否定是多是少，其彻底性取决于她性格中尊敬和怨恨的搭配比例。但是，事实上她知道男性体系中的所有缺陷，她毫不犹豫地揭露它们。

但是，只有在拒绝男人提供的骗局的条件下，妇女才能具备那些超过男人的优点。上层阶级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热心同谋，因为她从其供养中得益匪浅。我们知道，贵族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妇女总是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比她们的丈夫更为顽固。她们毫不犹豫地牺牲她们作为人类一员的独立性。她们压抑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批评性判断，所有的发自真情的冲动；她们鹦鹉学舌似地重复别人的看法，她们把理想和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东西混为一谈；她们的心灵失去了真诚，甚至连她们的表情也如此。家庭主妇在她的家务劳动中，重新得到了某些独立性，并从劳动中得到了虽然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但是，那些靠仆人侍候的女人是不可能把握住这个世界的。她生活在梦幻和抽象中，生活在空虚中。她不理解她口中声称的观念的真正涵义。她在讨论中使用的词汇已失尽了它们的真正意义。金融家、工业巨头，有时甚至包括军界领袖，也能了解生活的艰难和辛苦，因为他们承担着种种风险；虽然他们在不公平的市场上买得了他们的特权，但至少他们还亲自付出了代价。但是，他们的妻子，对于她们在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好处，却什么都没付，什么都没做。正因如此，她们怀着如此盲目的信念，相信她们的权利是不可废除的。她们空虚

而傲慢，她们激烈而低能，她们顽固而无知：这些使她们成为人类曾经产生过的最为无用的废物。

一般性地论及“妇女”，就如一般性地论及“永远的”男人一样，是很可笑的。我们知道，旨在说明妇女是优等的、或低等的、或与男人平等的种种比较，之所以都无作用，就因为男女的处境是深有区别的。如果我们比较男女的处境，而不是仅仅比较处境中的人，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男人的处境好得多；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有较多的机会来运用他的自由。必然发生的结果是，男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女性，实际上，妇女甚至被禁止真正去做任何事情。此外，比较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环境的限制中对自由的使用，也是一种无意义的尝试，因为准确地说，他们使用自由的条件不同。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的陷阱和居心不良的骗局，正等待着两个不同的性别。心灵的自由只有通过双方的努力才会臻于完整。但是，对妇女来说，自由至今仍是一个抽象而空泛的概念；由于这一事实，妇女只可能通过反叛来运用自由。反叛，是那些没有机会做任何建设性工作的人的唯一出路。她们必须抵制处境对她们的限制，她们必须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听天由命，仅仅是一种放弃责任和逃避责任的行为。对妇女来说，除了为自身的解放而工作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西蒙·波娃的三部小说梗概

一 《他人之血》

(Le Sang des Autres，1944 年)

让坐在床边，海兰娜在床上躺着，医生说她过不了今夜……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30 年代，惨淡的、令人沮丧的年代。资产者脑满肠肥，工人们争取生存。让和自己的资产者家庭决裂，当了印刷工人，参加共产党，参加工会运动。玛赛尔和雅克兄弟俩都是他的挚友，雅克跟他参加工人运动。一天与警察冲突，持枪的雅克被击毙。是他给了雅克手枪，雅克却死了。他人的血。让退出共产党。他人的血白白地流掉了。人人都选择自己的存在。他仍然从事工会运动，但是不愿过问政治，工会只该为工人争取生存，如此而已。朋友保尔与他不同，保尔过问政治。然后出现了她，海兰娜，保尔的未婚妻。海兰娜对保尔并无爱情，却爱上了他，让。让不爱她，他也不能爱她。海兰娜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吗？是我自己决定的，是我自己选择的。"她选择了她的存在、爱他，哪怕他不爱她。

海兰娜有勇气，有魄力，敢作敢为。她与保尔分手，却被让拒之门外。她报复了，与一个无赖过了一夜。结果有了身孕。打胎的痛苦是在让的床上经受的。她爱他。他不能拒绝这样的爱，他不能拒绝别人自己决定的选择。他们一起接受了这种单向的爱。他说他也爱她，这是撒谎，可是撒谎却能使别人快乐。为什么不撒

谎呢？

这是惨淡的、令人沮丧的年代。雅克死了。玛赛尔是个有才能的画家，可是他一天比一天消沉，他不愿画画；玛赛尔选择的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玛赛尔的妻子特妮丝无力维持家计，她想写一部小说。特妮丝像保尔一样关心政治。“政治？”玛赛尔嗤之以鼻。他下棋，他在地板上睡觉；他像个死尸。玛赛尔也自己选择了存在。特妮丝的小说是完全失败的，让说了实话，她从此心灰意冷，她和玛赛尔分居了。

海兰娜最喜欢崭新的自行车和香甜的巧克力。她与让第一次邂逅就支使他去偷她房东太太的自行车。如今她只要让；她有了让，她心满意足，因为让说他也爱她。她拒绝了去美国就业的难得机会，因为她不愿与让分开；让抗议，她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吗……”

令人沮丧的年代。德国法西斯甚嚣尘上。让组织罢工，工会运动占据了他的一切；玛赛尔成天下棋。他们对政治都无动于衷。法西斯也选择自己的存在。法西斯进入苏台德区，接着是捷克、波兰……要拯救和平。要退让。退让是和平。捷克和平了；波兰和平了；法西斯铁腕下的和平。法国人开始不安了。

法西斯向法国伸出了爪子。玛赛尔进了劳动营。让又作了选择。他进了军队，当一名跌滚在战壕中的普通一兵。不能光流他人的血。可是为了什么去流血？

一纸调令，让被调回巴黎。“这是她干的！”让怒不可遏。他和海兰娜毕竟是同床异梦。他不能原谅她。“我宁可死，宁可你从此将我抛弃，”海兰娜说，“我决不能让你叫炮弹削掉脑袋。”他们决裂了。

战争爆发。法西斯进逼巴黎。玛赛尔的劳动营移往德国。特妮丝与海兰娜逃避城外。让负伤退役。伙伴们分化了。工会主义者中竟有人公开接受占领，打算在新的统治下“谋求工人利益”。“还是保尔有理，”让又作了选择。他留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地下

组织，他们袭击盖世太保。每次袭击都换来大批人质的毙命。干这一切为了什么？让回答说："为了让法国人知道这是在战争，"占领下的和平不是和平，他们必须有所行动。

海兰娜离别特妮丝单身撤退。途中，她把自己的座位让给陷入绝境的一对母子。她又回到巴黎。"如今德国人来了。我的存在并无改变"。既然注定如此，与德国人共处也未必不是一种存在。她接受一个德国企业家的邀请，决定去柏林就业。可是："特妮丝正在向我望；让正在向我望；他们都在望着我。"海兰娜在舞池中停下步子，她从德国企业家怀中挣出身子，不，"我不能去柏林"。

人人选择存在。玛赛尔从劳动营遣返。他在劳动营学会了蒙目下棋，可以同时对付七盘。如今他向让说："给我派点任务。"人是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下棋的。玛赛尔和特妮丝冒死主持一个地下活动据点。让想起雅克……他人的血。

海兰娜的挚友依沃娜是犹太姑娘，法西斯却要决定她的存在。海兰娜找让求援。让答应帮助依沃娜偷越出境。海兰娜脱口而出："让，你不能给我点任务？"让吃惊地望她："你变了，海兰娜。"不，她并没有改变。"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她选择了自己的存在。

海兰娜开车的本领极高，完成任务极其出色。还是那个有勇气、有魄力、敢作敢为的海兰娜。……此刻，她却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是我杀死了你，"让痛苦沉思：永远是他人的血。"第一个是雅克，现在是她……"

那是为了营救保尔，第一次行动失败了，海兰娜坚决要求单身去干第二次。让不答应，让要一起去。她说："大家缺不了你。是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让紧紧把她搂在怀中：她是对的，"如今什么也不能再把我们分开了。"他爱她。她永远爱着他。她幸福地闭上眼睛。保尔得救了。海兰娜胸口中弹。医生说她过不了今夜……

让俯下身子，亲她的脸。

"海兰娜，你知道么，我爱你。"

“是的，现在，你真的爱我了。”

“我不该答应你去。”

她笑了：“你没有权利，是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始终是这句话。她没有改变。她死了。“第一个是雅克……”始终是他人的血。

二 《人无不死》

（《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1947年）

楔　子

幕布落下又升起；瑞齐娜微笑鞠躬，观众如醉如痴。谢幕五次。瑞齐娜沉下了脸。鲜花与恭维将她包围，男友女友将她簇拥，可是她怏怏不乐：“别人也活着，别人也在快活，我就跟被别人谋害一样。”为什么在她之外还有别人存在？为什么别的女人也有人爱？为什么还有男人在爱别的女人？她不惜遭人不齿，挑拨离间，弄得女友佛洛伦丝与男友不欢而散，“让他们恨我、瞧不起我，这才证明了我的存在。”旅店的院子里有个男人始终占着一把躺椅，不开口，不动弹，下雨也不躲开，甚至不吃不喝。这人竟是个长生不老者。他叫福斯卡。瑞齐娜羡慕他的幸运。她也渴望成为长生不死的人：“这样，人世就永远为我所有了。”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与男友分手，与福斯卡开始共同生活。她把自己的存在与福斯卡联在一起：“不管到何年何月，总有一个人，福斯卡，将记住我，我的存在将因福斯卡而永恒。”瑞齐娜决心不让福斯卡离开她，她甚至不惜抛弃一切，可是福斯卡却要离开她，他偷偷离开了她，他要她忘却他的存在。瑞齐娜发疯似地寻找福斯卡。她找到了他。福斯卡对她说：人无不死才是幸福；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厄运，已经白白挣扎了几个世纪。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第 一 部

1279年5月17日，我生于意大利城邦卡莫纳的贵胄之家。卡莫纳屡受其他城邦，主要是强大的瑞纳城邦的欺凌。卡莫纳的几任亲王不是软弱无能，便是暴虐无道。1311年，我已经32岁，瑞纳人兴兵攻打佛罗伦萨，要与卡莫纳联盟。无道的亲王玛西克利准备为虎作伥，我一箭将其射死，当夜我便成为亲王。我决心保持卡莫纳的光荣，坚决与瑞纳人血战到底。残酷的围困。我们弹尽粮绝。我下令将老弱妇孺驱入城壕，任其冻饿而死，来维持精锐的壮汉为卡莫纳捐躯。妻子卡特丽纳怨恨我残暴。为了卡莫纳的光荣，我绝不动摇。在押去城壕送死的不幸者中，有一名老年乞丐，向我献出一瓶长生不老的灵药。献药是为了乞免一死，可是他却不敢服用长生不死的灵药。我可渴望长生，只要我长生不死，卡莫纳就一定可以永葆光荣，有朝一日卡莫纳定然成为意大利最强大的城邦。我服下了长生药水。人无不死。唯独我长生不老。从此我可以操纵历史，卡莫纳必将名垂千秋。人们多么可怜，他们都无不死，只有我可以实现千古不朽的伟业。城壕中的尸体化成了瘴气，瑞纳人败走了，卡莫纳没有丧失独立。我要使它强盛，足以与佛罗伦萨并立，一代人死去了。卡特丽纳与世长辞，不肖的儿子要篡位而被我结果性命。我艰苦创业，屡兴战事。战火、瘟疫，夺去了几代人的生命，唯独我长生不老，卡莫纳经历了几代兴衰开始强盛，在我经年累月的谋划下，瑞纳城邦终于被摧毁，卡莫纳成为意大利的第二个佛罗伦萨。和平却并未莅临。米兰公爵勾引法国人侵入瑞纳。引狼入室，唇亡齿寒。胜利变成了失败。沧海桑田，回顾历史使我心灰意冷。我于是和米兰公爵议和。一个名叫洛尔的女子替我生下一个儿子，我叫他安多瓦纳，视如命根。儿子长大成人，怨我软弱无能，一意要亲掌政权，重启战火，恢复卡莫纳的光荣。我让位了。儿子打了胜仗，可是他也在战役中受了致命伤。儿子含笑而死；可是他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热

恋安多瓦纳的贝娅特丽丝不肯爱我，因为我是不死者，我不能用生命博取光荣；二百年来我第一次悟到不死的可怕。整个意大利日益肢解，我后悔当初不该消灭瑞纳，如果瑞纳人强盛至今，那么今日统治世界的将不是法国人、德国人了……我突然明白自己的可笑：卡莫纳的天地多么狭隘，我的使命应该是掌握世界，造就全人类的幸福；区区一个卡莫纳有何可惜？区区一个意大利有何可惜？我决心寻找实践自己雄心的工具：只要达到目的，以我的名字统治，以别人的名字统治，不都是一样的事？

第 二 部

我找到的工具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玛克西米连，这位德国皇帝接受我拱手奉献的卡莫纳，开始在意大利征战。可是玛克西米连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君王，我把希望投向他的孙子查理。查理从婴儿长成了羸弱的青年，他无心追逐权位，只是经我催促，才挥师进入西班牙，继承外祖父斐迪南的西班牙王位。玛克西米连死后，我又运用种种谋略，使查理登基称帝。我渴望查理·奎特成为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之君。查理耗尽一生，征逐疆场；他不仅要与觊觎帝位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打仗，还要与改革宗教，掀起民众的路德较量。新大陆被发现。我推动查理进军美洲，占领墨西哥，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开扩帝国疆土。我追随查理横扫天下，我甚至跟随西班牙军队杀进我的故乡。这是我曾在数百年间矢志捍卫的卡莫纳。昔日的人们早已在地下安息。而我则永无安息之日。永远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永远是强者对弱者的杀戮，天下永远四分五裂。查理的胜利是无用的胜利，他的失败又是毫无意义的失败。查理已经老迈，我曾以为自己一手造就了查理的丰功伟业，现在我才知查理的一生毫无意义。我请求远去美洲，查理却要我留下陪他。我又等了 10 年。我终于踏上美洲。我看到了征服的历史，这种杀戮土著的野蛮征服竟出之于我的鼓动。我的行为有何意义？查理·奎特徒劳一生。一切皆成泡影。我向他承认：“我错了，我

想让您成为宇宙之主，可是宇宙并不存在。”现在我又明白：卡莫纳太小，意大利太小，世界也太小，而宇宙又并不存在。1656年1月16日，查理向儿子菲利普禅位，渡海返回西班牙。我站在海边，与孤帆远影告别，目送查理在大海中消失。

第 三 部

我在美洲的沼泽中踽踽独行，不吃不喝，只是在荒野中无目的地踯躅。我从墨西哥走到蒙特利尔，又从蒙特利尔北上，突然走到一条大河边上，在河边与探险家卡里埃邂逅。卡里埃立志要与哥伦布比肩，一定要在美洲大陆发现一条直达中国的通路。他业已进行过数次远征，从未成功，这一次又被同伴遗弃，因为没有食物而濒于毙命。我徒步四昼夜替他找来食物，救了卡里埃的性命。我受到他的热诚的鼓舞，又感受到生存的意义，于是我参加他的探险。我们找到了通入大海的河流，这个发现将以卡里埃的名字载入史册。我数次帮助卡里埃死里逃生，我利用我的不死为他做到他不能做到的事。可是，到了最后关头，眼看成功在望，卡里埃却失去了往日的狂热。他说：“大河将永远奔流，而我以后却看不到它了。”我答道：“这有什么？你做到了你想做的事，人世间将有一处地方以你的名字命名。”他却说：“以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想到你永远可以看到这一切，而我却不能够，我受不了。”我明白一切已经完结。我提出与他分手，他说已经为时太晚。他说一切发现只能算是我的发现，是我的不死才使他有了今天……在最后一次远征中，我们终于到达大河，可是在归途中陷入绝境。卡里埃执意要独自冒险去觅食，我知道结局到了。听见一声枪响。“他完了。”而我却永远不会完结，永远没有尽头，永远地孤独。

第 四 部

我在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里默默无闻地过了几十年，突然一

群白人将我弄回大陆。如今是在巴黎。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中的消遣只有几家豪门中的沙龙聚会。大家都怕我、恨我，因为我富有、怪诞。我有一个跟班，名叫蓬巴尔，是一个被我捏在手中、被我毁灭一生的人，唯有他知道我的底细。在我所经常出入的特·蒙戴松夫人的沙龙中，贵族们狂饮豪赌，跟我们当年卡莫纳英勇尚武的风气大不一样。圣·安琪伯爵输得精光，我借给他巨款，他又输得精光，我逼他还钱，亲眼看他饮弹自毙。我自己也豪赌，我立意要输，偏偏又大赢。特·蒙戴松夫人有一个伴读小姐，名叫玛丽亚娜，热衷于启蒙活动，私下也在家里举行聚会。参加者听说都是有识之士，他们谈论改革，谈论科学。我要求玛丽亚娜让我与会，被她拒绝，我就在特·蒙戴松夫人跟前将她出卖。热恋玛丽亚娜的青年利塞找我决斗，我在最后关头向他表示屈服，因为我是不死者，决斗结果只有送他性命。玛丽亚娜向我表示感激。她现在公开进行启蒙活动，邀我捐款筹建大学；我出了钱，又被她邀去筹划管理。大学成立了，我的废寝忘食使她感动，因为她不知我是一个不死者。她爱上了我，爱了很久。她认为我的乖戾和怪诞“骨子里是一种反抗”。她的爱情温暖了我的心。我又燃起常人之情。我把知道底细的蓬巴尔撵去俄国；我接受了玛丽亚娜的爱，我们幸福地结合，有了两个孩子。玛丽亚娜成天匆匆忙忙抢时间，总嫌一生太短。我不敢吐出我的秘密。蓬巴尔几次回来要挟，被我塞钱搪塞。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我悄悄把头发染白，假装龙钟老态；玛丽亚娜常常说：“情人眼里的爱人总不显老的。”最后，蓬巴尔死了，临死时向玛丽亚娜揭开我的底细。他的报复得逞了。玛丽亚娜从此沉入痛苦之中。她知道我并非同类：我没有死亡，她不能指望我和她永远在一起。她只有短暂的存在，我却有着永恒，总有一天她会在我的记忆中消失。爱情变成了悲剧。玛丽亚娜迅速了结了一生。她要求我尽量与人们一起生活，要我尽力帮助别人。她临终的遗言是：“你将永远抛弃我；我恨你。”

第 五 部

又是几十年过去。我还牢记着玛丽亚娜的遗愿。她的后裔中有了一个我所钟爱的青年，他叫阿芒，是个激进的共和派，矢志要为推翻七月王朝的共和革命献身。我寸步不离看护他，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救护他和他的伙伴。他终于得悉我的秘密。他没有把我当成怪物，却把我看成伙伴，要我帮助他们的事业。共和党人煽动民众，可是工人却仇恨机器。阿芒要我在工人中间扎根，献出我所不在乎的 10 年、15 年光阴。我当了印刷工人。我眼见工人如何困苦。后来瘟疫流行，我又志愿去病尸收容站服役，又救了阿芒一个好友的生命。激进派决定起义。我奔走在枪林弹雨中效力。起义者占领了半个巴黎，可是拉·法叶特拒绝出任共和政府首脑，共和党头面人物害怕武装的民众，拒绝响应。起义失败了。残酷的镇压。被我从瘟疫中救生的青年死于枪战。阿芒和他的朋友们身陷囹圄。我和阿芒同囚一室。我帮助他们越狱逃跑，我承当殿后不能走的角色。我因此被判 10 年监禁。我在监中浑浑噩噩

尾　声

福斯卡这一走，走进树林沉睡了60年。被人弄醒之后，又被当成胡言乱语的疯子，在疯人院关了30年……

瑞齐娜问他今后的打算，还睡觉么？不，不睡了，因为一睡就出现噩梦：有朝一日，地球上人类灭绝，可是他还活着，只有月亮晃在空中，照着空荡荡的大地……

福斯卡走向大门，他迈出了门去。瑞齐娜眼望他终于在远处消失。她发出一声长嘶。

三　《一代名流》

（《Les Mandarins》，1954年）

1944年的圣诞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聚集在亨利与波尔同居的公寓里，正在举杯欢庆法西斯的覆灭。和平即将来临，正义和幸福应该接踵而至。大家向何处去？法国应该向何处去？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在他们中间，罗伯特与亨利一样，都是著名的作家、抵抗运动的英雄；他们是法国文化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还年轻，他首先准备与波尔分手。波尔依恋着沦陷时期那一段无所作为、门关户闭的孤独生活，可是亨利却要与旧日的一切告别；他正计划着手写作一些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小说。

罗伯特却已年过6旬。他关心政治，认为法国“应该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实现人民阵线政府”，他憧憬一个“统一的欧洲，左派的欧洲”，他认为在苏联与美国这二强之间法国应该靠拢前者、摆脱美国的奴役。

亨利与波尔的关系愈闹愈糟；波尔不理解他的思想，他又厌

倦她的温情。为了向分手过渡，他决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请，动身去葡萄牙采访旅行。与他同行的是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葡萄牙之行使亨利大开眼界，使他明白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开始。他谴责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罗伯特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新的左派运动，奉行独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线。为了使运动蓬勃兴旺，他提议亨利将其主持的《希望报》纳入运动之内。《希望报》是亨利在沦陷时期创立的反法西斯报纸，是享有巨大影响的舆论工具，而亨利本人又是一致公认的抵抗运动英雄，亨利的决定将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左派和右派都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学上曾是罗伯特的学生，在生活中是罗伯特的挚友，在政治上又是罗伯特的知己；尽管他崇尚思想独立、厌恶任何帮派控制，但是他和罗伯特一样信仰社会主义；他终于克服犹豫，接受了罗伯特的提议。

罗伯特的妻子安娜热爱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心理学医师；可是抗战的胜利远未抚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头创伤：爱情和青春都已逝去；死者不能复活，活着的更需要抉择自己的存在。女儿娜第纳因为被德寇夺去了爱人，对人生丧失信念，变得性格乖戾、放浪形骸、自暴自弃。安娜自己也在寻觅存在的意义。她理解并支持丈夫的事业，可是她还年轻，她还有别的追求……

《希望报》成为新的左派运动的喉舌之后，右派认为亨利"政治转向"，《希望报》被咒骂为"共产党的尾巴"，罗伯特却又力拒法共的合并压力，这又被共产党斥为"无产阶级的叛徒"。他们的运动受到左、右夹击，《希望报》发行量剧降，财政上濒临破产。

亨利和罗伯特周围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纷纷转化。有的更为激进；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拢。娜第纳混迹在不同倾向的青年中，玩世不恭，内心苦闷，稍后在父亲那儿干了一份差使，思想上稍感充实。安娜在丈夫鼓励下，接受国际心理学会邀请，赴美国参加1945年的年会，在芝加哥无意中结识一

位美国的左翼作家刘易斯。两人一见钟情。热烈的爱情使安娜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意趣。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成员复杂。富商特拉利尤在《希望报》濒临破产的关头露出了右派面目，以拒绝资助为要挟，要求《希望报》向右转向。亨利虽然顶住了转向的压力，可是为了保存《希望报》，只得让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挤入报社，亏得朋友朗贝尔买下关键性的五分之一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对报纸的控制。

罗伯特埋头于发展壮大他的左派运动，他以不可动摇的决心筹备左派运动的全国大会。安娜虽然与刘易斯热恋，可是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业；她计划实行一种“双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欧美大陆间来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国的爱情，又不失却法国这头的家庭。

亨利与波尔彻底决裂；波尔饮恨自尽，被安娜等人救离险境。亨利承认自己创作小说的愿望无法实现，转而尝试写作剧本。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戴高乐派呼声日增，苏联作出了激烈反应，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罗伯特与亨利站在苏联一边。可是，苏联的逃亡者带出来确凿文件和资料，揭露苏联内部存在“劳动营”的奴役制度；左派运动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

罗伯特认为谴责苏联制度的缺陷就有损于左派的事业，他决定“绝对不做损害苏联的事情”；亨利认为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替它隐瞒黑暗，作为作家，他有责任阐述历史真实。两人的分歧形成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周围施加种种压力。亨利终于决定公开抨击苏联。罗伯特与亨利决裂。亨利被左派运动开除。法共舆论更对亨利穷追猛击。

其实，要是作选择，在苏、美之间，亨利还是选择苏联。可是共产党却称他为帝国主义的奸细。罗伯特对建立共产主义心向往之，可他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法国知识界的一代名流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罗伯特的左派运动奄奄一息，最后终于解体。罗伯特的中左社会主义理想宣告破灭。1944 年圣诞

之夜聚会的朋友们发生了复杂分化；每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由于朗贝尔的倒戈，亨利最终被挤出了自己首创的《希望报》。

罗伯特慨叹：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亨利深感人心冷漠。他受到美丽的庸俗的若瑟特勾引，把她捧成明星，让她演出自己写的剧本。他甚至为若瑟特母女出庭作证，帮助她们洗刷沦陷时期的丑行。他做此事不无遗憾，但是他并不感受良心责备。“在这种时代，良心毫无实用。”

安娜与刘易斯的热恋在一年后告终。当她第三次横渡大洋时，发觉刘易斯丧失了对她的爱情：“双重生活”是不可能的。安娜的幻梦破灭，又一次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可是，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罗伯特与亨利并未改变信念。他们依然期望实现人类正义，期望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失意，共同的情操，使两个朋友言归于好。他们互述思想，讨论着未来的行动。

安娜服毒自尽，打算了却浮生。可是罗伯特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的行程。他们没有让她死去。她在绝望中又产生了生趣：“他们将教我重新生活。”

亨利与娜第纳结婚，有了一个女儿。

安娜想道：“我一定会重新受到召唤。也许，有一天，我又会重新幸福。谁知道呢？”

西蒙·波娃作品目录

1943　《女宾客》(小说)　伽利玛

1944　《庇吕斯与西奈阿斯》(论著)　伽利玛

1945　《他人之血》(小说)　伽利玛

1945　《无用之辈》(剧本)　由米歇尔·维托尔在“老鸽棚”剧院上演

1946　《人无不死》(小说)　伽利玛

1947　《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　(论著)　伽利玛

1948　《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论著)　纳日尔

1948　《美国得过且过》(随笔)　谟里昂

1949　《第二性》2卷(论著)　伽利玛

1952　《萨特的著作应该焚毁么?》(评论)　伽利玛

1954　《一代名流》(小说)　获龚古尔文学奖　伽利玛

1955　《特权》(评论)　伽利玛

1957　《万里长征》(随感)　伽利玛

1958　《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录》(1908—1929)　伽利玛

1959　《布丽奇特·巴尔多与〈洛利塔〉的症候群》(评论)多伊奇、魏登弗尔德和尼科尔森(没有在法国出版)

1960　《而立之年》(回忆录,1929—1944)　伽利玛

1961　《加米拉·布巴夏》(证词)　与吉赛尔·哈里米合著　伽利玛

1963　《时势的力量》(回忆录,1944—1962)　伽利玛

1964　《死而瞑目》(小说)　伽利玛

1966　《美景》(小说)　伽利玛

1967 《破碎的女人》(短篇小说) 埃莱娜·德·波娃原版版画 伽利玛

1968 《破碎的女人》附《自言自语》、《懂事的年龄》(短篇小说集) 伽利玛

1970 《衰老》(评论) 伽利玛

1972 《清算已毕》(回忆录，1962—1972) 伽利玛

1975 《老人的散步》 玛丽安娜·阿尔纳和佩波·昂热尔摄制的短片的解说词

1979 《西蒙·德·波娃作品》(首次出版) 伽利玛

1979 《西蒙·德·波娃》 马尔卡·里博斯卡和约瑟·戴扬合拍的电影中的对话。

1980 《精神至上》(短篇小说) 伽利玛

1981 《告别仪式》(评论) 伽利玛